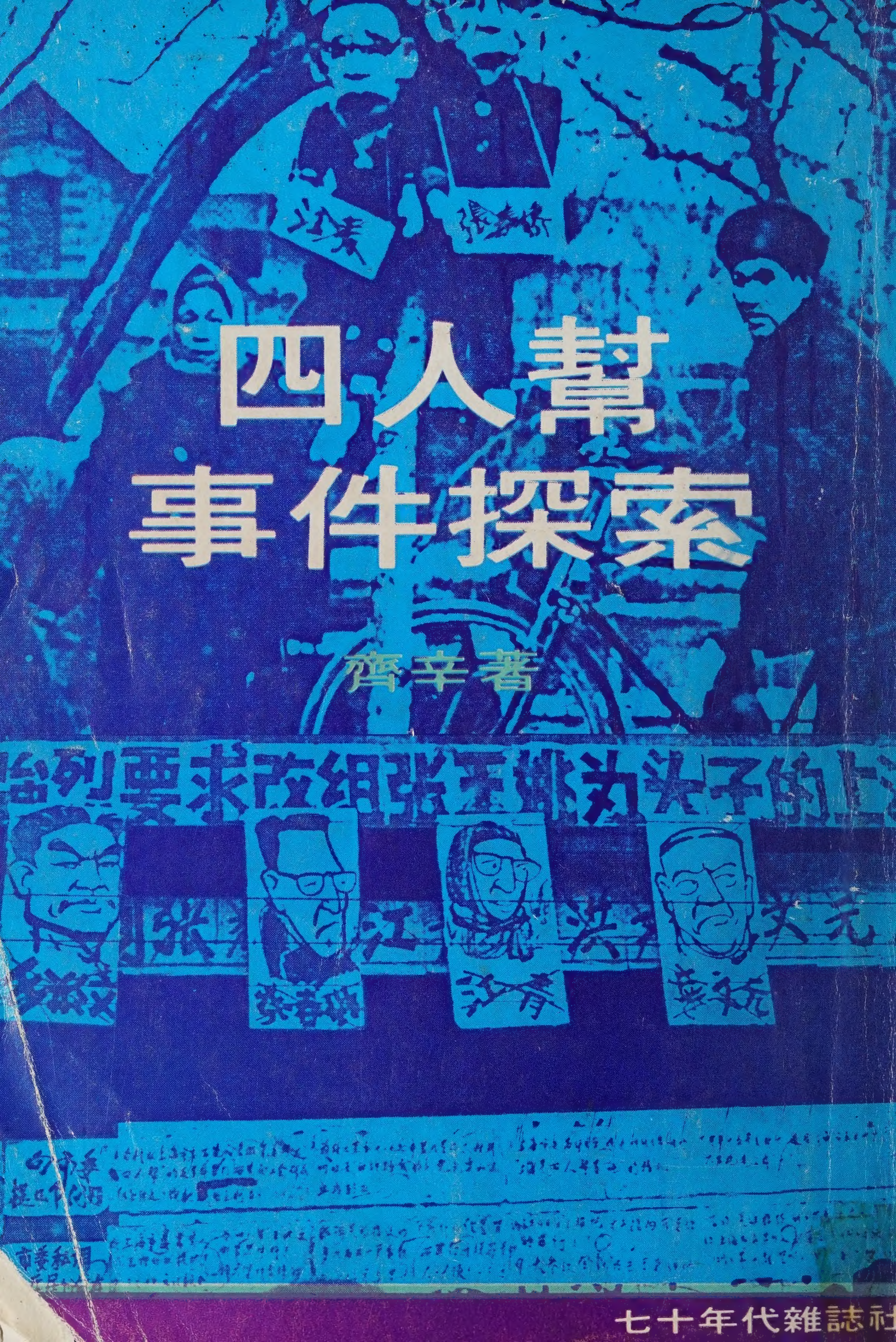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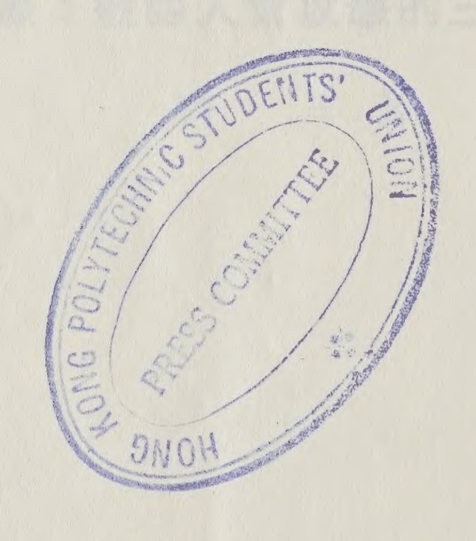


四人幫
事件探索
齊辛著
七十年代雜誌社


HONG KONG POLYTECHNIC STUDENTS' UNION
PRESS COMMITTEE

四人幫事件探索

附錄：被四人幫攻擊的三個文件

齊　辛著

七十年代雜誌社

四人幫事件探索

作者：齊辛

出版：七十年代雜誌社
香港灣仔聯發街十五號地庫
電話：5-283206

承印：大千印刷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1977年5月再版·定價港幣五元

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捩點

——從大亂走向大治的時期

一九七六年，在中國大陸，是「極不平凡的一年」，是「面臨巨大困難」的一年。在這一年裏，中國大陸發生了連串的重大事件。而所有事件中最震動中外的，則是圍繞「四人幫」亂黨亂國的激烈鬥爭。從毛澤東逝世到「四人幫」被捕，則是這一場鬥爭的最高潮，也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

以下是有關這個轉折時期的一些歷史性的圖片。



△ 造成一九七六年中共的困難局面和關鍵性的搏鬥，是從一月八日周恩來逝世開始的。圖爲北京青年在天安門前哭悼周恩來的逝世。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各界代表舉行追悼周恩來大會。圖爲全體參加大會者肅立默哀。

一九七六年一月，北京清華大學開始在校內張貼「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字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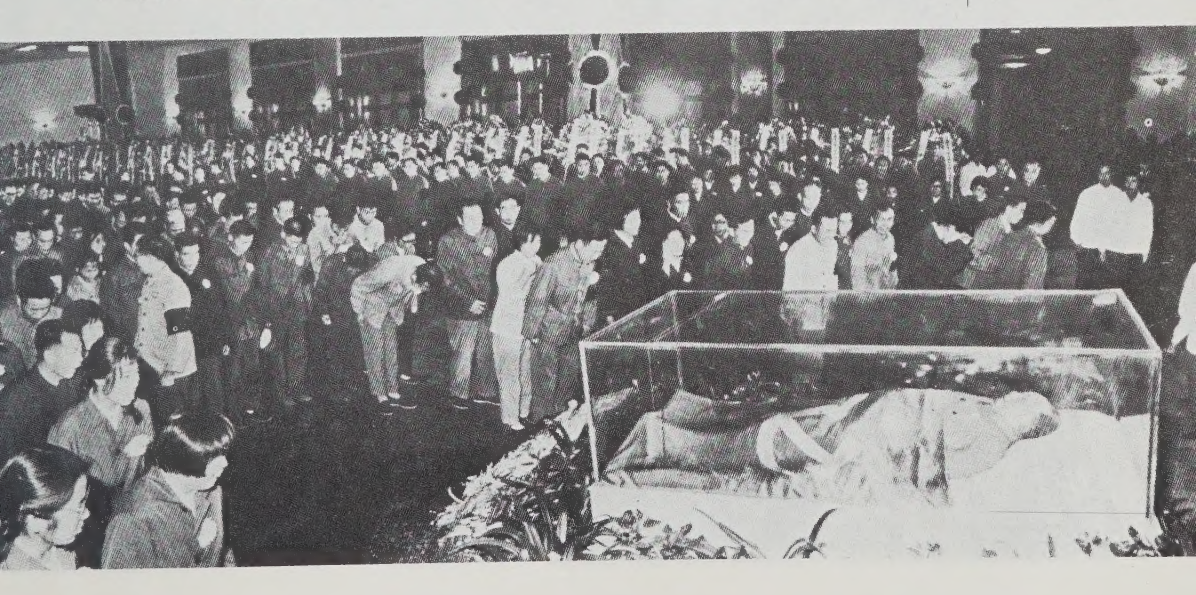


天安門事件發生後，鄧小平被撤銷了黨內外的職務，但黨籍則仍被保留。▷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北京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圖爲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堆放的悼念周恩來的花圈。▽

△周恩來逝世後，毛澤東病重，而中共元老朱德又在七月六日突然逝世，四人幫的活動更加猖獗了。圖爲七月九、十日兩天，朱德的追悼大會在北京人民文化宮舉行。

毛澤東的逝世使中共高層圍繞着接班人的鬥爭趨於表面化和尖銳化。圖爲參加弔唁的北京羣衆代表在毛澤東遺體前哀泣。▽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在毛澤東追悼會前兩天，四人幫在未經中央政治局討論的情況下，突搶先在「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傳達了經他們篡改的所謂毛澤東的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

人民日报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
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1948年6月15日创刊 第10295号 1976年9月16日 星期四 农历丙辰年八月廿三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和我们永别了。毛主席的逝世，对我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八亿神州，无限悲痛。五洲四海，深切哀悼。我们沉痛的心情，是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经过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战斗历程。我们的党有今天，我们的国家有今天，我们的人民有今天，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毛主席为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是永世长存的。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是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我们党制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战胜了一次又一次党内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战胜了国内外凶恶的敌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结束了受压迫受奴役的历史，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迈开了巨人的步伐，贫困落后的、黑暗的旧中国变成了朝气蓬勃、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是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领导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同全世界马列主义政党、组织和革命人民一道，开展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人民反帝反霸事业的蓬勃发展。毛主席深刻分析了当代世界形势，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思想，为我国制定了革命的外交路线和政策，加强了我国人民同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战斗团结，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是毛主席，在同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总结了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贡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特别是贡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课题。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发展，革命事业就胜利；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遭受挫折，革命事业就失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牢牢记住这个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我们按毛主席路线办，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毛主席生前谆谆教导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忠实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就一定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的伟大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文献，是我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只有学好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才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更好地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亿万人民群众所掌握，是反修防修的根本保证，是夺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久经考验的、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是具有丰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经验的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全党服从中央，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要按照毛主席的建党学说，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要发扬毛主席倡导的党的优良作风。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批邓为动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我们有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有毛主席亲自创建的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人民。我们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长期教导，一定能够战胜任何困难，永远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我们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着必胜的信念。**“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在毛澤東追悼大會上，華國鋒所致「悼詞」沒有引用前兩天「人民日報」「社論」所僞造的「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四人幫利用所控制的輿論工具，在「人民日報」刊出中共領導人出席九月三十日國慶座談會，別有用心地攝得使江青恰巧站在中間的照片，爲江青上台製造輿論。▽



◁華國鋒在政治局指出「按既定方針辦」的錯誤之後，四人幫續於十月四日在「光明日報」刊出署名梁效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表示：「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然沒有好下場的。」發出向華國鋒進攻的訊號。

光明日報

GUANG MING RIBAO

毛主席语录

按既定方针办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梁效

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上接第一版）

要坚定地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必须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久经考验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是要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通过各级党组织来贯彻的。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全党服从中央，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任何破坏党的团结、制造分裂的行为，都是违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的，都是三千万党员，八万万人民，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按不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归根到底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是团结，还是分裂；是光明正大，还是搞阴谋诡计的问题。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要求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因此，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必然要触犯修正主义大官们的利益，触犯他们的命根子资产阶级法权，遭到党内资产阶级的拼死抵抗。“走资派还在走。”这个“走”的基本内容，就是反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就是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同时，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也一定会采取各种方式，施加各种影响，支持党内资产阶级，妄图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不斗争就不能进步”的教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准备迎接二十次、三十次的路线斗争，在同党内资产阶级，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当前，在国内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抓住要害，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在国际，要坚持反对苏美两霸的斗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必须提高百倍的警惕，坚决粉碎敢于入侵之敌。

前面的征途上尽管还会扑来阵阵邪风恶浪，还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但是，只要我们坚决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坚定地执行毛主席既定的革命政策，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毛主席和我们永别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发展，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为我们规划了未来的宏伟蓝图。过去，我们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今后，我们继续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定会夺得更伟大的胜利。

毛主席和我们永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在领导我们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时候，一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寄希望于人民群众。毛主席非常重视对群众进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谆谆告诫全党：“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在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中，毛主席又一次强调要“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八亿中国人民，是毛主席在长期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用党的基本路线的思想亲自哺育起来的英雄人民。亿万人民学习、执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定胜利的根本保证。在这样的人民面前，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毛主席和我们永别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我们所进行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亿万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事业。因此，它在人民群众中有着极其深厚的基础，“能够选拔很多人材来接替去世的伟大天才，继承他们的事业，沿着他们的道路前进，完成他们开始的事业”（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列宁全集》第29卷第72页）。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十分重视培养革命接班人，亲自提出了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各级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并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暴风雨中考察和锻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考验，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正在茁壮成长。这是继续执行毛主席既定方针的有力保证。

一百多年前，当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只是两个青年的时候，面对着资本和王冠统治下的黑暗的欧洲大陆，他们就用《共产党宣言》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宣告了共产主义的必然到来。一九一八年，在那十四个帝国主义强盗妄图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的极端困难的日子里，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豪迈地指出：“资本的枷锁一定会被打得粉碎，社会主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今天，在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面前，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面前，在毛泽东思想阳光雨露哺育的英雄的中国人民面前，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我们亿万革命大军在党中央领导下，永远沿着毛主席既定方针指引的方向前进。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北京政變的四人集團——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左至右）。



△在四人幫以梁效名義發出進攻訊號之後，華國鋒等領導人於十月六日採取果斷措施，將四人幫及主要附從分子逮捕。北京街頭開始出現擁護華國鋒任中共主席的大字報。



△十月八日，中共作出建立毛澤東紀念堂及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及「毛澤東全集」的決議。隨後，十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的社論，指出：「任何背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的人，是注定要失敗的。」開始暗示了高層出現的鬥爭。圖爲華國鋒爲毛澤東紀念堂基石培土。

十月十二日，倫敦「每日電訊」報首先報道江青等被捕消息，隨後，北京上海街頭逐漸出現「粉碎四人幫」標語和大字報。▷



◁十月廿二日，新華社通過對北京的羣衆遊行的報道，向外公開了華國鋒任中共主席及粉碎四人幫事件。外電報道羣衆在遊行中表達了自發的歡樂情緒。圖爲北京街道居民參加遊行情形。

△同一時期，四人幫的名字在「人民日報」消失，其他領導人則活動頻繁。其中包括後來在四屆人大被任爲副委員長的周恩來遺孀鄧穎超。圖爲鄧穎超會見原國民黨行政院政務委員繆雲台先生時情形。

△十月廿四日，北京百萬羣衆集會，華國鋒等領導人在天安門接受羣衆歡呼勝利。

△十一月三十日，中共召開四屆人大常委第三次會議，宋慶齡主持大會。



在四屆人大常委第三次會議上，鄧穎超被任爲副委員長，在北京的政協委員列席，顯示中共强調周恩來貫徹執行的路線政策，重視法制，和發展統一戰線的意圖。圖爲鄧穎超在大會上。



△中共報章開始大量刊登揭批四人幫文章，各城市街頭則張貼揭批四人幫的大字報及漫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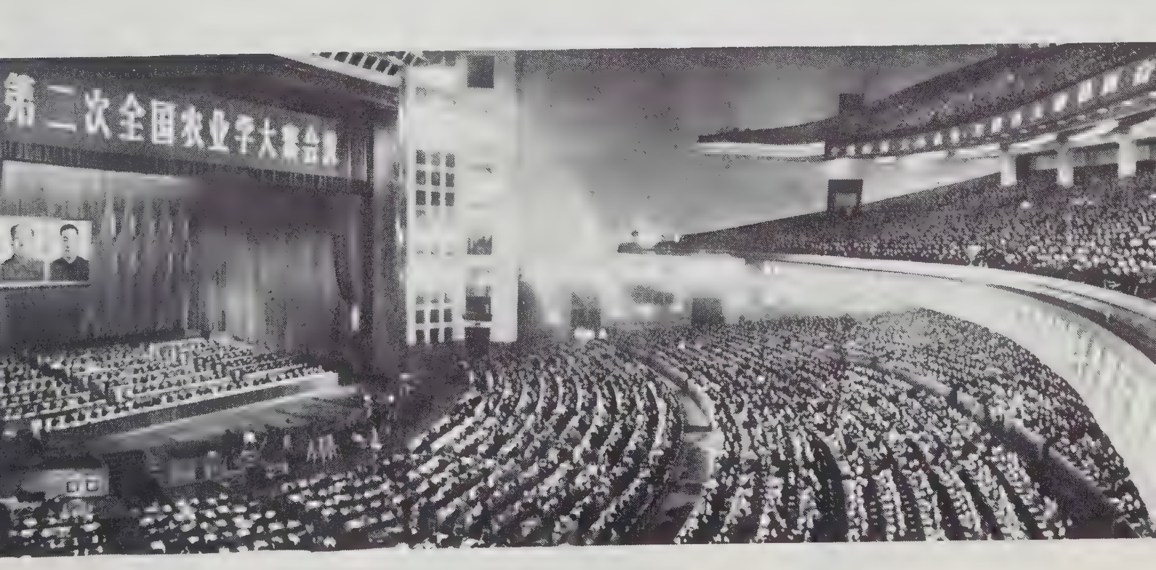
△中共在一段短時間內，「解放軍報」一連發表三篇擁護華國鋒的文章；華國鋒與葉劍英等並接見軍政大學師生，又進行米加噸級氫彈試驗，發射及回收人造衛星，以示軍心穩定，一方面對國內局勢起了安定的作用，另方面也向中共的敵人顯示備戰的姿態。圖為華國鋒、葉劍英等接見軍政大學師生。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廿六日，毛澤東誕生八十三週年，新華社發出一批毛澤東與其他革命家合攝的照片，顯示中共重新推重其他老一輩革命家的貢獻。圖爲發出之照片中，毛與康生、賀龍、陳毅合攝的一張。▽

喬冠華因投靠四人幫,在四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被撤銷外長職務，黃華被任爲外長。圖爲喬冠華與黃華在聯合國大會上。▽



下圖　十二月十日，中共召開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各地代表在會上揭發批判四人幫，顯示了中共將大力發展工農業生產，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圖為大會會場。**上圖**　十二月廿五日，華國鋒在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講話，提出今後的四個主要任務，並指出一九七七年將是「走向大治的一年」。圖為華國鋒、葉劍英在大會上。



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

◁十二月廿六日，中共發表毛澤東於一九五六年寫的「論十大關係」，表示今後政策將重新强調毛在這篇文章中所申述的各項原則。

四人幫被粉碎後，周恩來生前的貢獻和事迹不斷被報道和强調。一月八日，周恩來逝世一週年，北京發表國務院辦公室理論組的文章：「紀念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逝世一週年」，新華社重新發出一批周恩來生平圖輯。圖爲其中的一幀，爲周恩來一九六四年參加蘇聯十月革命四十七週年回國，毛澤東、朱德親自到機場迎接。▽





△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周恩來逝世一週年，北京人民冒着嚴寒抬着花圈和周恩來的遺像，在天安門廣場向他表示懷念和致敬。據外電報道，有上百萬羣衆在天安門廣場悼念，活動持續數天。

目錄

在中國，人們熱烈談論些什麼問題？……七一

論四人幫的「批鄧」運動……九五



四人幫的上台和下台

一、四人幫是怎樣上台的？

問：一個多月來，中共報章刊登了許多關於四人幫禍國殃民的罪行。這些材料的揭露，固然駭人聽聞，但現在我所關心的問題是，既然四人幫這樣罪大惡極，而且說他們又沒有才能，又沒有貢獻的話，爲什麼能讓他們爬到這麼高的地位呢？

答：回顧四人幫從上台到下台的過程，經歷了自文化大革命以來這十年間中國大陸的最複雜尖銳的鬥爭。對這十年間所出現的人與事，「左」與右，正確與謬誤，往往是不能單從表面現象去理解的。因爲「打着紅旗反紅旗」，「形左實右」，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正確的包含了錯誤，錯誤的又以正確的面目出現，正所謂錯綜複雜，不易分辨。大陸人民在這個長期的鬥爭中受到事實的教訓，可說是提高了識別能力。在海外，只看到一些言論和表面現象，未經歷中國大陸這十年間的大風大浪，對許多事情的確是不那麼容易了解的。

問：據我所知，四人幫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才在中國政壇上佔重要地位的。在此之前，這四個人甚至不是中共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那時候，作爲毛澤東夫人的江青，並沒有具體的黨政職務，張春橋的職務較高，是上海市委候補書記兼宣傳部長，姚文元的職務是上海「解放日報」的總編輯，至於王洪文，則只是上海一個普通的工人。他們是憑什麼搖身一變，爬到中共最高層的地位的呢？是憑着毛澤東的關係嗎？

答：應該說是憑着毛澤東夫人江青的關係。江青實際上是這四人幫的頭頭。但江青的上台也是有一定的時代背景的，並非單單依靠着夫妻關係。應該說，江青的上台，是當時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種需要。

大約從一九五八年蘇聯在布加勒斯特會議向中共施突然襲擊以後，中共中央就分成兩條線——即所謂一、二線。居於一線的領導人，主持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和具體事務，居於二線的，就領導着研究共產主義運動和反蘇修鬥爭的理論問題。根據毛澤東本人的建議，他處於二線；劉少奇則處於一線的領導地位，擔任了國家主席，以鄧小平爲總書記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則領導全國黨組織。

居於一線領導地位的劉少奇，在幾年時間內掌握了中央許多主要部門的大權，逐漸推行一條修正路線，特別在上層建築包括文化領域方面，更是如此。在舞台、銀幕，泛濫着帝王

將相、才子佳人的故事；在大學校園，培養一批批的精神貴族；在衞生部門，大部分醫生、有規模的醫院都設在城市，對農村的缺醫少藥現象視若無睹；……。對這些現象，毛澤東多次提出批評，但劉少奇均置諸不理，甚至封鎖毛澤東的指示，不讓它們同幹部和羣衆見面。於是，中央就形成兩個對立的司令部：毛澤東的司令部，和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一九六四年，江青開始插手中共文藝界的工作。她反映了毛澤東的意圖，在舞台上搞了一個現代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然後在一九六五年，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要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遭到劉少奇的抵制。毛澤東感到他的意見在北京不能實行，於是就由江青到上海去，與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張春橋研究，授意姚文元執筆寫了一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在上海「文滙報」首先發表。據說這篇文章經過毛澤東十七次的修改，其中一些重要論點都是毛寫的。由於組織這篇文章，以及這篇文章對文革起了發難作用的原故，江、張、姚三人也就憑此關係竄上台了。

問：組織寫一篇文章，就能起這麼大的作用嗎？毛澤東及中共黨總不能因爲有人寫了一篇好文章（何況還是經過毛多次修改的），就把一些籍籍無名的人一下子提到最高層吧？

答：「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可不是一篇普通的文章，它是反映了從一九五九年以來中共的路線鬥爭的。毛澤東說過，「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

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這就說明了，當時這個劇本的出現是有現實的政治目的的，是一部以借古諷今的方式向中共黨進攻的劇本。除此之外，當時以同一方式含沙射影地爲彭德懷翻案的文章和創作，在北京報刊上還有許多。「海瑞罷官」不過是冰山一角罷了。

問：「海瑞罷官」的問題儘管重要，但是，憑着這一篇文章，就使江、張、姚這三個人平步青雲，我想也不會那麼簡單，一定還有其他背景吧。

答：評「海瑞罷官」，可以說是揭開了文革的序幕。接着發生的許多事情，才是造就他們在文革的地位的。

首先，是圍繞着「海瑞罷官」的問題。劉少奇控制下的北京對姚文元這篇文章不予轉載，後來這篇文章在上海出了小册子，北京竟不予發行。

一九六六年二月，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北京市長的彭眞，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向全黨發出了一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滙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這個提綱迴避階級鬥爭，迴避「罷官」的要害問題，把對「海瑞罷官」的批判納入「純學術」討論的軌道。同一個二月，林彪利用他掌握的軍權，委托江青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由與會者寫成了一個「座談會紀要」，經過毛澤東三次審閱修改，成爲一個與

「二月提綱」對立的文件。在這個「座談會紀要」中，主要闡述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指出在文化戰線上，「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提出「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

「二月提綱」和「座談會紀要」這兩個對立的文件，在同一時間出現，是中共中央的兩個司令部在文藝戰線上鬥爭的結果。在這一個歷史時期裏，林彪、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若與劉少奇、鄧小平、彭眞相比，可以說原先是處於不得勢的地位的。及後他們了解了毛澤東的意向，起來參加反對劉少奇的鬥爭，儘管各人可能抱着不同的動機，但在客觀效果上是站在毛澤東一邊的。而毛澤東也需要有人製造輿論來動員羣衆參加鬥爭，否則就不能戰勝劉少奇一伙的修正路線。這就是文化大革命前夕爲這些人所提供的上台背景。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制定了一個「通知」，宣佈撤銷「二月提綱」，改組彭眞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以陳伯達爲組長，江青爲第一副組長，張春橋、姚文元都是文革小組的成員。

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八月五日毛澤東發表「砲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以及毛澤東主持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和通過的「十六條」，煽起了文革的熊熊烈火。

文化大革命號召「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許多執行過修正路線的從中央到地

方的黨政領導人都靠邊站了，許多黨政機關癱瘓了。文革小組既是領導造反的機構，它的權勢就在這時候極度膨脹。在這段期間，風頭最勁的是林彪和江青，他們二人借助毛澤東的威望，一個被稱爲毛澤東的「親密戰友」，一個是毛澤東的妻子。二人又互相標榜，互相吹捧，並聯手打擊大批得力的老幹部，以鞏固他們自己的地位。張春橋與姚文元則利用批判舊文化部、中宣部的機會，乘機掌握了全國的輿論工具，打出「革命大批判」的旗幟，到處「打棍子」，以建立他們的地位。由於文革期間江、張、姚的活躍，在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時，三人都進入了政治局。

問：但是王洪文，作爲一個普通工人，又是怎樣在幾年之內成爲中共副主席的呢？

答：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工人造反派實行大聯合，自下而上地向黨內走資派奪了權，成立新生的革命委員會，是爲「一月風暴」。在上海「一月風暴」的影響下，全國各省市也紛起效尤，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各地造反派均實現了大聯合，各省市都建立了革命委員會。

王洪文就是在上海的「一月風暴」中，起了先鋒作用的工人造反派領袖。奪權後，他擔任了上海革委會副主任。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時被選爲中央委員。由於張春橋是上海革委會主任，姚文元是第一副主任，因此王洪文也就同張、姚建立了合作的關係，並通過張、姚，與江青結成四人小宗派。

由此看來，文化大革命初期，江、張、姚三人，還加上林彪、陳伯達，是從並不怎麼得勢的地位，由於懷着不同的動機反對劉少奇，藉着煽動文革的烈火和毛澤東的威信，而竄上台的。但是，文化大革命不能一味造反，不能一直亂下去，待到毛澤東與周恩來一再强調落實政策，恢復秩序，抓革命促生產，進行鬥批改的時候，林、江等的錯誤做法和理論就要在羣衆中現原形。林彪大搞「個人崇拜」的做法連毛澤東都覺得「討嫌」，他也自感接班人的地位動搖了。爲了實現個人野心，林彪走上搞政變、搞陰謀、叛國投敵的道路，終於身敗名裂。

江青與林彪雖有勾結，但也是有矛盾的。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曾寫過一封信給江青，表示他不同意林彪的一些想法，並「深感不安」。應該說，江青是較早知道毛澤東對林彪不滿的。因此，在一九七〇年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圖發動政變，江青等沒有和他站在一起，相反地，他們唆使王洪文在那次會議上反對林彪的主張。於是，在反林彪的路線鬥爭中，王洪文受到毛澤東的賞識，期望他在高層的老中青三結合的班子中擔當「青」的角色。因此，一九七三年初，鄧小平復出工作時，王洪文也被調到中央來。這一年的八月，中共十大時，王代表中央作修改黨章的報告，並被選爲中央第二副主席。

王洪文到了中央高層後，江、張、姚的勢力更加膨脹，此後逐漸結成四人幫，大搞宗派

活動。

從上述的事實看來，四人幫主要是乘着文化大革命反對劉少奇的機會，藉着毛澤東的威望，以及同林彪的相互勾結、吹捧、利用，而上台的。他們上台初期所做的事，雖然對文革也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由於他們的個人野心，爲了個人地位，長期以來阻止落實政策，因此對文革是破壞、干擾多於推動。在人們逐漸識破他們的本相時，終於結成宗派，玩弄手段進行掙扎。這一切，是有一個發展和暴露過程的。

二、文化大革命與四人幫

問：你說四人幫對文革的破壞、干擾多於推動，我可不大同意。我覺得四人幫是極力維護文革的。他們大搞批鄧，就是因爲鄧小平要翻文革的案。我認爲，如果肯定文革的話，就要肯定四人幫這些文革小組成員；如果否定他們的話，那也就證明文革是搞錯了。

答：對於文革，我認爲不能採取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的態度。這樣是缺乏分析的機械看法。

我覺得文革的成就是主要的。首先，發動億萬人民，進行一次政治運動，自下而上地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行批判，批判修正路線和復辟路線，粉碎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

部，這本身就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壯舉。其次，在這一個過程中，大大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認識和思想覺悟，許多人都增强了識別眞假馬列主義的能力，這就能在今後發揮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作用，保證了國家的發展方向。其三，是在革命精神的推動下，出現了許多新生事物，從各個方面縮小「三大差距」，防止特權的產生與擴大，保證國家機器能永遠維護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其四，總結了經驗，說明了在社會主義這一個歷史階段中，復辟的主要危險在於黨內的領導人中出現走資派，這些人由於有了特權，容易滋生官僚主義者階級，因此在出現了這種危險的時候，宜發動羣衆自下而上地把他們打倒。

但是，在這樣一場大規模的、億萬人參加的政治運動中，缺點和錯誤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因爲這次運動是歷史上第一次，問題也就一定存在不少。決不是如林彪所說的：「文化大革命的成績最大最大最大，損失最小最小最小。」據說毛澤東曾認爲，對文革的功過應該「三七開」，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而三分錯誤中最主要的，一是武鬥，二是打擊大批幹部，並對他們進行虐待，違反了共產黨的一貫政策。

問：毛澤東有公開談到他對文革功過的這種看法嗎？

答：一九七〇年十二月，那時林彪還沒有叛變，毛澤東已經同美國作家斯諾談過他的這種看法了。斯諾對這次談話的報道，據說大陸的「參考消息」曾予譯載。（七十年代月刊也

在一九七一年八月號刊過這篇文章的譯文。）但在中共公開的報章上，對文革的錯誤卻從來不提。我想這是因爲四人幫控制了輿論工具，而文革的主要錯誤又同他們的干擾、破壞有關的原故。

問：文革的主要錯誤，爲什麼不應由發動文革的毛澤東和安排全國工作的周恩來負責，而要說是四人幫干擾、破壞的結果呢？究竟這樣說有什麼根據？

答：首先談談武鬥，這是在文革中最使人反感的做法。

在一九六六年八月通過的文革「十六條」已規定了：「要用文鬥，不用武鬥」。其後，毛澤東又多次强調不能用武鬥，「武鬥只能觸及皮肉，文鬥才能觸及靈魂」，「武鬥的大多數是黨內一小撮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挑起來的」。周恩來在文革期間接見紅衞兵代表，總是反覆强調要文鬥，不要武鬥。在制止武鬥方面，周恩來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是，林彪、江靑、張春橋在同紅衞兵談話中，却不是這樣了。江靑提出的口號是「文攻武衞」，即用武鬥的方式去保衞「革命派」。當時每一個造反組織都自稱「革命派」，於是大家都武鬥了。林彪在一九六七年八月軍委高級幹部會議上，甚至說要「武裝左派，要發槍給左派羣衆」，還對紅衞兵說什麼：「好人鬥壞人是應該，好人鬥好人是誤會，壞人鬥壞人是利用，壞人鬥好人是鍛煉。」總之，凡是武鬥都是好事。張春橋在上海接見紅衞兵時

說：「你們那派被人打也不還手！如果是我，那就受不了，非大幹一場不可。」在這些人的煽動之下，各造反派紛紛武鬥，搶部隊的武器，搶援越軍事物資，大打派仗，死傷了許多人。軍隊爲保護羣衆，避免人民傷亡，徒手前去阻止武鬥，也造成傷亡。這些挑動武鬥的人是有血債的。

在這期間，最辛勞的是周恩來。他日夜坐飛機到武鬥最激烈的地方，接見羣衆，勸服他們停止武鬥。一天只睡兩三個小時，吃飯時也要聽秘書滙報各地情況。他的身體也就是那幾年累壞的。

除了煽動武鬥之外，林彪和四人幫還在文革期間煽動「打、砸、搶」。明明規定不許打、砸、搶，但江青說什麼「革命的打、砸、搶好得很！」還號召要砸爛「公、檢、法」（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這樣一來，文革有一個時期就亂得不可收拾了。

問：你剛才說文革另一個主要錯誤是打擊大批幹部，這難道不是毛澤東的主意嗎？他發動文革主要目的，不就是要打倒跟劉少奇跑的大批幹部嗎？

答：毛澤東一貫的政策是「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在文革「十六條」中，也規定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因爲在文革前，即使大批幹部在劉少奇指示下執行過修正路線，但絕大部分是不自覺的，是爲了貫徹服從上級的紀律原則而去做的。因此，只要打倒

了劉少奇，讓大批幹部提高了路線覺悟，是應該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但是，林彪和四人幫卻從鞏固他們個人地位的目的出發，提出了「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號，使全國的黨政機構陷於癱瘓狀態，從而讓他們控制局面。這些人甚至把矛頭指向周恩來，發動五十萬紅衛兵包圍國務院，搶檔案材料，提出「砲打周恩來，解放國務院」的口號。此外，更衝擊外交部，藉鬥爭陳毅來把矛頭指向周恩來。

林彪和四人幫還破壞毛澤東制訂、周恩來執行的外交路線，指示「五·一六」紅衛兵燒英國代辦處。在中國大陸，許多人都知道江青是直接向「五·一六」集團發號施令的。

以上所說的，是林彪和四人幫破壞和干擾文革的主要方面。除此之外，他們在文藝方面和教育方面的破壞也是很嚴重的。「九大」以後，武鬥基本上沒有了，幹部也有大部分「解放」了，唯獨文藝方面很僵硬，始終做不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教育方面也是反反覆覆，看來這都跟四人幫的破壞、干擾有關。關於這些方面，報章上已揭露很多了。

問：四人幫要篡黨奪權，以他們的資歷來說，照道理應該拉攏幹部才是，為什麼他們要打擊幹部來造成自己的孤立呢？

答：我想，正因為他們資歷淺，本事低，心胸窄，野心大，於是嫉賢妒能，生怕別人的資歷賢能蓋過他們，使他們站不住。他們也拉攏人，但被他們拉攏的大多是要聽話的，能順

着他們的，而不是對國家、對人民忠心的，有本事的。此外，四人幫的私心還表現在對許多事情的忌諱，例如他們不許人提出文革的缺點，不許人們提林彪的「極左」，不許人們提經他們肯定的樣板戲的毛病，等等。他們又互相吹捧，彼此標榜，在文革時林彪和江青在這方面的表演最爲突出。所有這些，我認爲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大陸人民感到心情不舒暢，感到正氣不能伸張，是非也混淆不淸。由於文革，延續下來的問題和缺點，極大部分是因這四人幫佔據高層而產生的。是他們的保護和發展個人地位的私心，造成了他們在廣大幹部和人民當中不得人心。

三、爲什麼不及早處理？

問：照你所說，四人幫的上台是出於形勢的需要，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從文革以來，這十年間他們對中共內外政策的破壞、干擾，也十分嚴重，既然如此，爲什麼對他們的問題不及早處理？在這件事上，是不是毛澤東應負責任？

答：關於這個問題，我相信是受幾方面的因素所決定的。第一，這十年間，四人幫的罪行有一個發展的過程：起先也許只是在執行毛澤東的路線上犯了些偏差；繼而在毛澤東和周恩來要落實政策、糾正文革的某些錯誤時，四人幫深恐批到他們的頭上，就極力耍花招，對

抗毛、周的政策，這樣錯誤就嚴重些了；其後毛澤東對他們批評教育，他們不但陽奉陰違，而且擴張了野心，企圖在毛、周過世後接過最高領導權，這裏就圍繞着接班人問題展開了鬥爭；最後，在周、毛相繼去世後，他們露出了一舉奪權的企圖，並大搞陰謀分裂活動，這樣才走上無可救藥的地步。第二，隨着四人幫的罪行的逐步發展，人們對他們也有一個逐步認識的過程：起先可能只覺得他們的工作方法有錯誤；隨後就發覺到有思想認識的問題，但即使是思想問題也還是可以教育的；在屢教不改的情形下，毛澤東就採取壓制他們、防止他們取得最高權力的措施，但仍希望他們反省；直至毛逝世後，他們的野心暴露，作爲最高領導的華國鋒和黨中央的大多數人，才對他們採取斷然措施。第三，在一九七六年以前，毛、周均在世，又有鄧小平復出，四人幫的活動是不致猖獗到需要立即處理的；關鍵在踏入一九七六年以來，周恩來去世，鄧小平下台，毛澤東病重，才使四人幫更加跋扈。第四，據說毛澤東和江青於一九七三年即分居，但一般人是無法知道的。因此江青還是可以利用毛夫人的身份騙人。因有毛澤東的關係在，黨內對她的處理就倍感困難。

問：毛澤東在世時，別人處理江青的問題，也許要礙於毛的顏面。但毛澤東爲什麼不親自處理呢？如果毛自己說一句話：立即把四人幫撤職嚴辦。誰會不聽從？

答：問題在於到什麼時候才使毛澤東、周恩來和其他領導人覺得要把四人幫嚴辦。何況

在黨的最高層，還有四人幫的聲音呢！我覺得在今年以前，毛、周對四人幫的問題基本上還是採取壓制的措施，以爭取他們接受教育、改變態度。這可以說是中共一貫以來對犯錯誤的幹部的政策。

在林彪叛變以前，四人幫同林彪的關係密切，他們藉文革而掌握的權力是相當大的，可以說是既有文權又有軍權。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事件發生以後，毛、周除了外事工作特別頻繁之外，內部也有兩個十分迫切的問題要解決，其一是批林整風，肅清林彪「左」右傾思想的流毒，其二是落實政策，讓大批得力的幹部復職，並要解決接班人的問題。這兩個大問題，一是思想，二是人事，都牽扯到四人幫的身上。批林整風，由於四人幫在文革時與林彪互相吹捧，互相配合，一起散播「極左」思潮，因此清理林彪的思想流毒是會清理到這四個人的頭上的。至於落實政策，解放幹部，大批賢能的人復職，對四人幫的地位也是一個威脅。

對這兩個大問題，四人幫的對抗辦法是：一，利用他們掌握的輿論工具，不斷轉移批林整風的方向：一會兒藉批林批孔轉到大學儒法鬥爭方面去，一會兒又在批林批孔中加插一個批走後門，以三箭齊發的方式來削弱肅清林的流毒；一會兒又藉口批修正主義搞出一個批經驗主義來，以針對有工作經驗的老幹部。二，以各種手段力圖阻止老幹部的復職，或阻止老幹部復職後掌握權力。另一方面則藉口老中青三結合，培植個人勢力，把一些人推薦到「等

待接班」的位置，例如一九七三年極力推薦王洪文到黨中央的高層位置，等待毛、周過世後接班；一九七四年底，四屆人大舉行前又試圖安排由張春橋組閣，當總理，由王洪文任人大副委員長，等待接朱德的班。三，不斷打擊周恩來，特別是在一九七二年周恩來得病以後，更從各個方面對周恩來進行打擊，因爲四人幫知道，周恩來受到毛澤東信任，在幹部中有崇高威望，而對他們四個人一向來的言行又看得很淸楚，且不以爲然。因此他們把周恩來視作他們奪取最高權力的一大阻礙。

問：關於四人幫反對周恩來，有什麼具體的例子呢？我覺得一九七二年周恩來患了癌症以後，已注定不會長壽了，對四人幫奪取最高權力應該不會造成威脅才對，爲什麼還要打擊他呢？

答：問題不在於周恩來一個人，而是周恩來所代表的對毛澤東政策的忠實執行，是周恩來所信賴的大批幹部，是周恩來對安排接班人的發言權。對四人幫來說，肯定了周恩來就是否定了他們自己。

據傳說，一九七三年周恩來住進醫院治病，在醫院裏仍然堅持工作，同各地的負責人舉行會議，會見外賓。而江靑在這時候却在毛澤東面前誣告周恩來，說周根本沒有病，在醫院裏天天接見幹部，企圖搞陰謀活動。毛澤東當場對江靑痛斥。一九七四年底，江靑又指使王

洪文去找毛澤東，又是誣告周恩來，並提出應讓張春橋做總理，組織內閣。又一次受到毛澤東的痛斥。

一九七四年四人幫還藉批林批孔運動來攻擊周恩來。據說有一次江青在北京體育館主持批林批孔大會，事先不通知周恩來，直至開會前一刻才通知他。周恩來因送外賓，趕到會場時已經遲到，江青乘機指桑駡槐地對他進行諷刺。會上四人幫絕口不提批林，只談批孔，含沙射影地指責現代孔老二的「復舊」措施。

除此之外，近來中共報章還揭露了四人幫通過對電影「創業」的迫害，把矛頭指向周恩來；並在廣州拍一部被他們稱爲「原子彈」的影片，影射攻擊周恩來。

問：對於四人幫的這一類言行，毛澤東應該是知道的，爲什麼他不能採取果斷措施呢？又或者，他實際上是被四人幫包圍着，已聽不到其他幹部的聲音了呢？

答：從近來中共報章所透露的情況來看，毛澤東在今年以前，對四人幫的所作所爲，是有了解的，但也許只是信不過把黨國的重擔交給他們，而不認爲他們會發展到搞政變的地步。至於今年以來，毛澤東的身體已經越來越不行了，他即使有決心去處理這件事，恐怕在此風燭之年也只能交給華國鋒和其他的人去做了。

多年以來，毛澤東在處理人事安排上已表示出了對四人幫的不信任。最明顯的，就是自

從一九七二年周恩來得病以後，一九七三年初，毛澤東讓鄧小平恢復工作。照我的想法，毛澤東把鄧小平放在一個重要地位，原是打算由他來接周恩來的總理職位的。當然，鄧小平的年紀也大了，恐怕也只是一個過渡的人物。較爲長遠的接班人，則是在其他上升中央的較年輕的領導人中選擇。其中當然也不排除王、張、姚等，但恐怕還得經過鄧小平的過渡時期的考驗、鍛煉，才能在鬥爭的風浪中決定由誰接班。

一九七五年是具關鍵性的。這一年周恩來越來越病重，基本上已由鄧小平掌權。這一年，毛澤東對四人幫的批評更嚴厲。鄧小平也是反對四人幫的。但他的思想出發點有些不對，方法也不對。他代表了許多在文革期間受到打擊而仍然有氣的幹部，不僅否定四人幫，而且不看主流地否定整個文化大革命，於是給予四人幫的反撲以可乘之機。而在這一年裏，華國鋒主持農業學大寨會議及其他工作，包括釋放原國民黨戰犯的工作，顯示了成績，在國務院幾個副總理中，其活躍的程度僅次於鄧小平。華國鋒的工作表現，受到毛澤東的信任。因此，在今年初，周恩來去世、鄧小平下台之後，毛澤東即提議華國鋒任第一副主席和總理，職位超越四人幫之上。這也明顯地表示了毛澤東對四人幫的不信任，以及實際上推薦了華國鋒任接班人。

去年一月，中共中央發出一號文件，通告十屆二中全會選出鄧小平爲中央副主席、國務

院第一副總理。這文件使張春橋組閣做總理的夢想落空了。今年二月，中共中央的一號文件，則是通知由華國鋒任代總理。那是周恩來去世、鄧小平開始受批判之時，原為第二副總理的張春橋沒有接上代總理的職位，心中懷恨，於是寫下了「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的短文，寫道：「又是一個一號文件。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正是得志更猖狂，來得快、來得兇、垮得也快。……」文末抄了王安石的「元旦」詩：「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表示他始終要奪取總理職位的野心。

問：除了人事安排之外，在中共十月二十五日的二報一刋社論中，又報道了毛澤東生前對四人幫的批評。這些批評為什麼不在毛澤東生前發表？其眞實性會不會有問題？

答：剛才說過，在毛澤東生前，四人幫的問題還未發展到要處理的時機，那時候當然不好把毛澤東批評他們的話公佈了。

實際上，毛澤東對江青的批評，在大陸是早有傳聞了。

一九七一年林彪叛變後，大陸由中央傳達了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七月「給江青的一封信」，信裏已寫道：「我看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沖昏頭腦。要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一點我不知道和你講過多少次了，四月在上海還講過。」

據說由於江青屢教不改，毛澤東為了不想讓江青利用他的威望去標榜自己，從一九七三

年起就同江青分居了。這以後，江青如要與毛澤東見面，就得先用書面寫明要見面的理由，交給聯絡員，得到毛的允許才能進入中南海毛的住所。據說有一次毛給江覆信說：「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有馬列書在，有我的書在，你就是不研究。」又說：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大意，非原文）

除了中共報章所引的，毛澤東在一九七四和七五年批評王張江姚「不要搞宗派」「不要搞四人幫」等等之外，據外電和海外其他報紙的報道，以及一些朋友在大陸旅行所聽到的傳聞，較爲可信的還有以下一些毛澤東對江青的批評，這裏摘錄出的是大意，並非原文：

一九七四年，毛澤東曾說過：江青到處插手，到處訓人，江青有野心，有沒有？我看是有。

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公開說：她代表她，她不代表我。總而言之，她是代表她自己。

據說王張江姚四人幫曾自詡爲「無產階級鋼鐵公司」，針對這種說法，毛澤東有一次說：不要經營兩間工廠，一間鋼鐵工廠，一間帽子工廠。（前者指搞宗派，後者指專門給別人扣帽子。）

針對四屆人大前，江青要求讓張春橋組閣，選王洪文作人大副委員長，毛澤東說：「江

青有野心。她是想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

江青在一九七二年會見美國學者羅克珊·威特克，談了六十小時，爲標榜自己而洩露了黨的機密。據說毛澤東知道後大怒，聲言要江青以後少說話，不准見外賓，不准批發文件，不准組閣。

一九七五年據說毛澤東又公開批評江青：你的結怨太多太深了，別人對你有意見，又不好當面對你說。你有特權。毛還說：我年事已高，已經八十一歲了，身體又不好，你也不體諒。

所有這些話，有的中共報章也已隱約透露（如鋼鐵廠、帽子廠的提法），有的尚待證實。但這些話，包括中共報章發表的和未發表的，大都很像毛澤東的語氣。因此，我相信毛澤東的確是在一九七四年、七五年經常在公開場合批評江青和四人幫的。

前年和去年，四人幫還不是那麼跋扈，毛澤東已對他們作如此嚴厲的批評了；按照今年來四人幫的惡劣言行，如果毛澤東健康的話，是早就處理了。

四、批鄧與天安門事件

問：你剛才說，進入一九七六年以來，四人幫越來越跋扈、猖獗，是不是主要指批鄧和

天安門事件？對這兩件事，當時中共報章的報道分析最使人難以接受。現在四人幫下台了，你覺得是否應該重新評價這兩件事？

答：首先，我說今年以來四人幫更加跋扈，並不是專指批鄧和天安門事件的。近來中共報道四人幫的罪行中，大部分都是今年內的事。其中最使人不能容忍的是他們對生產的破壞，以及對抗震救災的破壞。他們阻撓對外貿易，說外貿是「爲資產階級服務」。還指責要求火車正點是「正點掛帥」，都可說荒謬到極點。關於揭露四人幫的文章，我相信還會繼續湧現。至於批鄧的問題，最近的文章中也揭露了四人幫藉口批鄧而破壞生產，動輒扣人以「唯生產力論」的帽子。從這些文章看來，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共至少認爲前一階段的批鄧文章是有一部分錯誤的了。

問：是有一部分錯誤，還是全部錯誤呢？究竟鄧小平該不該批？抑或批鄧根本是四人幫爲了奪權而搞出來的？

答：照我看來，前些時候的批鄧文章是有錯誤，但不是全部錯誤。也就是說，鄧小平是有錯誤的，他的「三項指示爲綱」和「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的主張，是違反中共歷來把革命放在首位、堅持政治掛帥的做法的。但是，四人幫炮製的批鄧文章，却不僅批鄧的錯誤；他們爲了達到個人的目的，對於鄧所提出的正確的意見也加以否定。其中最强

詞奪理的是對「總綱」、「滙報提綱」、「二十條」等所謂「三株毒草」的批判。簡直是先把人家的原意歪曲，然後才把歪曲了的意思進行批判。據說，四人幫批這所謂「三株毒草」是別有用心的。他們說這「三株毒草」是鄧小平「授意炮製」的，「授意」給誰去「炮製」呢？據說牽涉到國務院好幾個副總理的頭上。四人幫的批鄧，不是爲了肅淸鄧的錯誤影響，而是要把鄧「一棍子打死」，而且還想乘機打倒其他領導人，以製造他們的上台的機會。這是我的看法。

問：從天安門事件發生的背景來看，當時羣衆的情緒似乎主要是對批鄧感到不滿，對四人幫不滿。今天來看，你覺得把天安門事件稱作反革命事件是否恰當呢？

答：按照我個人的看法，天安門事件儘管不排除有「一小撮」壞人鬧事，但在今天看來，把整個事件稱作反革命事件是不恰當的。因爲大多數去參加悼念周恩來的人，甚至一部份抗議花圈被移走的人，主要是對當時局勢的不滿，對四人幫不滿。他們表達自己的意見，是不應該被視爲反革命的。

問：當時羣衆對局勢不滿，除了批鄧之外，主要是指哪些方面？

答：照我想，對批鄧不滿恐怕不是最主要的。

首先，自從周恩來去世後，人民的心情十分沉重，一方面懷念周恩來，另方面感到毛澤

東年事已高，鄧小平又受到批判，覺得黨和國家沒有一個理想的接班人，因此深為國家前途擔憂。

其次，最主要的，是四人幫當時企圖在國內掀起一個反周恩來的高潮，為此從各方面進行試探。其中包括不許人民纏黑紗、不許單位開追悼會。此外，在上海「文滙報」上發表了一段攻擊周恩來的文字，說什麼「黨內最大的走資派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重新起用」，因而在上海引起抗議的風波，羣衆包圍「文滙報」，要報館解釋這句話的含意，從上海通向各地的火車，都被貼上批判「文滙報」的標語，使這件事迅即傳遍各地。還有就是四人幫掌握的供高級幹部閱讀的「參考資料」，在這時候轉載了海外某雜誌一段汚蔑周恩來的報道，這件事也引起了幹部們的抗議，迫使「參考資料」編輯部趕快在報上公開檢討。所有這些，都可以說是四人幫對人民情緒的試探。如果人民不抗議，他們就可能把批鄧升級為批周了。人民看到這種試探的含意，為保衞周恩來的名譽，於是强烈地要求表達對周恩來的擁護與悼念了。

其三，對批鄧的問題，當時毛澤東已指示是一個內部問題：鄧小平犯了錯誤，但不是敵我矛盾。但四人幫為了要把鄧小平打下台，就用盡最粗暴的語言，而不採取毛澤東所指示的「治病救人」的態度。甚至在未對鄧公開點名時，就用專車把外國記者載往清華大學看批鄧的大字報，借助外電把鄧的問題公開化。

其四，自文革以來，人民對四人幫、特別是對江青已極爲憎惡。周恩來逝世，江青前往瞻仰遺容，竟然不脫帽子。電視播映這鏡頭時在許多地方幾乎引起騷動。傳說瀋陽部隊一位戰士氣得把櫈子扔向電視機。廣州北京路街頭播映這段電視時，圍看的羣衆齊聲喝「打」。過了幾天，廣州街頭出現了大字標語：「擁護毛主席，悼念周總理，懷念楊開慧，打倒武則天！」從這四句話可以看出羣衆當時的心情是怎樣的。

問：從外電報道，清明節天安門廣場的花圈上的字句，大部份都是反映你所說的這幾種情緒的。照這麼說，當局移走花圈應該說是刺激羣衆情緒的導火線了。

答：移走花園，激怒羣衆，相信是造成天安門事件的導火綫。當然，在這過程中也有一小部份壞人，乘機鬧事。但是，誰爲這些反革命份子製造機會呢？不是羣衆的聚集，而是移走花圈的人。據傳說，在天安門事件中，指揮民兵去移走花圈和鎮壓羣衆的，同王洪文有直接關係。事後，除有少數壞人被捕之外，還有許多誠心擁戴周恩來的工人、幹部被捕。四人幫大搞追查「謠言」，實行白色恐怖，據說王洪文還下令槍斃被捕者。幸而華國鋒和各級幹部、特別是公安部門的人頂住，才沒有讓四人幫大開殺戒。有人說，當天在現場直接指揮民兵的人，十月初也同王洪文一起被捕了。

問：天安門事件，對四人幫的下台有影響嗎？

答：我想沒有直接的影響，但間接的影響是有的。第一，天安門事件，充份暴露了四人幫的不得人心。這是有助於華國鋒和中共其他領導人對四人幫下決心掃蕩的。第二，作為天安門事件的直接結果，是鄧小平被撤職，而華國鋒却上升到超越四人幫的地位。於是，從這以後，野心勃勃的四人幫就以華國鋒作為鬥爭的對手了。第三，從一、二兩點引伸而來，造就了華國鋒日後成為中共領袖的時勢，他果斷地粉碎四人幫，被選為黨主席，也就成為革命的需要，歷史的必然，和反映羣衆的意願了。

五、四人幫是怎樣下台的？

問：四人幫下台，華國鋒出任黨主席，其間的經過海外有各種各樣的報道，究竟這些報道有多少是可信的？華國鋒的資歷看來不如其他元老，為什麼受到如此普遍的擁戴呢？

答：要回答這些問題，我看要先從華國鋒今年初出任第一副主席和總理時所面臨的局勢講起。今年四月，他當此重任時，面臨的考驗是相當嚴峻的：一，作為文革以來全國局勢穩定的象徵的周恩來去世了；二，毛澤東年事已高，又患了重病，他本人的精力固已不濟，别人處理事情還得考慮會不會影響他的風燭之年，以及他一旦過世時全國局面能否控制；三，四人幫因為周恩來去世和毛澤東病重，變得更加跋扈，在批鄧問題上層層揪「代理人」，以

此打擊幹部，搞得是非不分，人心動盪；四，唐山地震，黃河水漲，生產被四人幫破壞，國家的經濟計劃也很成問題。

華國鋒面臨這麼多嚴重的難題，尤其是四人幫「拉大旗作爲虎皮」，眞是不容易應付。就以唐山地震來說，據說死亡人數以十萬計，房子幾乎全部倒塌，災情是極嚴重的。地震發生後，面臨着十分緊迫的救死扶傷、防止瘟疫和物資供應緊張等重大問題。華國鋒同其他領導人投入繁忙的抗震救災工作中，但四人幫却在一旁冷言冷語地說「少數人拿抗震救災來壓革命，壓批鄧」，說「不管東震西震，不能冲淡批鄧」，江青甚至說華國鋒等的繁忙工作是「走資派驚慌失措」，甚至說「抹掉個唐山算得了什麼」。四人幫位居高層，他們的態度是足以干擾抗震救災的。華國鋒能沉住氣，實實在在地去做，可說極不容易。

問：剛才你說，自從今年四月華國鋒任第一副主席和總理後，四人幫即以華爲鬥爭的對手，有什麼明顯的事實根據嗎？

答：我想主要是從批鄧中表現出來。批鄧本來只是批他的「三項指示爲綱」，但四人幫把批鄧的範圍擴大到批所謂「三株毒草」方面，說是「鄧小平授意炮製」的，暗示他們隨時可以把被「授意」的人拿出來批，藉此嚇人。照我想，四人幫的心態，是以爲他們利用輿論把鄧小平轟下了台，於是洋洋得意，以批「三株毒草」來威嚇華國鋒以及其他中央和地方上

的負責人，迫人就範。

看來華國鋒在中央的資歷雖淺，却有勇氣頂住四人幫，根據毛澤東一貫的想法定出批鄧的部署和方針，沒有讓四人幫貫徹層層抓所謂「走資派代理人」的做法，保護了地方幹部和人民，使局面基本上穩定，沒有出什麼大亂子。幾個月的困難工作，證明華國鋒受得住考驗，因而赢得了黨心民心。

問：幾年來，四人幫的野心是奪取最高權力，今年以來他們同華國鋒的鬥爭焦點也應該是接班人的問題吧！除了抓住批鄧問題大做文章之外，他們爲奪取最高權位還作了些什麼佈置呢？

答：由於周恩來去世、毛澤東病重，四人幫當然知道接班人的問題已迫在眉睫了。至於他們作了些什麼佈置，中共報章的報道很少，只是從一些未經證實的傳聞中可以綜合爲以下幾點：

第一，是大拉關係，擴展勢力，穩固陣脚。四人幫被捕後，北京有所謂「四大、四小、三嘍」的說法。「四大」指四人幫，「四小三嘍」指次於四人幫的七個主要附從者，他們也一起被捕了。這些人控制了輿論工具、教育陣地和文化要津。而最嚴重的，是利用他們長期在中共中央的關係，於汪東興主持的中共中央辦公室之外，另立了兩個辦公室，一個是王洪

文主持的所謂「王辦」，一個是毛遠新主持的江青的辦公室，這兩個辦公室，一度把自己凌駕於毛澤東和中央辦公室之上，不斷發出一些與中央辦公室對立的文件，樹立他們個人的威信。下級幹部在接到不同的文件時，往往無所適從。

第二，製造他們上台的輿論。四人幫控制輿論工具，不斷給人扣帽子，以打擊別人來抬高自己。除此之外，據說今年初周恩來去世後，上海曾出現「擁護張春橋任總理」的大字報，這也是四人幫指使的。

毛澤東去世後，據說江青曾在九月二十九日到清華大學演講，她的追隨者在大會上說：「江青同志壓抑心頭的悲痛，邁着領袖的步伐，來同我們講話。」

又據說，十月六日，四人幫被粉碎以後，在「人民日報」和廣播電台搜查到四人幫爲政變成功後準備的二報一刋社論：「告全黨全國人民書」，在這篇文章裏，四人幫宣佈華國鋒反黨，江青任黨主席，張春橋任總理，等等；搜查到的東西中，發現連江青的「標準相」也已經拍好了。

第三，控制民兵。因爲城市的民兵大部分是工人，平時是有工作的，在進行軍事行動時，他們主要聽從民兵總指揮的命令。王洪文是北京的民兵總指揮之一，又是上海民兵的總指揮。在毛澤東去世後，據說王洪文下令把最新式的自動步槍、機槍發給十萬上海民兵，並

密令他們保持警惕，可能會因毛澤東去世而發生動亂。此外，並配備了二十多列火車，打算在必要時把上海民兵運載到北京作戰。

第四，調動軍隊。毛遠新是瀋陽部隊的副政委，張春橋是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兼南京部隊的副政委。在毛澤東去世前，四人幫又把毛遠新安排爲八三四一部隊的副政委。他們認爲必要時是可以調動部分軍隊的。傳說流產政變發生時，瀋陽部隊已有部分兵力到了北京郊區駐紮；但另一個傳說則說四人幫根本調動不了一兵一卒。眞相如何，尚待證實。

問：四人幫爲奪權而作的這些準備，究竟華國鋒等人有沒有察覺呢？整個事件是否因爲四人幫的事機不密而流產的？

答：我相信自今年以來，由於四人幫的猖獗，華國鋒等人應該可以看到他們的野心了。但在他們的政變陰謀暴露之前，是沒有根據可以把他們逮捕的。中共的政策一向是强調挽救教育，並認爲反革命的路是反革命分子自己走下去的，而不是誰迫他們走的。四人幫的被粉碎，是因爲他們自己發出了一個篡黨奪權的訊號，從而洩露了天機，也提供了對他們施行鎮壓的證據。

問：據中共報章說，關鍵在於四人幫揑造了一個「按既定方針辦」的毛澤東的「臨終囑咐」。我就看不出這句話有什麼決定意義。

答：當然，如果孤立地從這六個字來看，是看不出有什麼嚴重問題的。但如果與其他事情聯繫起來，揑造這個「臨終囑咐」就顯得十分重要了。

據說在毛澤東去世的那一天，江青到中南海毛澤東的住所，不肯走，要中央辦公室的機要秘書把毛澤東的手稿、字迹給她，由她加以保存。華國鋒不同意，表示毛澤東的手稿、字迹、文件，是黨的寶貴財產，不能給私人保存。從這件事上，已洩露了江青要拿去毛的手稿，加以篡改、爲她所用的陰謀。

接着，原在瀋陽工作的毛澤東的姪兒毛遠新，因毛病重留在北京。毛去世後，毛遠新合該回到瀋陽。但江青等却留着他在北京，說要協助起草十屆三中全會的文件。這又流露了他們爲要在北京奪權而加强實力的野心。

最關鍵的，是四人幫揑造了「按既定方針辦」這個「臨終囑咐」，並且未經中央討論，就搶在追悼大會的前兩天，通過「人民日報」社論發表了出來。這樣做，一則表明他們是毛澤東的「臨終囑咐」的壟斷傳達者；二則暗示他們手頭尙掌握着毛的其他的「既定方針」，其中可以包括由「江青任黨主席」等揑造的指示；三則表示他們傳達毛澤東的指示，在黨報發表社論，可以不必通過中共中央，不必徵求他們的上級華國鋒的同意，既如此，那麼他們以後也隨時可以利用黨報把誰捧上台、把誰打下去。

據說，這篇社論發表後，華國鋒曾拿出毛澤東的手迹給他們看，那是毛澤東在四月三十日親筆寫給華的，原文是「照過去方針辦」，當然這不是「臨終囑咐」。「照過去方針辦」，表示按照過去的先例、做法去辦。在接班人問題上，黨中央主席去世了，照過去方針辦，就是由第一副主席接任，直至下次中委會選出新的主席爲止。這也是一般國家、政黨的慣例。若是「按既定方針辦」，那就要看「既定方針」是什麼，以及誰去掌握、去傳達這個「既定方針」了。這裏面分別極大。

據說，在喬冠華爲出席聯合國大會所準備的講稿上，原來也有根據社論寫下的「按既定方針辦」六個字，但這講稿給華國鋒審查時，華把這六個字勾去了，並加批語，說這六個字錯了三個。張春橋看到華的批語，大起恐慌，下令「不得外傳，以免引起思想混亂」。

在華國鋒指出了「按既定方針辦」的錯誤之後，四人幫在事實面前，表面上不表示意見。但十月三日，王洪文却威脅地說：「中央要出修正主義」，「要把眼睛睜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義」。十月四日，四人幫以「梁效」的筆名，在「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的文章，文章說：「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然沒有好下塲的。」文章中並提出了一個選拔「接替去世的偉大天

才」的問題。這就表示四人幫決心不顧事實，强迫人家指鹿為馬，實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據說華國鋒看到這篇文章以後，就對中央政治局的幾個人說，這篇文章是進攻的訊號。葉劍英認為應該「除四害」。於是分頭作好了佈置。到十月六日，華國鋒突然召集政治局會議，就在會塲上逮捕了四人幫。當晚並出動軍警逮捕了其他的附從分子。十月七日清晨，原中聯部部長耿飈接管了「人民日報」、新華社、電台等傳播機構。對於四人幫設有組織據點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天津小靳莊等等實行臨時軍管。許世友則到南京軍區，負責臨時軍管上海，緊接着中央派出蘇振華、倪志福、彭冲接管張、姚、王三人的上海職務。瀋陽地區也實行了臨時軍管。所有這一切，都做得十分乾淨利落。南斯拉夫一家報紙稱之為「人類近代史上最巧妙最漂亮的政治戰役之一」。在這個過程中，華國鋒和其他中共領導人表現了他們的政治勇氣，當機立斷，靈活性，以及對羣衆情緒的敏感性。

六、接班人、法制及有關問題

問：華國鋒當上中共黨主席以後，中共報章老是强調他是「毛主席親自選定的接班人」，究竟他是不是毛澤東親自選定的？毛澤東親自選定是否那麼重要？毛澤東不是也選過劉少奇、林彪嗎？

答：說毛澤東「親自選定」，主要是針對四人幫以「毛主席既定方針」來推舉江青的提法。毛澤東提議華國鋒任第一副主席，那就意味着把他安排到接主席職的位置上，這可以說是「親自選定」。當然，這職位是還要中共中央在十月七日作出決議通過的。毛澤東親自選定是否那麼重要？我覺得在這次事件中，由於毛澤東的崇高威望，由於鬥爭的對手是毛夫人江青，特別由於四人幫祭起了「臨終囑咐」的法寶，因而對許多人的信心來說，這一點目前是比較重要的。但從馬列的觀點來看，由一個人來選定接班人則是不妥當的。因爲人的壽命長短往往很難預知，人與事又是不斷變化發展的，因此領袖必須在羣衆鬥爭中產生，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必須在眼睛雪亮的羣衆中接受考察。中共「九大」規定林彪是接班人，我認爲是很錯誤的。羣衆領袖必須應革命需要而產生。如果是傑出的，那麼即使沒有被選定最後也會成爲領袖。相反，如果是野心家、陰謀家，則即使被規定了也做不成。試想，如果江青「按既定方針辦」做了黨主席，在失盡黨心、軍心、民心的情形下，她可以站得住多久呢？華國鋒在這一年來，的確是應需要而成爲大風大浪中產生的領袖。在毛澤東逝世後，他想不幹也不行，因爲如果他不幹的話，就等於拱手任江青去幹了。而這是羣衆情緒所不允許的。

問：說四人幫是野心家、陰謀家、教條主義者，很容易理解，但爲什麼說他們是修正主

義者、是走資派呢？他們不是一直在宣傳馬列的理論、最積極主張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嗎？這怎麼能和修正主義沾上邊？

答：所謂修正主義，是指修改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在中國來說，更直接指修改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馬列原理的哲學基礎是辯證唯物論，但從四人幫的理論文章中，則是充滿形而上學和唯心的觀點，例如他們只講革命，不抓生產，說什麼「革命搞好了，生產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這就是一種唯心主義的脫離實際的理論。馬列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最近，中共報章揭露，四人幫在去年初曾大搞「反對經驗主義」，說成是「當前的大敵」。毛澤東當時即予以批判，說：「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能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在「毛澤東選集」中，關於反對教條主義的論說，佔有頗重要的地位。因為教條主義實際上是反對實踐第一、反對唯物論的反映論的，也就是反對馬列的哲學原理，因而是修正主義的一種表現。

毛澤東思想的要義在於以馬列理論結合中國的實際，用來解決實際問題。張春橋提出「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是脫離實際的，因為在實行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也只能是在意識形態上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中共憲法所規定的專政對象除地富反壞右之外，只是「反動資本家」，對一般民族資本家、資產階級主要是教育和改造的問題，不能濫施專政。這種脫離

實際的理論也是修正主義理論。

其次，光是口頭上高喊馬列主義，口頭說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是不足爲信的。所謂聽其言而觀其行。四人幫的生活作風正是擴大資產階級法權，過着特權階級的生活，就如同今天蘇聯上層的修正主義者一樣。

問：從整個事態看來，這次的鬥爭仍和林彪那次一樣，焦點在「接班人」問題上。這明明是權力鬥爭，爲什麼中共老是說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呢？

答：毛澤東說過，「世界上一切革命鬥爭都是爲着奪取政權，鞏固政權。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勢力鬥爭，也完全是爲着維持他們的政權。」根據這個觀點，不能否認這次的鬥爭是權力鬥爭。而且，應該說，這次的權力鬥爭正是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最集中反映。

問：這十年來，中共老是發生高層的鬥爭，劉少奇事件亂一次，林彪事件又亂一次；周恩來死後亂一次，毛澤東死後又亂一次。這是否意味着政權不穩？或者制度本身有問題？而且這樣鬥來鬥去，豈不是使人民對中共黨失去信心？

答：按照馬列的理論，有階級存在就有鬥爭，「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在資本主義社會，鬥爭主要發生在資產階級統治者與無產階級被統治者之間。資產階級政黨雖也有鬥爭，但實行的是同一條路線。在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主要反映在共產黨內，反映在黨

內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恢復資產階級專政、國家要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這兩條路線的鬥爭。有人說，美國是兩個政黨一條路線，中國是一個政黨兩條路線。這可以說是很好的概括。

按照共產黨的哲學，這種鬥爭是進步的動力。歷史事實說明，中共每經過一次路線鬥爭，革命形勢就向前發展，中共黨的力量就得到加强。一九二七年中共克服陳獨秀右傾路線後，就在井岡山建立根據地，發展了軍事力量。接着，克服了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的「左」傾和右傾路線後，中共就取得了長征的勝利，在陝北站穩脚步。一九五三年批判了高崗、饒漱石右傾路線後，就取得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勝利。一九六六年掀起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劉少奇的修正路線後，國家就更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總之，按照共產黨的哲學：鬥爭不可避免，鬥爭是前進的動力，鬥爭能促進生產，鬥爭能鞏固政權，鬥爭可以教育幹部和羣衆，提高人們的認識。人民如果從鬥爭哲學的觀點去認識中共黨，是不會對黨失去信心的。否則，像蘇聯那樣，整個領導層已被新資產階級控制，蘇聯社會的階級鬥爭，已像美國那樣，主要地表現在統治階級與廣大人民之間，人民才眞正對國家失去信心。

問：但是，爲什麼這十年來，高層的鬥爭這麼頻繁地發生呢？文革以前，儘管也有鬥

爭，但上層總是比較穩定的吧。不會像近年那樣，我們老是要注意：哪一個人忽然不見了？哪一個人忽然又出來了？

答：按照我個人的想法，首先，社會既有階級存在，黨內鬥爭就是不可避免的。其次，近十年來不斷在中共領導層出現鬥爭的原因，我想可以從兩個方面看：一、一條錯誤路線若未經過徹底肅清，就會埋下另一次新鬥爭的伏線；二、批判一種錯誤傾向的同時，往往會掩蓋着另一種錯誤傾向，這樣就會有一「左」－右的反覆鬥爭。中共每一次「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出現，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產物。

這種－「左」－右的反覆鬥爭，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也出現過，那就是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六次「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

一九二七年陳獨秀在黨內推行右傾路線，只强調同國民黨合作，不作同國民黨鬥爭的準備，結果被蔣介石的淸黨運動殺個措手不及，五萬共產黨員有四萬被殺，黨外羣衆被殺死的有三十三萬人。

這場血的教訓使共產黨人十分仇恨。在仇恨心理和憤怒情緒的支配下，中共臨時政治局書記瞿秋白推行「左」傾盲動主義路線，錯誤地估計「革命形勢不斷高漲」，反對深入農村積蓄力量，主張冒險進攻城市，結果又使革命力量遭到損失。

一九三〇年克服「左」傾盲動主義路線後，中共力量得到擴展，成爲有十萬軍隊、在十多個省建立根據地的革命勢力。這時，以李立三爲首的中共領導人被勝利衝昏了頭腦，以爲全國勝利在望，就推行一條更「左」的路線，集中紅軍力量攻打中心城市，提出「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政權」的口號。這條路線受到毛澤東的抵制。

一九三〇年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批判了立三路線。但批判得不夠徹底，「左」傾思潮沒有肅淸，於是造成了王明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推行一條比立三路線更「左」的機會主義路線。他在革命性質上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線；反對統一戰線，鼓吹中間派（指所有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是最危險的敵人；在鬥爭策略上主張「一切鬥爭，否認聯合」；在軍事路線上始則推行冒險主義、繼而改爲拚命主義和逃跑主義；在組織上實行宗派主義，對不同意見的黨內同志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王明這條「左」到無可再「左」的路線，使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失利，中共在紅區的力量損失百分之九十，在白區的力量損失百分之百。紅軍被迫轉移，進行長征。

在這段期間，中共黨內連續出現三次「左」傾，一次比一次更「左」，就是由於陳獨秀右傾路線帶來的巨大損害，使中共黨內一些人錯誤分析瞿秋白、李立三的路線的性質、根源，把他們的「左」傾路線指爲右傾，以至在「反右傾」的口號下，錯誤打擊持正確意見的

幹部，推行更「左」的路線。而更「左」的路線之所以能取得統治地位，則是由於對前一個錯誤路線的思潮，沒有在全黨肅清的原故。

周恩來在一九七三年中共十大的政治報告中指出：「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要注意一個傾向掩蓋着另一個傾向。反對陳獨秀的『一切聯合，否認鬥爭』的右傾機會主義，掩蓋着『一切鬥爭，否認聯合』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糾正王明的『左』傾，又掩蓋着王明的右傾。反對劉少奇的修正主義，又掩蓋着林彪的修正主義。」

以我個人的看法，近十年來的反覆鬥爭，就是由於劉少奇、林彪的路線的流毒，還未徹底肅清的原故。

問：中共的法制是不是也有問題呢？爲什麼在中共的制度下，可以容許高層人士享有四人幫那麼大的特權，並可以濫用呢？中共的法制究竟是怎樣的？

答：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國是有一套完整的法制的。這套法制很可能是在建國後參照蘇聯的辦法制訂的，當然並非盡善盡美。周恩來在一九五七年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承認「我們各方面的制度的確有許多還是不夠完備的，有缺點的」。但是，世界上似乎還沒有哪一種制度是毫無缺點的。因此，有缺點並不是問題，只要能夠認眞執行，並在執行中發現缺點時加以修改，就不錯了。

中國的國家基本制度，是由憲法規定的，由人民代表大會、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各部委等各級權力機構組成。中國共產黨在各級權力機構中居領導地位。國有憲法，黨有黨章。此外，還有政治協商會議，作爲與其他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協商諮詢機構。

在執行一元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內，則實行民主集中制，即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它具體表現在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也就是毛澤東在「關於健全黨委制」一文中所說：「一切重要問題（當然不是無關重要的小問題或者已經會議討論解決只待執行的問題）均須交委員會討論，由到會委員充份發表意見，做出明確決定，然後分別執行。」毛澤東又說：「黨委制是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重要制度。」在各級黨組織中，均有定期的黨員「組織生活」，黨員之間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此外，還隔一段相當時間的「關門整風」（黨內進行），或「開門整風」（讓黨外人士提出批評）。

在各級國家機構中，則有一般幹部的「民主生活」，黨員和非黨幹部一起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

中共的民主集中制，有四點紀律原則，即：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

所有在憲法和黨章中規定的制度、紀律和原則，在文化大革命前，基本上被貫徹着，儘

管並非沒有缺點和問題。但是，到一九六六年，由於最高領導層中出現了嚴重的路線分歧，毛澤東發動羣衆自下而上地鬥爭黨內的走資派，掀起文化大革命。在這「天下大亂」的局勢中，黨和國家的制度受到了林彪、陳伯達和江青等四人幫的破壞。

林彪、江青等破壞制度而實際上也是破壞了文化大革命的地方主要有三方面：一，「打倒一切」，破壞了中共中央「文革十六條」所指出的，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打倒一切」的結果，使全國黨組織和國家機構癱瘓。二，挑動派性。造成各組織、各機構的內部分裂，破壞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削弱了黨的領導。三，挑動武鬥，嚴重破壞了中國共產黨歷來主張的：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用咒罵也不能用拳頭，更不能用刀槍，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即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

文革出現了上述這些錯誤之後，毛澤東和周恩來即開始制度的重建工作。起先是在各地建立革命委員會。一九六九年中共舉行「九大」，謀求重建黨組織。但由於出現林彪事件，黨組織的建立又經歷一番反覆。而國家的基本制度（憲法）和組織的重建，到一九七五年一月四屆人大時才算完成。至於地方上的黨代會和人代會，則絕大部份還未召開。

現在看來，黨和國家的基本制度的重建，之所以不斷遭到困難，是同四人幫的破壞、爭權有關的。在黨的領導層政治局中，由於這四個人結成幫，對於其他分散的不搞宗派的政治

局委員來說，他們就是一個不小的勢力。他們實際上另立一個中央，凌駕於毛澤東和黨中央之上，以個人名義到處送材料、發文件，他們手中掌握的輿論工具往往不理黨中央討論通過的中央文件的原則，自搞一套；他們又無休止地挑動派性，層層揪「代理人」，處處抓「走資派」。「把人們的思想搞亂，把黨的組織搞亂，把革命隊伍搞亂」。（「解放軍報」社論）顯得沒有眞理標準，沒有是非黑白，沒有組織紀律，黨內民主集中制無法貫徹，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不正常，許多制度無法執行。

粉碎四人幫後，中共最高領導層表現出要恢復法制的意向：一，由於自然死亡和四人幫被除去，中央有必要增選副主席、常委和政治局委員；但因爲短期內須穩定各地局面，未能召集分散各地的中央委員開會，因此，政治局只按慣例決定由第一副主席繼任主席一職，其餘增選事項不作決定，避免使用中央全會的權限。二，人大常委會提出由鄧穎超任副委員長，說明要提請下一屆人代大會追認。這表示了對憲法規定的人代大會權限的尊重。三，儘管李先念可能實際上已執行總理的職務，但由於總理的任命需由人代大會決定，因此名義上總理的職位仍不作變動。四，這次人大常委會邀請在北京的政協委員參加，表示政協將會恢復，民主黨派亦將恢復一定的地位。

除此之外，毛澤東所說的：「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

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這段話不斷地被中共報章所强調。這也說明，中共領導層已重視民主集中制的重建。

問題是四人幫由於在最高層結成宗派，能夠取得如此多的特權，而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無法對他們加以限制，這一個制度上的漏洞，是中共當局必須認眞地加以檢討的。

問：爲什麼從劉少奇、林彪到四人幫，這麼多參加中共革命時間不短的高層人士，最後都變成「野心家、陰謀家」呢？是不是人性使然？

答：首先，按照馬列的觀點，在階級社會裏，沒有抽象的人性，而只有反映一定階級性的人性。這些人的蛻變，正反映了社會上存在着階級鬥爭。其次，任何革命到來時，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內，是需要很多人參加的。參加革命的人只需短期的目標相同，就會走在一起革命，各人的動機是會有所不同，也不可能强求一致的。到革命逐漸發展，短期目標實現了，新的目標出現了，於是革命隊伍就自然會發生分化。許多參加民主革命的共產黨人，到社會主義革命時就跟不上，而文化大革命達到了打倒劉少奇的目的，要進一步深化、落實政策時，四人幫就暴露了他們的野心。所有這些，都是合乎規律的。其三，看來，四人幫並不是到毛澤東逝世後才「矛盾轉化」，發展了他們的野心，變成敵我矛盾的。他們的問題，應該說長久以來就是敵我矛盾，只不過未被人們徹底認識罷了。

七、內外政策的前景

問：四人幫被粉碎以後，你看中國大陸的前景如何？

答：首先，我相信許多人都鬆了一口氣。這幾年來，特別是今年以來，人民看到四人幫的種種禍國殃民的行徑，種種倒行逆施，而中央却一直未作處理，老實說是心中有氣的。特別是天安門事件後，四人幫大搞追查謠言，壓制人民的正義的言論自由，使人民的心情很不舒暢。四人幫控制下的報刊文章也是充滿生硬的教條、口號，空有重重複複的理論，却擧不出實例，這怎能使人信服？四人幫被粉碎後，這一切已有所改變。中共報刊的文章也着重擺事實、講道理，比以前好讀得多了。總的來說，人民的心情舒暢許多，戾氣大大消滅，整個政治局面是比較正常的。

其次，經濟工作將大大加强。一個月來，中共報章大力譴責四人幫對生產的破壞，特別强調要發展生產，把四人幫所破壞的奪回來。政治路線的正確一定要反映在經濟建設的成就上，這是毛澤東領導下中國共產黨的幾十年的傳統想法。毛、周所提出的四個現代化規劃又再次被强調了。不過，看來四人幫對生產的破壞的確很厲害。中共副總理谷牧曾對外國訪客說，要把四人幫所破壞的恢復過來，可能需要兩年。因此，在最近的將來，中共可能要吃到

前一階段經濟被破壞的惡果。以我估計，會發生一段經濟困難時期，但相信較遠一些的經濟前景是會比較好的。

其三，是長期被江青破壞的文藝部門，相信會有較大改變。中共報刊已暗示會審查文革前的電影，選擇較好的重新放映。並暗示會出版不少已經繙譯好的書本。看來，毛澤東所提倡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和辨別香花毒草的六項標準會重被强調。長期以來，人民感到文化生活貧乏的局面相信會有所改變。當然，文藝創作不是立竿見影的事，落實正確的文藝方針以後，還要經過相當時間，才會有文藝繁榮的局面。

問：海外許多人關心中國的外交動向。特別是美國大選以後，中美關係會不會突破？蘇聯最近向中共表示了和解態度，在十月革命節的慶祝會上，中國大使也沒有退席，你看中蘇關係會不會解凍？

答：十一月一日，中國外交部負責人在接見一個法國記者代表團時，重申了中國一向以來的外交方針。對中美關係，中共負責人表示，中國對於「在上海公報基礎上發展同美國的關係感到高興，但是迄今爲止，如果說中美關係沒有正常化的話，那應由美國負責」。他並表示，中國對「美國壟斷資產階級選出的」未來總統不抱任何幻想。「只有美國同台灣斷絕關係，廢除其防務條約，並且從台灣撤回其軍隊」，中美才可能實現關係正常化。

至於中蘇關係，中國外交部高級官員表示，「蘇聯對中國的立場沒有改變，中國對蘇聯的立場也沒有改變，而且不會改變。」

在蘇聯十月革命節的慶祝會上，中國大使沒有像往年那樣退席，是因爲蘇聯這次沒有發表反華的言論。但是，蘇共在毛澤東逝世時發給中共的唁電，以及十月底勃列日涅夫發給華國鋒祝賀他出任中共主席的賀電，都被中共退回了，理由是中蘇之間沒有黨的關係。

照我想，蘇共向中共發出這兩封電報並不表示蘇聯要改變態度。因爲倘蘇聯要改變態度的話，在此中蘇關係微妙的局勢下，通常的做法是首先私下問北京是否會接受電報，就像中美關係突破前所進行的私下接觸一樣。蘇聯不採取這種外交手法，而逕發電報，是料定中共不會接受的。蘇聯不過以此表示它的「友好」和對方的頑固態度罷了。

問：儘管中蘇的態度都沒有改變，但關係是不是緩和一些呢？十一月下旬蘇聯副外長伊利切夫已重到北京，繼續已長期停頓的中蘇邊界談判。被認爲是蘇聯非官方發言人的「倫敦晚報」記者維克多．路易斯報道中蘇邊境平靜，有改善關係的迹象。此外，在蘇聯領導人多次的公開發言中，都沒有再指名批評中共了，充其量只不過表示：「蘇中關係至今未得到改善，不是蘇聯的責任。」一如此而已。

從中共方面來說，過去親自領導「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鬥爭的毛澤東的去世，被西方

稱為「激進派」的四人幫的倒台，都使人猜測被稱為「穩健」的中共新領導層會不會恢復同蘇聯修好的政策。在蘇聯十月革命節的慶祝會上，中共大使沒有像往年那樣退席；過去幾年在國際講壇上最嚴厲斥罵蘇聯的喬冠華外長被撤了職；中共副外長余湛在迎接蘇聯副外長重回北京談判時，在機場表現出一種友好的態度。所有這些，也都引起輿論界的注意。

儘管中共外交部高級官員重申：「蘇聯對中國的立場沒有改變，中國對蘇聯的立場也沒有改變。」但也有人會忖想：表面沒有變，私底下有沒有變，會不會變呢？

答：關於中蘇關係，除了你所說的現象之外，似乎還可以聯繫其他的現象來看。先看看蘇聯方面的其他行動。

一，蘇聯駐中蘇邊界的四十三個師的軍力，在這幾個月有增無減。並進行軍事演習和間諜訓練。

二，勃列日涅夫在十一月下旬分別到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訪問，並利用這兩個國家的經濟困難，加强了與這兩個國家的經濟聯繫，似乎改善了關係。而衆所周知，這兩個國家在東歐國家中，是堅持對抗蘇聯而同中共保持友好關係的。

三，在十月份，中共粉碎四人幫的同時，在共黨國家中同中共關係最密切的阿爾巴尼亞和北朝鮮，也分別發生了粉碎反黨集團事件。那兩次事件，據說反黨集團都是同蘇聯有聯繫

的。

四，蘇聯與中國雖有國交，但蘇共與中共的黨與黨之間的聯繫，已於六十年代中期中斷了。在這種情形下，蘇共給中共發去唁電，是肯定會被退回的。結果當然不出所料，中共退回了蘇共發來的對毛澤東逝世的唁電。但接着，在十月二十八日，蘇共為什麼不顧前車之鑒，又以勃列日涅夫的名義給華國鋒發去就任黨主席的賀電呢？更奇怪的是：為什麼在中共再次退回電報的第二天，即十月二十九日，在蘇聯「眞理報」上把勃列日涅夫的這封賀電發表出來呢？理由是明顯的：為了向蘇聯人民表示，蘇聯已盡量對中國表示改善關係的友好願望，可是對方態度頑固；因此，如果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那就應該完全由中國方面負責。——這一舉動所包藏的禍心是，蘇聯為進一步惡化蘇中關係，已開始作推卸責任的輿論準備了。與此同時所進行的其他「友好」步驟，包括故意不公開發表反華言論，以及恢復參加邊界談判，都藏有同樣的動機。

五，除了上述的意圖之外，蘇聯對中國的表示友好的行動，還包括乘着美國大選後的政府轉換時期，來破壞中美關係，以及拉攏美國的新政府，謀求蘇美的進一步「緩和」。

同蘇聯有長期鬥爭經驗的中共領導人，當然不會無視蘇聯的意圖。在蘇聯繼續施加軍事壓力的情況下，蘇聯表面上所表示的「友好」，其實正是危險的訊號。加上阿爾巴尼亞和北

朝鮮的事件，以及蘇聯向中共的朋友大挖墻脚，都不能不使中共領導人考慮到：「一切革命運動的歷史經驗說明，革命的偉大領袖的逝世，對於革命階級和革命運動來說，總是一個極其嚴重的困難。而對於革命的敵人來說，則總是他們利用革命階級的困難，向革命猛撲過去，扼殺革命的一個極好時機。」（十二月十七日「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

中共作出了什麼反應呢？除了顧全外交禮節，接待蘇聯副外長並繼續談判之外，中共在言論上加强了對蘇聯的指責。

十一月十八日，中共進行了第一次百萬噸級的氫彈試驗，宣稱「把我國核武器水平提到一個新的高度」。十二月七日，中共發放了一個新人造衞星，並於十二月十日回收，顯示了中共已具有發射洲際導彈的能力，並可用衞星視察强大的鄰邦蘇聯。

蘇聯蠢蠢欲動的另一個原因，是考慮中共的人事變動會否造成混亂局面，以及新任軍委主席的華國鋒，以他在軍隊的資歷能否統帥全國各地的軍隊。針對這種情況，中共以「解放軍報」編輯部的名義一連發表三篇擁護華國鋒文章，表示了「一切行動聽華主席爲首的黨中央指揮」的意向。在此期間，華國鋒、葉劍英接見了軍政大學師生。這些做法一方面爲了穩定全國局勢，另一方面也有重要的備戰意義。

至於被粉碎的「四人幫」，是否同北韓和阿爾巴尼亞一樣，有着蘇聯的聯繫，目前尚未

可知。傳說喬冠華有這方面的嫌疑。但即使撇開未證實的傳說，單單根據表面現象作分析，中蘇關係也已經夠緊張的了。

從理論上認識四人幫問題

一、中共問題是否「不可知」？

問：這一個月來，中共報章繼續刊登大量揭發批判四人幫的文章，這些文章，若與四人幫控制輿論時期的文章相比，的確是可讀性高得多了。但是我總覺得有許多文章都只是着重四人幫的生活作風上的瑣碎問題，而且用來批判四人幫的語言，往往就是四人幫以前用來批判鄧小平或其他人的語言。例如什麼「修正主義」、「走資派」等等。加上大家都引用馬、列、毛的話，於是就給人一個感覺：不知誰是誰非？不知誰說的才符合馬、列、毛的原則？有些朋友過去在四人幫批鄧時跟得很緊的，現在頗有些「不可知論」的想法。究竟中共的問題是否「不可知」？爲什麼許多人又會有這種「不可知」的感覺呢？

答：「不可知論」的想法是錯誤的。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可以被認識的，只不過人們的實踐和理論知識所限，有些事物尚未被認識罷了。由於現在中共的報刊文章，基本否定了四人

幫控制報刊時的許多言論，可以說是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在這大轉變的時期，在海外就覺得不容易理解了。

不易理解的原因，首先是生活環境的不同。例如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無疑成績是主要的，但由於文革是一次史無前例的創舉，既沒有先例可援，自然也就有不少錯誤。毛澤東認爲對文革的評價應該三七開，七分成就、三分缺點。四人幫却不准人們提文革的缺點，一提缺點就說你翻案。然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看到江靑提出「文攻武衞」、林彪挑動武鬥，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他們又看到江靑、林彪互相吹捧，江靑帶頭呼叫：「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林彪則回敬她：「向江靑同志學習，向江靑同志致敬！」這些事情老百姓都親眼見、親耳聞，既受其害、又受其騙。在海外，我們通過中共的傳播工具，只看到文革的成就方面。的確，那是很動人的。我們沒有看到文革中由林彪和四人幫造成的缺點，沒有目睹武鬥和打倒大批老幹部的情形，沒有見識過江靑和林彪的一唱一和的表演，因此不能像大陸人民那樣，對四人幫「看在眼裏，恨在心頭」。

對四人幫的言論，由於不是在大陸生活，因此體會就不同。例如，四人幫認爲工廠的規章制度是對工人的「管、卡、壓」，不符合「抓革命，促生產」的原則。這種言論聽來似乎有道理，但在中國大陸的工廠中從事勞動的工人，就會從切身體驗中知道沒有規章制度根本

行不通，這不僅是縱容了一小部分不守紀律的懶漢，而且打擊了絕大多數要求搞好生產的工人。又例如，在海外，吃盡不合理的考試制度的苦頭的知識分子，對於四人幫取消考試的主張，也許很有同感。但在中國大陸，無論是教師、學生、家長，從實際情況出發，都會覺得完全沒有文化考查，不了解學生掌握基礎知識的情況和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單憑政治條件去取錄學生，是根本行不通的。這都是由於生活環境不同，因而容易偏信四人幫所宣傳的一些脫離實際的理論。

其次，即使在理論方面，四人幫的大部分理論不僅是脫離實際的，而且也是不符合馬列哲學的。問題是他們總是打着馬、列、毛的招牌，而所宣揚的却是經他們歪曲、篡改過的馬、列、毛的理論。有些馬、列、毛的話，是針對具體的人或事而說的，但四人幫却以之作爲指導一般問題的原則。有些馬、列、毛的話，原意是不錯的，但四人幫却斷章取義，亂加解釋，引導出一個錯誤的結論。由於他們長期控制中共的輿論工具，因此把中共一貫以來所信奉的許多理論原則都搞混亂了，甚至搞顚倒了。我相信，四人幫在思想理論方面的危害性，及其流毒和影響的嚴重程度，遠超過他們的生活作風等問題。只不過，中共發動羣衆去揭發批判四人幫，羣衆從實際接觸中對四人幫的生活作風更有感性印象，因此這方面的文章也就比較多罷了。

在海外，今後要使自己對中共問題從「不可知」變為比較「可知」，一方面是要多注意中國大陸的實際情況和實際問題，另方面，也要增加思想理論方面的認識，要從理論方面澄清是非，解決問題。

二、理論問題有沒有準則？

問：所謂理論問題，主要包括哪些方面？而且究竟有沒有標準呢？例如，四人幫倒台以前，他們也强調「三要三不要」原則，他們也說要搞馬克思主義，並批判鄧小平搞修正主義。現在反過來又批判四人幫搞修正主義了。馬、列、毛的理論著作是如此之多，大家都在引用，大家以之針對現實問題，都說自己的闡釋是正確的。甄別正確與錯誤的理論準則是什麼？

答：照我想，對於信奉馬列學說的人來說，準則之一是這種學說的基本原理，準則之二是具體實踐。所謂基本原理，從哲學方面來說是唯物論和辯證法，從政治經濟學方面來說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學說，從社會學方面來說則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學說。但列寧曾說過，「這些原理的應用具體地說，在英國不同於法國，在法國不同於德國，在德國又不同於俄國。」毛澤東說，「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地聯繫起來，這是我們

黨的一貫的思想原則。」這就是說，運用這些原理還得結合具體實際，對具體問題要作具體分析。如果把馬列的原則生搬硬套，那就首先違反了馬列學說。

問：四人幫被指責是修正主義者，是指他們違反了馬列的基本原理，還是指他們死背口號、教條，而沒有同實際結合？

答：兩方面都有，而脫離實際本身也是違反馬列原理的。從揭發的材料來看，四人幫在理論問題上，首先是在哲學上違反了唯物論和辯證法，在他們的形形色色的理論中充滿了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觀點。

問：關於唯物論和唯心論，辯證法和形而上學，你能簡單具體地加以說明嗎？

答：所謂唯物論和唯心論，是指對於精神和物質的關係的兩種對立的認識。唯物論認爲客觀物質是先於個人感覺而存在的，是由於有了外界的事物，在人的頭腦裏才產生對這些事物的認識；唯心論則認爲個人主觀感覺、認識是先於客觀物質而存在的，客觀物質不過是主觀認識的附屬品。例如唯物論認爲先有花，然後我才看見花；唯心論則認爲先有我，花的存在才有意義，當我不看見花的時候，花也不存在了。這樣說法似乎比較抽象，但如果結合到現實生活，兩種認識論就有具體的衝突了。例如唯物論認爲，由於物質是第一性的，因此任何認識都來源自實踐；唯心論則認爲人的才能是與生俱來的，認識可以完全從書本中來而不

必經過實踐檢驗的。唯心論認爲「英雄創造歷史」，「有我才有世界」，人的精神力量是萬能的；唯物論則認爲歷史發展有一定的規律，是「奴隸創造歷史」，人只有認識到客觀物質的規律，才能順應客觀規律去改造世界。

所謂辯證法和形而上學是指兩種對立的思想方法。辯證法認爲世上任何事物都是有聯繫的，在運動中的事物內部存在着兩種互相矛盾、對立的方面，其中佔主導地位的一方面決定事物的性質，而事物的運動、變化、發展，則是事物內部矛盾的兩個方面互相鬥爭、互相轉化的結果。和這相反的形而上學的方法論，則認爲事物是孤立的、靜止的，事物內部不存在着正反兩面，事物的存在也沒有一個發生和發展的過程。

四人幫在理論上的唯心主義觀點，主要表現在他們不顧實際，誇大理論的作用，考慮任何事情都是從書本中個別教條出發，而不是從客觀實際出發。他們的形而上學觀點，主要表現在他們分析事物，往往「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不分析事物內部存在的兩個方面（一分爲二），看不到事物發生的原因及其後來的變化，而是以一成不變的觀點去看事物。就以四人幫所揑造的毛澤東的「臨終囑咐」的「按既定方針辦」來說吧，一個國家或政黨的某項指導方針，是在一定歷史時期、爲達到特定的目標而制定的，哪裏有什麼一成不變、永遠照辦的既定方針呢?因此，「按既定方針辦」本身就是一個唯心的、形而上學的提法。再例如四人

幫對電影「創業」的「求全責備」，也是違反辯證法的。金要足赤，人要完人，事要盡善盡美，世界上哪裏存在呢？四人幫的諸如此類的論點，可說俯拾皆是。有一定哲學理論基礎的人，要識別這些錯誤思想是不太難的事。

三、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

問：在思想理論方面，中共報刊近來似乎頗爲重視批判四人幫的「反對經驗主義」。毛澤東還有一個說法：「我看批判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這些什麼主義的，似乎不大好懂，你能否解釋一下，這與四人幫的哲學思想有關嗎？

答：首先，要區別什麼叫「經驗」和「經驗主義」。經驗，通常是指人們在社會實踐過程中，通過自己的五官，所直接得到的對外界客觀事物的感性印象。經驗的來源和內容都是客觀事物。人們要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經驗的取得是十分重要的。取得了實踐經驗，再加以總結和提高，總結出客觀規律，認識本質，這種感性認識就可以上升爲理性認識。在總結經驗的過程中，正確的書本理論的指導又往往是不可少的。

經驗有時又指那些經過總結而提升出來的理性認識，或者是經過反覆實踐和提煉出來的結論。例如，中共常說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裏所說的「經驗」就是指理性結

論，而不是感性認識。

所謂經驗主義，是指人們取得了局部的感性經驗之後，輕視理論，不在正確理論的指導下把經驗作理性的總結提煉，認識本質，而是把自己在局部取得的經驗當作普遍眞理，到處生搬硬套。經驗主義者認爲只有感性認識是可靠的，而理性認識是靠不住的；只看事物的現象，不分析事物的本質；只承認感性經驗而輕視理論對實踐的指導意義。

爲什麼說「批判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呢？毛澤東在這裏是具體有所指的，他所指的是「只提反經驗主義，不提反教條主義」的四人幫。四人幫執着一些總結經驗而得出來的部分理性結論，以之作爲教條來生搬硬套，完全不顧及客觀具體情況。例如，在蘇聯，出現了「衞星上天，紅旗落地」的變修的情況，這也是一個「經驗」；四人幫於是不顧中國的實際情形，動輒以「衞星上天，紅旗落地」來否定發展生產。這也是以局部經驗當成普遍眞理的經驗主義。

問：一九七五年二月姚文元發表的文章「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曾引用毛澤東的原話：「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這句話是否捏造的？如果是的話，毛澤東當時爲什麼不指出呢？

答：毛澤東的確說過那句話，那是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寫的「『經驗主義，還是馬

列主義』的導言」一文中說的。但在這句話之前，還有很重要的一句話，原文是：「理論上，我們過去批判了教條主義，但是沒有批判經驗主義。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因此，當毛澤東說「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的時候，他是具體有所指的，他所指的就是對彭德懷的批判，而且是在已經批判了教條主義的前提下提出來的。姚文元引用這句話顯然是拋開背景並且斷章取義。

問：即使如此，如果經驗主義是錯誤的話，提出來批判，又有什麼不對呢？而且教條主義明明是信奉馬列教條，又怎能稱之爲修正主義呢？

答：問題不在於四人幫只是從理論上講講經驗主義有什麼不好，而是在於他們在提出把反對經驗主義「當作綱」的同時，又說「反對經驗主義有現實意義」，並把「經驗」與「經驗主義」混爲一談，把許多老幹部在幾十年的戰鬥中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對於今天仍有重要現實意義的經驗，一概斥之爲「過時」的、「陳舊」的老經驗，全盤否定。他們的目的其實是要打倒周恩來和大批老幹部，以便奪取最高領導權。因此，一九七五年三月，當姚文元、張春橋、江青相繼提出以「反對經驗主義」「當作綱」的時候，毛澤東就指出：「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毛澤東在這裏是把四人幫針對人（有經驗的老幹部）的「反對經驗主

義」，引導到針對思想的「反對修正主義」。教條主義只重理論，否定實踐，不是以理論去總結經驗，而是以理論去代替實踐經驗，因此也是對馬列的基本哲學原理——實踐第一——的修正。

總之，不管經驗主義也好，教條主義也好，都是主觀主義的表現，都是把理論和實踐割裂開來，各執一端，因而都違反了馬列哲學中理論聯繫實際的認識論。從這個角度來看，二者都可稱爲「修正主義」。

四、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問：四人幫倒台以後，中共似乎十分强調發展經濟。最近召開的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人民日報的社論提出要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這是否意味着中共今後將減少鬥爭，大力發展生產？或者如某些報紙所說的，四人幫是所謂「鬥爭派」，而華國鋒、李先念等則是「生產派」呢？

答：把中共黨內的兩條路線鬥爭，簡單劃分爲「生產派」與「鬥爭派」的鬥爭，是不恰當的。事實上，目前華國鋒等領導人强調發展生產，但更强調的是同四人幫集團的鬥爭。中共當前正是要通過揭批四人幫集團的鬥爭，來提高羣衆的政治熱情和生產積極性，更加方向

明確地促進生產。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人類爲要從事各種活動，首先要能夠生存，爲了生存，必須解決衣食住行等問題，必須有糧食、衣服、住房、燃料等生活資料。而爲了獲得這些生活資料，就必須進行生產活動。因此，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有了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作爲基礎，人類的政治、科學、藝術等活動才能發展起來。

人類在從事生產活動的過程中，必須結成人與人之間的一定的關係，這就是生產關係。例如地主與農民的關係，資本家與工人的關係，農民從事個體生產與組成集體進行生產的關係等等，都是生產關係。而從事生產活動時所使用的生產工具的能力，和人的勞力、技藝，則構成「生產力」。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總和，就叫做社會的「經濟基礎」，而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政治、科學、文化、藝術等活動，則稱爲「上層建築」。

在一個特定社會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是既互相適應又互相矛盾的。而一般來說，矛盾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生產力和經濟基礎。例如，在奴隸社會中，社會生產力和奴隸制度（生產關係）是相適應的，是當時的生產力決定了必須採取奴隸制。但隨着生產力發展，原有的生產關係就不適應了，它繼續存在就成爲發展生產力的障礙，於是有「革命」的發生。通過革命，消滅過時的舊的生產關係，建立和發展新的生產關係，解放被

束縛的生產力，推動社會向前發展。革命的最深刻的根源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

因此，對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一方面要看到起決定作用的是生產力，它決定了社會的性質；另方面也要看到當生產關係有了改變，上層建築發生了革命，又會反過來對生產力起促進作用。毛澤東强調「抓革命，促生產」，就是要通過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革命，來帶動生產，促進生產。中共建國以後的土地改革，農業的互助組運動、合作化運動和公社化運動，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大躍進運動，幹部的整風和强調參加勞動，文化大革命破除舊文化、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要求樹立新文化、新思想、新風俗、新習慣，不斷開展的教育革命、衞生革命、文藝革命，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在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中進行革命，以此作爲動力，促進生產的發展。

當前，中共提出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也是以大抓揭批四人幫的羣衆運動和農業學大寨運動作爲動力，使人民的思想得到解放，以此促進生產建設的發展的。

問：既然革命可以帶動生產，毛澤東又歷來主張「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那麼四人幫强調抓革命，不是也能達到促生產的目的嗎？那又有什麼不對呢？

答：說革命可以促進生產，可以帶動生產，並不是說革命可以代替生產。發展生產，意味着大量的勞動，大量的組織工作，要掌握各種生產的規律，解決生產中的矛盾，要搞好經

濟核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還要進行科學研究，技術革新。這大量艱苦的工作，億萬人的勞動，並不是抓革命可以代替的。抓了革命，提高了人們的積極性，還要把這種積極性引導到生產上去，而不是唱歌、跳舞、發空論。四人幫認為：「革命抓好了，生產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這完全是從主觀主義出發，是一種唯心的觀點。

問：四人幫以前的文章，非常突出地批判「唯生產力論」，一直要人們警惕「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現在他們的論點又受到批判了。中共今後會不會只注意生產而忽略路線方向的問題呢？

答：所謂「唯生產力論」，就是只承認生產力對生產關係的作用，不承認生產關係的反作用；在構成生產力的生產工具和勞動者這兩個因素中，又只承認生產工具的作用，不承認人的作用；在中國大陸，具體的表現是認為社會的進步主要靠生產力的提高，而生產力的提高主要靠生產工具的先進，因此，為了達到提高生產力的目的，可以破壞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和集體經濟，大搞獎金掛帥、利潤掛帥，大搞「三自一包」，甚至可以依賴外力，引進外資。看不到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破壞，特權階級的滋生，是反過來損害生產力的（如今日蘇聯）；也看不到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革命，將會長遠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唯生產力論」的錯誤，最近以來，仍然一直受到中共報刊的批判。

四人幫表面上反對「唯生產力論」，但卻是把搞好生產、促進生產同「唯生產力論」混爲一談。他們把「革命」與「生產」對立起來，認爲凡是要搞好生產，一定是不抓革命的，一定是「唯生產力論」，是「埋頭拉車不看路」。根據這樣的邏輯，他們還炮製出許多壓制生產的大帽子：對於加强企業管理，他們說是「管、卡、壓」，對於改進產品的質量和品種，他們說是「技術第一」；對於一些人鑽研科技，搞技術革新，他們說是「走白專道路」；對於一些人精打細算，爲國家增加積累，他們就說是「利潤掛帥」；一些幹部提出要改善人民生活，他們就說是「搞物質刺激」。所有這些，都是藉口批判「唯生產力論」，而目的在打擊大批要搞好生產的有經驗的幹部，以便他們奪取權力。四人幫所用的形形色色的帽子，用哲學觀點來分析，都是唯心主義的，是對具體問題不作具體分析、硬套教條的主觀主義結論。以四人幫常說「衞星上天」和「紅旗落地」來說，其實這兩個概念是並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係的。蘇聯的衞星上了天，紅旗落了地；有的國家衞星沒有上天，而紅旗也落了地；而一個國家如果堅持正確路線的話，是可以做到衞星上天，紅旗高擧的。不能因爲蘇聯出現了「衞星上天，紅旗落地」，那麼中國爲了不讓紅旗落地，寧可任由科技長期處於落後狀態。同樣，有人鑽研科技是「走白專道路」，但也有人鑽研科技是「走又紅又專道路」，此外也有不懂業務的空頭政治家。這些都要具體分析。對四人幫拋出的其他帽子，都可以用這種具

體分析的方法，來證明其荒謬之處。

五、如何識別「走資派」？

問：這次批判四人幫，最使人覺得有趣的是「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四人幫過去老是以「走資派還在走」來說別人，現在別人用「走資派正在走」來說四人幫了。近年來，在大陸任何人一倒台，就被稱爲「走資派」。究竟四人幫是不是走資派？爲什麼在中共高層有這麼多走資派呢？

答：毛澤東對馬列學說的發展之一，是他從蘇聯和中國的經驗，看到了在社會主義時期，會滋生新的特權階級。這些新的特權階級是在共產黨內部，由於位居高層而成爲既得利益者的。他們以權勢取得財富，過着與工人生活水平大爲懸殊的享樂生活，成爲吸工人血的官僚主義者。在這種情形下，任何縮小差別、準備過渡向共產主義的措施都是與這些官僚主義者的利益相抵觸的。相反的，擴大差別，復辟資本主義則符合他們的利益。毛澤東提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這就是說，「走資派還在走」是在整個社會主義的歷史階段中的特點，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現象。從揭發出來的材料來看，儘管四人幫滿口馬列，但他們的生活

作風，他們對特權的不斷擴大，他們對下屬的壓迫欺凌，他們對社會主義物質基礎的破壞，都在說明他們是「走資派」。

問：如果整個歷史時期都可能有走資派的存在，那麼應該怎樣把這些人識別呢？去年初，中共報刊似乎提出過什麼「資產階級民主派就是走資派」，那是指一些跟不上時代的老幹部嗎？

答：不錯。但當時的中共報刊，基本上控制在四人幫手裏，他們提出的關於「走資派」的理論，是違反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的學說的。四人幫當時提出這樣一個公式：走資派就是民主派；民主派是民主革命時期（中共建國前）參加革命的人，「這些人過去是黨的同路人，社會主義時期就是革命的對象」。這裏所指的，就是中共的一大批老幹部。江青甚至說：「老幹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由民主派必然到走資派」，這是「一般客觀規律」，因為「舊社會裏吃過糠，抗日戰爭扛起槍，解放戰爭打老蔣，抗美援朝負過傷」的老同志，「現在都不想前進了」。這種不用階級分析的觀點，而用年紀的老和青、資歷的長和短，作為劃分革命派和走資派的標準，是形而上學的。其目的，就是要把大批老幹部打成走資派，而把一些聽他們話的新幹部封為「造反派」，製造新老幹部的對立，以便他們乘機奪權。

毛澤東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則，是識別黨內走資派的標準。像四人幫那樣，

從理論上修正馬列，又藉走資派問題製造新老幹部分裂，更搞陰謀詭計奪權，當然是如假包換的走資派。

問：黨內出現走資派，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呢？走資派有沒有改過的可能？是不是所有的走資派都是「不肯改悔」或至於「死不改悔」的？

答：在去年初，四人幫大力鼓吹「寫與走資派作鬥爭的作品」時，四人幫提出的論點是：「一般的走資派，改的少；大的走資派，改不了。」並說，如果把走資派寫成「犯錯誤的好人」，這就是「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甚至說：「走資派也就是反革命，也可以抓起來，判刑，還可以槍斃他幾個。」所有這些，都是要打倒大批老幹部，為四人幫奪權鋪路的，並不反映走資派的眞實情況和對待走資派的正確態度。

黨內走資派，是指在黨內推行修正路線的領導幹部。其中有犯了錯誤的好人，也有混進黨內的叛徒、特務、內奸，還包括一些陰謀家和野心家。

對待犯錯誤的好人，應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例如文革前執行過修正路線的許多幹部，經過批評教育之後，大都能認眞改正錯誤，恢復工作後仍然得到羣衆擁護。事實證明，大部份犯過走資錯誤的幹部是願意改正，也能夠改正的。至於有些走資派不僅路線錯誤，而且被證明是叛徒、內奸、賣國賊、野心家、陰謀家，如劉少奇、林彪以及四人幫，就不是人民內

部矛盾而是敵我矛盾了。

對走資派問題，不能孤立起來看，要分清犯錯誤的背景，本人的態度和歷史情況，等等，否則就會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當然，對於走資派所推行的路線，就思想範疇來說，必須批判從嚴，不能講情面，不能輕輕放過，否則就達不到弄清思想、肅清影響以及團結教育犯錯誤的人的目的。但是，這種批判應該是充份說理的，擺事實講證據的，而不能像四人幫炮製的某些批鄧文章那樣，粗暴，片面，打棍子。四人幫的做法只能說明他們是別有用心的陰謀家。

問：爲了防止走資派擴大個人的特權，中共對高層領導人的權限是否應有所規定？現在從揭發出來的四人幫（特別是江青）的惡行劣迹來看，其窮奢極侈和飛揚跋扈的程度，簡直使人難以置信。在中國大陸，少數人可以得到這麼大的特權，這是否說明制度有些問題？

答：制度的優劣，一般來說是相對的。世界上並沒有十全十美、一點問題也沒有的制度。中共的制度如何，當然還可以討論。不過，自文革以來，一方面落實政策，重建黨和國家的組織，另方面又有林彪、四人幫的「形左實右」路線的反覆干擾，糾纏不清，因此制度的實行往往是不容易的，黨內外的民主集中制看來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破壞。特別是近十年來，傳播工具操縱在四人幫手上，他們發明了許多似是而非的歪論，搞得人們思想混亂，許

多事情都使人覺得漫無標準，這樣，制度的實行也就更受阻礙了。上個月的人大常委會的召開，總算是貫徹了遵循法制的做法。四人幫被粉碎後，相信各種制度會逐漸健全起來的。

問：四人幫在理論上製造的混亂，除剛才談到的之外，還有什麼重要的方面嗎？

答：要講四人幫的謬論，可謂多矣！這裏只是就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學等幾個方面談談。還有教育方面、文藝方面、史學方面，四人幫在理論上也造成了很大混亂。根據目前中共報刊上的大量揭批材料來看，在這幾個方面許多歪論和被顛倒的事實，是終會逐漸糾正過來的。

在中國，人們熱烈談論些什麼問題？

從聖誕節到新年，接連有好幾天假期。香港有許多人都在這段期間安排去外地旅行。有到日本和東南亞國家的，有到台灣的，也有就近到廣州或澳門的。到其他地區，大部份是遊覽觀光性質，惟有到廣州，則有許多人除了探親、遊覽之外，還想了解一下經歷重大變動之後的大陸情形。

自十二月廿四日起，經深圳到廣州的火車都加了班次，廣州街道上到處可見香港來客。筆者也在這段期間，在廣州送別了一九七六年的最後一個星期，看了街頭的大字報，接觸了一些親戚和廣州的普通市民，多少了解到大陸人民在迎接一九七七年的時候，所普遍關心及熱烈談論的，是一些什麼問題。在這次短短的私人旅行中，也加深了筆者對中共政局的認識，對一些疑團也有了初步的答案。

在與親友見面的時候，過去總是首先談談彼此別後的情形和其他親人的一些近況。但在這次，大家一見面，就很自然地大談粉碎四人幫的事，其中有小道新聞，有政治笑話，也有

中共中央向羣衆傳達的材料。在這短短的一週間，中共報章又連續發表了好幾個重要的文件：陳永貴在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報告；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寫的「論十大關係」；華國鋒在大寨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二報一刋的元旦社論。這些文件引起人民普遍的關心。到處見到人們在買報，在埋頭閱讀，在高聲議論。

廣州，市容還是同上次所見的一樣，公共交通工具仍然很擠，各種物資的供應也未見改善，但是人們的心情顯然與前大不相同了。以前人們見面所談的大都是副食品供應，或家庭子女的瑣事，現在許多人談的是國家大事，而且談得興高彩烈，情緒開朗。人們也決不隱瞞目前所遇到的困難及存在的問題，甚至也表達了一些不同意見，尤其是針對鄧小平問題和天安門事件。

在人們暢談國事的話題中，以下的一些議論是筆者認爲値得向「七十年代」的讀者報道的——它們或許可以補充過去幾期「七十年代」在評析四人幫問題的文章中的不足之處，又可以作爲探討「中國往何處去」這一個徵文題目的參考。

一、鄧小平七五年批四人幫

儘管在中共報章上揭批四人幫的文章很多，但其中許多文章的原始材料都是來源自中共

中央向羣衆傳達的「文件」。其中一個在十二月中旬下達到一般羣衆、要求做到「家喻戶曉」的文件是有關四人幫篡黨奪權的罪證。廣州市一般人、甚至連小學生都或看過、或聽過這個罪證材料。據說厚達百餘頁，其中幾乎都是四人幫罪行的原件照片——包括他們的親筆信、他們的筆記、他們在文件上的「批示」，以及四人合照的照片，江青在毛澤東逝世前後吃喝玩樂、嘻笑顏開、騎馬逗鹿的照片，等等。從華國鋒在大寨會議的講話中看來，中共揭批四人幫的運動將分三個步驟進行，第一步是「集中揭發批判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第二步是揭批四人幫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惡歷史」，他們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現」；第三步，是「從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上進行批判」。十二月中旬傳達的材料是第一批，以後再按上述步驟下達第二批，第三批材料。

根據第一批材料、報刊文章以及流傳的一些消息，廣州市民大都認識到：在中共高層領導中，與四人幫的鬥爭是由來已久的。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四人幫藉着反劉少奇的機會，打倒大批老幹部，並依靠江青的「拉大旗作爲虎皮」，而爬上了高層領導地位。這之後，他們就爲了鞏固和發展自己的權力，而結成宗派，培植勢力，對抗毛澤東、周恩來落實政策、解放大批老幹部的措施。一九七四年初，四人幫藉批林批孔的機會，含沙射影地攻擊周恩來；一九七四年七月，毛澤東公

開批評王張江姚「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這以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內部的鬥爭就逐漸趨於表面化和尖銳化了。特別是周恩來病重，毛澤東年老，有一段時期政治局開會幾乎就是鄧小平與四人幫的對罵。一九七四年的一次對罵，不歡而散，使政治局一個多月開不起會來。拿江青的話說，就是「兩個鋼鐵公司碰在一起了」。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澤東出席政治局會議，重申「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則，並警告四人幫說：「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爲什麼照樣搞呀？」同一天，毛澤東並指示中央政治局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並表示：「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據說，在毛澤東發出這個指示以後，政治局由鄧小平具體領導，批四人幫批了四個月。在這段期間，四人幫分別作了檢討。張春橋書面表示對毛澤東的指示要「照辦」，「不要搞四人幫」。江青給毛澤東和政治局寫信，也表示不再搞四人幫。但這些檢討都是不接觸思想的，帶有應付過關的性質。

爲什麼在四人幫作了這樣的假檢討以後，毛澤東和政治局沒有繼續對四人幫進行批判甚至處理解決呢？廣州有些人是這樣認識的：

一，在周恩來去世以前，四人幫除了在文藝、宣傳、教育等意識形態的部門掌握有一些權力之外，基本上沒有什麼實權。據說，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江青寫信給毛澤東，說她

「基本上是閒人」，要求分配她具體工作，毛澤東覆示說她的職務是「研究國內外動態」，「不要說沒有工作」。同一個月，她托王海容帶口信給毛澤東，提出可以組閣及王洪文可以任人大副委員長，毛澤東表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後來毛澤東又明確表示不准江青批文件，不准她見外賓，不准組閣。總的來說，就是不讓以江青爲首的四人幫有實權。一九七五年的情形是：實權在周恩來及國務院幾個副總理（包括鄧小平、李先念、華國鋒等）的手裏。四人幫對各部門進行了一定的干擾，但這種干擾並非不可以排除的。四人幫又還沒有表露出他們的奪權野心及搞分裂、搞陰謀的目的，也就是說他們的罪惡活動未充分暴露，只不過看出他們在搞小宗派罷了。在這種情形下，如果對四人幫加以逮捕、處理，是不符合毛澤東的教育幹部的政策的，在當時甚至可能會使許多幹部和人民不服。

二，由於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偉大貢獻和崇高威望，由於各級幹部對毛澤東的愛護尊敬，由於毛、江的分居沒有公開宣佈，因此，江青的「拉大旗作爲虎皮」的做法，還起了一定的欺騙作用。毛澤東就曾對她指出：別人對你有意見，又不好當面說，你有特權。儘管一九七五年政治局開會時批評了江青，但這種在高層進行的批評活動，政治局以外的人是不知道的。因此，當江青發批示，送材料，召集省市負責人開會，自稱「代表毛主席」的時候，

不少人還是信以爲眞。

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有些人還認爲，這同中國社會還有潛在的封建意識有關：中國沒有經過一個資本主義的時代，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中國共產黨也不免沾到封建意識，這表現在重人倫關係，講情面等方面。這一次事件的經驗教訓，是應該好好總結的。

三，據說，一九七五年，鄧小平受毛澤東、周恩來委托處理四人幫問題，他在做法上犯有一些錯誤。誠然，鄧小平對四人幫是敢批敢頂的，他聲言「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確有大無畏的精神。但在做法上，却不講策略，未能因勢利導，未能等待四人幫充分暴露的時候才後發制人，而是在四人幫未充分暴露、許多幹部和羣衆對他們的罪惡活動認識不多的時候就想先發制人。而且在鄧小平的一些講話和主持草擬的文件中，還有對文化大革命評價、認識不足的意味。這樣，就被四人幫捉住了痛脚，成爲被攻擊、批判的對象。有些人甚至認爲，「不怕第二次被打倒」這句話儘管有勇氣，但却仍是從個人方面考慮較多，未考慮到自己被打倒後，給四人幫製造了上台的機會，影響到黨和國家的前途。

二、七六年的激烈鬥爭

一九七六年初，周恩來去世，毛澤東病重，四人幫在轟倒了鄧小平以後，各種罪惡活動

就猖獗了十倍以上。外貿部門最近揭露四人幫千方百計從國外進口篡黨奪權所需要的器材、高級奢侈品和糜爛生活用品，一九七五年他們進口這類東西達一百多萬美元，一九七六年一至九月增加到一千多萬美元。這一個增長數字，足以說明他們的罪惡活動在一九七六年也正是成十倍地增長。

一九七六年，政治局開會仍然是常常爭吵得很激烈。不同的是，在四人幫打倒了鄧小平以後，就把矛頭主要指向華國鋒了。這四個人的嘴巴大，在政治局的資格老（他們大都是「九大」以前入政治局的，而其他人，大概除了葉劍英、李先念之外，都是「十大」以後才成爲政治局委員），地位高（除了毛澤東之外，在他們之上的只有華國鋒），因此在政治局開會時是很霸道的。據報道，去年三至六月中央召開的三次會議上，四人幫就連續像「排砲」似地發動對華國鋒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的圍攻。張春橋說：「在我們黨內，首先在政治局內部有資產階級，有買辦資產階級」。他們大肆攻擊成套設備的進口。華國鋒指出「進口的大項目，都是經過毛主席批准的」。張春橋就喊着：「你們總是拿主席來壓人！」據說華國鋒爲人，很能沉得住氣。他在實際工作中處處頂住四人幫的干擾，但在表面上却不動聲色，不像鄧小平那樣同他們硬碰。也就因此之故，四人幫看不起華國鋒，說他「蠢」，是「土包子」。針對這種說法，據說毛澤東曾指出，華國鋒同志有地區、省和中央的領導工作經驗，

爲人「厚重少文」（劉邦評周勃語），「不蠢」。並指出：「要造這個輿論，要宣傳華國鋒同志，要使全國人民逐步認識華國鋒同志。」

華國鋒大概不像鄧小平那樣才氣縱橫、鋒芒畢露、與衆不同，但他作風民主、平易近人，能團結其他人一起工作，能發揮大家的積極性，「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在這方面，看來四人幫是估計不足的。因此，在毛澤東逝世後，四人幫就認爲華國鋒已失去了大靠山，於是向他發動明顯的進攻，迫他讓位，發出「按既定方針辦」的進攻訊號。四人幫看不到華國鋒的眞正靠山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廣大幹部，是人民，想不到這個「厚重少文」的人，在時期成熟時，也會採取迅速果斷的行動。

據一些在民間流傳的消息說，在毛澤東去世後，中央政治局在九月十九日開過一次會，會上江青提出要取得毛澤東的遺稿、手迹，經過激烈爭辯後，政治局多數決定毛澤東的遺稿、手迹應由中央辦公廳保管，即由汪東興負責。九月廿九日，中央政治局開會又大吵一場，會上江青又提出遺稿、手迹問題，華國鋒表示在上次會議已作了決定，不必多談了；華國鋒並在會上出示毛澤東的手迹：「照過去方針辦」，指出「按既定方針辦」錯了三個字，以後不要引用了。經過這兩次交鋒，四人幫即着手搞政變奪權。王洪文曾接見上海民兵領導小組，說要上海建立「第二武裝」，「正規化」。張春橋派秘書到上海傳達他的意見：「上

海有大考驗，要準備打仗。」上海方面即作了戰爭部署，並把新式槍械發給了民兵。這段期間，張春橋、姚文元分別在筆記上寫着：「鎮壓」、「殺人」、「槍斃一批反革命份子」、「專政不是綉花」等字眼（這些筆記均在四人幫被捕後從他們住處搜出）。也就在這段期間，四人幫的親信到處發動人們寫信給江青勸她接毛澤東的班，張鐵生在遼寧省更露骨地表示，說好比一個家庭，父親死了，留下老大、老二、老三，現在老大當家，但是老大靠得住嗎?他表示懷疑。

另外還傳說，在十月四日「光明日報」發表梁效文章影射攻擊華國鋒之前，江青曾到保定，要調動第三十八軍入北京，說北京可能有變亂，要入京勤王。三十八軍是四人幫長期經營插手的軍隊，其中有幾個負責人可說是四人幫的親信，只是最高負責人之一（軍長或政委）對此事有些懷疑，因此打電話請示北京。中央軍委的覆電是：北京很平靜，軍隊不必移動，請好好保護江青同志回北京。同一時間，毛遠新又從瀋陽軍區調動一個坦克師入京，軍隊到了山海關，就給中央軍委打電話請示，覆電是：「原地待命。」談到四人幫這次調不動軍隊，也有人說是鄧小平的功勞。因爲鄧小平在擔任總參謀長時，對各軍區首腦作了大調動，恢復了軍隊中政委的權力和制度，軍人在各省市不再有行政權，相反地各省市的第一書記則多兼任該地軍區第一政委，從而加强了「黨指揮槍」。另方面，據說鄧小平又規定，軍

隊的移動，在軍區內，要經過司令員和政委的批准；軍隊要調離所屬軍區，即使是一個師，也得中央軍委批准。這些制度使四人幫這次調動軍隊發生困難。

三、華國鋒如何當機立斷？

事實擺在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的面前了：四人幫調動軍隊，製造輿論，密謀政變，露出了篡黨奪權的殺機。怎麼處理呢？軍隊的移動已受到制止，可以再警告四人幫，可以在政治局內繼續批評，可以在防止他們進行罪惡活動方面採取措施。採取上述這些做法比較簡單，但問題將會繼續存在，仍有動亂的危險。

華國鋒親自作出了把四人幫逮捕進行「隔離審查」的決定。一般人談起這件事時都認爲，作出這樣的決定是需要很大勇氣和魄力的。因爲他要考慮到：提出採取這樣果斷的行動時，如果其他人反對，那麼華國鋒本人就遇到麻煩了；而如果得到其他人的支持，也仍然會有一大堆問題擺在前面，包括：上海搞獨立政變的問題、其他地區的四人幫親信起而搗亂的問題，接管四人幫控制的文化部、輿論工具等問題，蘇聯會乘機應一些敗類之邀而插手的問題，影響毛澤東聲譽的問題，友好國家及各國共黨不理解的問題，四人幫附從者、外交部長喬冠華仍在國外的問題，接着而來的揭批四人幫的步驟問題，還有其他工作的問題。

華國鋒作出這樣的決定，說明他看到了人民的意願，對廣大黨員、幹部和羣衆有信心，相信人民有克服任何困難的力量，並把個人的得失置諸度外，一切以人民的利益爲重。

中共報刋說人民對四人幫的禍國殃民的罪行，早就「看在眼裏，恨在心頭」。這是確實的。除了這兩句之外，恐怕還有一句，就是：「憋在嘴裏。」人民有話不能講，有恨不能宣，心情沉重，有受壓的感覺。四人幫被粉碎，的確是「人民大解放，思想大解放，生產力大解放」。很多人把這次粉碎四人幫的行動，比喻第二次解放。

很多人都相信，四人幫是遲早沒有好下場的，因爲他們倒行逆施，因爲他們不得人心，因爲他們沒有羣衆，因爲他們逆歷史潮流而動。但是，人們却想不到他們會垮得這麼快，想不到華國鋒和黨中央其他領導人會在毛澤東去世一個月不到、四人幫剛露殺機時就痛下決心。因此，他們對四人幫事件儘管「早有所料」，但仍覺「來得突然」。一些幹部獲知這消息時感到如同天降喜訊，有的人徹夜失眠，有的人甚至如小孩子一般，半夜起床，走來走去，煮一碗湯團，一邊吃一邊自言自語說：「這個是江青，這個是張春橋……。」

一般來說，大陸人民並沒有像海外那樣，對這次事件產生「爲什麼不及早處理」的疑問。他們大都覺得在毛澤東逝世後立即處理這件事，正是時候，而且覺得華國鋒在這件事上是抓得緊、抓得快，表現了他的英明、勇氣和魄力。由於這件事，使華國鋒獲得了廣大幹部

和人民的擁護，這是只要在內地同一般人有所接觸，都會感覺到的。

四人幫被粉碎三個多月，國內外大事，千頭萬緒，中共中央和華國鋒究竟抓些什麼主要工作呢？海外報刊不斷揣測將會開三中全會，開中共「十一大」，解決人事問題，等等。看來這些都不是當務之急。在這段期間，中共當局首先穩定上海及其他有四人幫親信插手的地區，讓各地的中央委員留在當地抓工作，以安定國內局勢；並試驗氫彈和人造衞星，以防阻蘇聯的軍事威脅。局勢基本上得到穩定之後，即公佈這事件，並開展羣衆性的揭批四人幫運動。隨着召開人大常委會，作急需解決的人事安排（如外長職位的任免）。而最主要地，把力量放在「抓革命，促生產」方面，鼓舞人民把揭批四人幫的熱情投到生產建設中去，把受四人幫破壞的經濟損失奪回來；在短短的時間內，接連開了煤炭、鐵路的會議，「工業學大慶」的籌備會議和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據說，原定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在今年一月召開，但華國鋒認為應在元旦前閉幕，以便與會者回到各地去準備開展春耕。

這一連串的工作顯得極有步驟，而且表現出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幹部的朝氣勃勃、幹勁十足、力爭上游的精神，贏得了人民的信心和好感。

當筆者問一些人：如果江青政變成功而上台，他們會不會也像現在那樣在街上遊行擁護？人們想了一想，然後表示：為顧全大局，避免混亂和引來外敵的覬覦，也許他們會像天

安門事件後那樣作例行公事的遊行，但他們決不會在私底下表示同一的態度；相反地，他們會對四人幫的政令，或消極抵制，或積極對抗；他們相信四人幫上台是決不會長久的，只不過，國家和人民可要遭到災難了。

從他們的談話來看，這次的政治大變動能夠進行順利，全國形勢穩定，各級幹部和人民同中央配合緊密，兩個多月來的全國工作推進流暢，的確是同人民的政治覺悟有關的。正如華國鋒的講話所說，「人民是歷史的主人，人民回答了問題。」試想，不關心國家大事，只顧個人安逸的人們，會對國家的政治事件作這樣强烈的反應嗎？

四、「論十大關係」是今後的藍圖

十二月廿六日，中共報章發表了毛澤東的文章「論十大關係」。二十七日，筆者同一位當幹部的親友在閒談時，談起這篇文章，他興奮地說：「那說得多好！共產黨的政策是歷來如此的，過去我們也是基本上照這樣做的。四人幫搞的是另一套，所以我們很容易就看出他們執行的不是毛主席路線。」

據說，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於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了以後，講話稿曾發到全國給十三級以上的幹部閱讀。（十三級幹部，大約相當於縣委書記一

級。）後徵集了各地意見，再作修改，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當時，讀過這篇文章的幹部是不少的，即使沒有讀過，一般幹部對其精神也是有所了解的。

「論十大關係」的主要精神、基本思想，就是文章最後所說的：「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爲一個强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從各方面調動積極因素，盡量爭取化消極因素爲積極因素，就是這篇文章的要點。

十大關係，都是矛盾。解決、處理矛盾的辦法可以有多種途徑。例如對待反革命份子，把他殺掉也是一種解決矛盾的途徑；但從調動積極因素的思想出發，就要實行「一個不殺，大部不捉」。在這篇文章裏，毛澤東講了實行這種政策的好處。同樣，對待其他九種關係，也有消極地解決矛盾的辦法，而毛澤東提出的則是調動積極因素的辦法。

十大關係所說的十種矛盾，每一種都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基礎，是重點，矛盾的次要方面是應該調動其積極因素來爲基礎、重點服務的。例如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重工業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衡量一個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程度的標誌。而輕工業和農業則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應盡量調動其積極因素，才是眞想發展重工業的做法。

「論十大關係」又具體地說明了對十個最主要問題的政策。對一個黨和國家來說，政策是十分重要的，毛澤東曾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可見重視。政策是按實際情況來制訂的，而不是憑主觀願望制訂的。因此，在中國大陸，儘管可以而且應該宣傳共產主義精神，大公無私、先公後私的道德品質，完全徹底爲人民服務的思想，但是作爲國家的政策，却要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也就是說，意識形態上可以宣傳大公無私，但作爲政策却要公私兼顧。意識形態上要宣傳爲革命種田、爲革命做工，應提倡艱苦樸素，反對把個人物質利益看得高於一切，但作爲國家政策，却不能不關心羣衆生活，不顧個人利益，不調整工資，只是一味叫人民爲革命苦幹。在處理十大關係中，要注意政策的界線，也被認爲是這篇文章的一個重點。

總的來說，「論十大關係」可以說是在社會主義這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適合中國情況的基本思想、基本政策和基本方針。

中共在經過重大轉折之後發表這篇文章，一方面明白表示今後將遵循貫徹這篇文章所揭示的原則，另方面也讓人們拿這篇文章所說的來和四人幫搞的一套對比，看看四人幫是不是執行毛的路線。

五、對一九七七年的展望

在廣州，同時引起人們熱烈談論的是十二月廿八日發表的華國鋒在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這是華國鋒當上最高領導以後的第一個長篇講話。這個講話回顧了「極不平凡」的一九七六年，並提出了一九七七年的「主要戰鬥任務」。人們主動地在街頭、在店舖、在公共汽車上談論這個講話，證明這個講話說出了許多人關心的問題。

華國鋒提出的一九七七年的四個主要任務，第一個，而且被列爲「中心任務」的，就是「深入開展揭發批判四人幫的偉大羣衆運動」。

在廣州，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揭批四人幫的運動是人民的自覺要求和需要。長期以來，由於四人幫控制輿論，對的被他們說成錯的，錯的又被他們說成對的，顚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確把人們的思想搞亂了。人們的覺悟提高以後，對他們所講的就越來越懷疑。過去不敢講，現在要痛痛快快講出來。許多被搞得含糊、混亂的事情，也需要通過揭批運動加以澄清，以便分清是非，有所依循，做好工作。

此外，在貫徹華國鋒提出的其他三個主要任務的過程中，也要通過揭批四人幫運動，才能結合實際，解決所存在的問題。

就以第二個主要任務——「加强黨的建設」來說吧，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和傳統作風，被四人幫破壞得也夠厲害了。必須通過揭批四人幫，才可以恢復和加强「黨的民主集中制」，

「發揚黨的優良作風」。

華國鋒在這個講話中，申述了黨的生活的準則，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和紀律，重申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黨內、人民內部的民主生活，指出要「讓人講話，讓人批評，允許少數人保留不同意見」；又提出要在一九七七年「在全黨範圍進行一次整黨整風」，「恢復和發揚我們黨的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羣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即「三大作風」。）

許多人談到這一點的時候，都表示，原來的民主集中制的準則、紀律、制度等等，是基本上好的，三大作風也是重要的；可是，在一段時期，由於四人幫結幫營私胡搞一通，這些制度、準則、紀律、作風都被破壞了。據說葉劍英曾表示，過去一段時間的黨內生活極不正常。他說的是上層，其實中下層亦復如此。尤其是天安門事件以後，四人幫大搞所謂「追查謠言」，使人們有話不敢講。老一輩的人談起那時的政治低氣壓，竟說使他聯想到國民黨時代在茶館中懸掛的「莫談國事」的牌子。

「共產黨一貫的做法，是有話拿到桌面上說，有問題擺開來解決。但在四人幫倒台前的一段時間，我們都被搞得口是心非了。」有一個人憤憤地對筆者這樣說。

華國鋒談到的第三個主要任務是「努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也是人們關心和期望的事。

四人幫對生產的破壞，看來是十分嚴重的。有人甚至對筆者說，如果讓四人幫再胡搞半年，整個國民經濟都可能要垮台。在一些四人幫插手的地方，如雲南、貴州、四川、福建、浙江、江西六省，幾年來的農業生產遭到很大破壞。最嚴重的是王洪文插手的溫州地區，誰抓集體生產，誰就被批評「唯生產力論」，結果集體生產無人管，使這魚米之鄉的農田荒廢，而自留地的莊稼却長得茂盛，弄到後來有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分給農民單幹，加上黑市買賣猖獗，實際上是走資本主義回頭路了。此外，四人幫搞亂鄭州（全國鐵路交通的樞紐），以「寧要社會主義晚點」來破壞運輸；又以「保上海」爲名，在上海半路攔截運往各省市的原油，使許多省市的工廠企業由於缺乏原料和燃油，而不得不停產停工。據說廣東的潮州地區，有些工廠由於長期停工，發不出工資，竟至要出賣設備。這也同資本主義社會的工廠倒閉相類似了。

華國鋒引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的話說：「只有經過社會生產力的比較充份的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獲得了自己的比較充份的物質基礎。」大陸的人民多以親自的體會來說明這句話的眞確。山東許多地方都沒有自由市場，這是因爲一直頂住四人幫的干擾，生產發展得好，副食品充裕而且價廉，自由市場也就沒有存在的需要。大寨沒有自留地，其中一個原因是人們從集體農田上勞動所分得的利益多於在自留地上所得。相反

地，溫州却復辟了資本主義。因此，如果沒有充份的物質基礎，光是空喊革命，用行政命令去取消自留地、自由市場，是不中用的。

廣州是過去能頂住四人幫干擾的地方。但在原料、燃油供應方面，尤其是在思想方面，却也不能不受到四人幫對生產的破壞。工廠幹部抓生產，會被人稱爲「光拉車不看路」；工人遵守勞動紀律，依時上下班，會被人稱爲「奴隸主義」。在這種是非不分、負担不均、獎罰不公的狀態下，磨洋工就成爲相當普遍的現象了。現在，這種情形已有改變，各工廠的工人都提高了生產積極性，工廠掛起了橫額：「八小時內拚命幹，八小時外多貢獻！」表示不但要遵守勞動紀律，而且要主動加班加點，俾能爲社會主義提供更充份的物質基礎。許多人表示，不能像四人幫那樣「大吃社會主義」，要學大寨人那樣「大幹社會主義」。

華國鋒提出的一九七七年的第四個主要任務，是學習馬列著作和毛澤東著作。

不可否認，中共的理論工作在過去一段時間是比前落後了。這是由於四人幫控制了理論宣傳工作，大搞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因而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亂。當然，人民在這十年裏大學馬列毛著作，覺悟是普遍提高。但出現在報刊上成爲理論的東西，在四人幫主持筆政之下，是很糟的。（人民覺悟高而報刊水平低，正是四人幫垮台的另一原因。）尤其是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和生動活潑的文風，過去更受到殘踏破壞。在廣州，許多人都高

與地指出，現在報刊上的文章好讀得多了，大都是充份擺事實講道理的文章，而不像四人幫控制輿論時的文章那樣，不講事實，只放空砲。人們渴望有更多的好文章出現。華國鋒提出的這項任務，也是符合人們意願的。

人們又談到，爲什麼在四人幫干擾破壞的時期，有人敢頂，有人抵制，有人受騙，而有的人像毛澤東所說的，「今天刮北風，他是北風派，明天刮西風，他是西風派，後天又刮北風，他又是北風派」呢？那完全是因爲有的人學習得好，而有的人學習不夠或學風不正所致。因此，今天在大陸，學理論著作，將不會再是敷衍將事，而是成爲人們的一種需要了。

六、鄧小平會復出嗎？

在廣州，人們除了熱烈談論上述這些問題之外，也有不少人在議論鄧小平問題與天安門事件。

一般來說，人們對鄧小平是有好感的，覺得他有才幹，有水平，敢於同四人幫鬥爭，有一種大無畏的精神，是「一條硬漢」。尤其是四人幫搞批鄧的時候，印了鄧小平主持製訂的所謂「三株毒草」——即簡稱爲「論總綱」、「滙報提綱」和「二十條」的三個文件——供羣衆批判。許多人看了這三個文件，當時就覺得根本不是什麼毒草，而是反對修正主義、形

而上學、唯心論的文件，是同四人幫作鬥爭的理論。有人甚至認爲，這三個文件「充滿馬列主義」。對比起來，四人幫用來批這三個文件的文章，反而是强詞奪理，充滿片面性的東西。因此，從去年鄧小平被撤職以後，許多人都爲他不值。尤其是回顧一九七五年鄧小平主持工作時，形勢確是比四人幫大肆搗亂的一九七六年十月前好得多。於是，四人幫被粉碎後，很多人都希望鄧小平重新恢復工作，從而把國家搞得更好。

鄧小平有沒有錯誤呢？多數人認爲他在一九七五年是犯有錯誤的。至於是什麼錯誤，則各人看法不同。有人認爲他的確說了一些對文化大革命全盤否定或至少是評價不恰當的話，也就是確實有「翻文革的案」的言行；也有人認爲他的錯誤只在批四人幫不得力，未能團結其他同志一起進行，因勢利導，後發制人，而是過早地同四人幫硬碰，從而造成了他自己下台並給四人幫搗亂的局面。但不管怎樣，現在大概從官方到民間都認爲，即使鄧小平有錯誤，也屬人民內部矛盾了。

一種據說是接近官式的講法，也在民間流傳：「鄧小平同志有錯誤，毛主席說要批評，但是四人幫却另搞一套，目的是打倒鄧小平同志以便他們上台。」既然仍是「同志」，只不過有錯誤，要批評，仍屬人民內部矛盾，那麼「人誰無錯」，爲什麼不能讓他復出工作呢？

這裏面又牽涉到天安門事件，以及當時中央就這事件所作的關於鄧小平問題的決議了。

鄧小平如要復出，看來中共至少需在內部澄清天安門事件，及毛澤東有關批鄧的指示。

廣州有不少人認爲，天安門事件是由四人幫搞的旨在嫁禍鄧小平的「反革命事件」，有點類似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搞的「國會縱火案」。（當時希特勒黨徒焚燒國會大厦，誣稱共產黨人所爲，大肆逮捕，加强恐怖行動。）但也有人認爲天安門事件的背景複雜，除了絕大部份人是悼念周恩來和反對四人幫的之外，也有極少數人是有其他未查明的目的的。因此，這事件仍在細緻調查中。但這件事與鄧小平無關，則大致可以肯定。

天安門事件以後，兩個決議是怎樣作出來的？據流傳的消息說，當時政治局開會爭吵不休，結果以一個決議換另一個決議，作爲一種妥協。毛澤東病重，沒有出席會議，他的提議是由毛遠新代爲傳達的。在一年多的時間內，毛遠新作爲四人幫安插在毛澤東身邊的聯絡員。這一年多來，毛澤東臥病在床，書報都少看了，通過毛遠新傳達的毛澤東的語錄，有可能是經四人幫僞造篡改的；也有可能是毛澤東所指的是某一件事，而被斷章取義地引用來指另一件事；甚至也可能是毛澤東根據毛遠新提供的虛僞的情況而作出的。對這三種情形，都需要在審查毛遠新告一段落時，才能澄淸。由於其中涉及批鄧的語錄，因此鄧的復出也要等到這之後了。

筆者所接觸到的人，大都認爲，鄧小平的復出恐怕只是時間問題。

七、走向大治的一年

十二月廿六日，毛澤東誕生八十三週年。在這一天，廣州報章除了刊登「論十大關係」之外，還刊登了好幾張毛澤東的照片，這些照片都是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合照的，人們感興趣地看到照片上有久違了的賀龍、陳毅等人。

在華國鋒的講話中，談到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董必武、康生這些「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相繼逝世，確實給我們黨中央的領導帶來了極大的困難。」

中共兩報一刊在一月一日發表的元旦社論，强調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敬愛的周總理以及老一輩的革命家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

比對一下四人幫未垮台之前，他們所强調的只是「毛主席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抹殺了周恩來和其他革命家的貢獻。這是很不合理的。人們指出，四人幫的目的是要架空毛澤東，抹殺老幹部的功勞，打擊大批老幹部，以便他們上台。

人們談論這一個改變，認爲是重要的改變。這不但是給歷史作一個公正的評價，而且顯示中共今後的領導，將强調集體的作用。

華國鋒的講話又指出，一九七七年是「走向大治的一年」。從廣州羣衆對這一句話的反

應來看，相信他在會場上講到這一句時，是掌聲雷動的。

據說華國鋒在講話中，一共被掌聲打斷了數十次。但這個講話稿發表時，沒有像以前某些講話稿那樣，插進「熱烈鼓掌」的字眼。從這裏，也可以看到華國鋒和目前中共當局的一些作風。

除夕，廣州電視台轉播在北京體育館的文藝演出，許多久違了的藝術家都在螢幕上出現了。諷刺四人幫的笑聲和懷念周恩來的歌聲，使演出者與觀衆的感情水乳交融。淸晨，聽收音機傳來元旦社論的廣播，當讀到：「我們一定能夠造成一個政治上生動活潑，經濟上繁榮昌盛，科學文化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人民生活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改善的嶄新局面。」我想，這種局面也許隨着新年的脚步開始到來了吧。

論四人幫的「批鄧」運動

一、前言

鄧小平復出的問題，是當前中國局勢中最受各方輿論注意的問題之一。鄧小平會不會復出？什麼時候復出？復出後担當怎樣的職位？這些問題幾乎每隔幾天就會在一些海外報章的大標題中出現。特別是今年一月紀念周恩來逝世一周年時，北京出現了要求鄧小平復職的大字報，中共官員在會見外國訪客時稱鄧小平「同志」，更增加了鄧小平復出的迹象以及引起各方的揣測。

但是迄今爲止，鄧小平仍然呼之未出。原因何在呢？筆者在上期的拙作中，曾認爲對於鄧小平的錯誤、毛澤東有關批鄧的指示、天安門事件以及其後中共中央關於撤銷鄧小平職務的決議，均尚待澄清；鄧的復出須在上述問題得到澄清之後。

要澄清上述問題，當然要回顧過去兩年，從鄧小平執掌大權到被撤職的種種事實，特別

是要重新研究四人幫控制輿論時期的「批鄧」文章，看看是否眞有道理。這樣就可以認識鄧小平是否有錯、錯在哪裏、應否被撤職等等問題。只有搞清楚鄧小平與四人幫之間的是與非，才能確定鄧小平的復出問題。而搞清是非的意義其實更遠較鄧小平的復出問題重要，因爲它對中國的未來和人們的認識，都有長遠的影響。

在本文中，筆者將對鄧小平的政海浮沉，作一簡短的介紹，並對四人幫的「批鄧」文章，作初步的分析。

二、鄧小平的一生

在當代世界政壇人物中，鄧小平的一生也許是最富戲劇性的了。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一般來說，一個政壇人物被打倒以後是很難有翻身機會的，但鄧小平却兩次被委以重任，兩次被打倒，而現在更極有可能第三次被委以重任。這樣的兩下三上的人物，相信即使在歷史上也是極少見的。

出生於一九〇二年的鄧小平，是四川省嘉定人。他早年參加留法勤工儉學，在法國成爲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批黨員之一。歸國後參加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國內革命戰爭，一九三四年參加長征。抗日戰爭時，鄧小平是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委員，以太行山爲依據發展了强大的

冀魯豫軍事力量。後又擔任中共中央軍委會總政治部主任。抗戰勝利後，鄧小平擔任中原野戰軍的政治委員（司令員是劉伯承）。當時的劉鄧大軍在國共內戰時作戰最艱苦，而所立的戰功最大。特別是一九四七年七月，劉鄧大軍渡過黃河，在兩個月內躍進千里，像一把尖刀插進大別山，東脅南京，西臨武漢，使共軍一下子從內線作戰轉為外線作戰，使戰爭從在共區內進行變為打到國民黨統治區進行，共軍也就以此為轉機，從戰略防禦變為戰略進攻。一九四八年淮海戰役和一九四九年初的渡江作戰，中共二野和三野共六十餘萬軍隊聯合作戰，二、三野的領導者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粟裕、譚震林五人組成總前委，由鄧小平擔任總前委書記，統一領導兩個野戰軍作戰。其後劉鄧大軍又打進西南，在險要地形中屢戰屢勝。中共建國後，鄧小平先是擔任西南局第一書記，五二年任副總理，五四年兼財政部長及中共中央秘書長。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鄧小平作修改黨章報告，並被選為政治局常委和中央總書記。他擔任這個職務並兼國務院副總理直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他受到批判時止。在這段期間，鄧小平曾於一九六三和一九六五年周恩來出國訪問時担任代總理。又於一九六三年七月率中共代表團往莫斯科與蘇共進行激烈的談判，據說談判過程的每一句話都被紀錄，後印成一本厚厚的文件傳達到縣、團級的幹部。大陸有不少人對鄧小平與蘇共論戰的鋒利語言，是至今仍津津樂道的。

一九六六年文革後，鄧小平作爲執行劉少奇路線的第一號人物受到批判。一九六八年底，中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林彪和四人幫曾提出要把鄧小平和劉少奇一起淸除，但毛澤東認爲鄧小平的性質與劉少奇不同，因此對鄧小平不作處理。只是，鄧小平的名字自一九六七年起已從中共報刊上消失了。

一九七一年林彪倒台。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在周恩來宴請越南領導人的場合，鄧小平出人意表地由王海容攙扶着出席，引起了外國記者極大的興趣。當時鄧小平的職位是副總理。

據說一九七一年林彪倒台時，鄧小平正在幹校勞動。他在一般幹部都已聽到林彪事件的傳達之後，才同低層職工一起聽傳達。其後，鄧小平寫了一封信給中共中央，大意是說：他聽到林彪幹出這樣傷天害理的事，感到十分氣憤，他同林彪不很熟，但也願意投身到批林運動中去；過去他執行修正主義路線，是犯了錯誤的，他誠懇地接受羣衆對他的批判，永不翻案；目前他身體尙好，希望黨能安排他一些普通的工作，使他能夠爲黨和人民貢獻餘生。他的這封信在一九七二年向全國幹部傳達了，顯然是在爲他的復出作思想準備。其後，鄧小平就被分派到一間工廠當幹部，直至一九七三年四月恢復副總理的職位。

一九七三年鄧小平復出後，由於他對國務院的領導工作有豐富的經驗，加上周恩來患

病，因此他的職位就越來越顯得重要了。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時，鄧小平被選爲中央委員。一九七四年初，他排名上升，顯然已被選進政治局。據說在一九七三年底，毛澤東派鄧小平與王洪文到各地視察，回北京後，毛澤東向他二人分別提出同一個問題：「我死了以後，全國會出現怎樣的局勢？」王洪文的回答是：「全國一定緊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加强團結把革命進行到底！」鄧小平的回答則是：「全國將出現軍閥混戰，天下大亂。」毛澤東認爲鄧小平說的對，於是委派鄧小平任解放軍總參謀長，並在七四年初將各軍區首腦作一次大調動。

一九七四年，周恩來病更重了。鄧小平在這一年裏，逐漸接替周恩來在國務院的許多繁重工作。他的才能與魄力是無可懷疑的，他的威望也在逐漸恢復中。在國外，他出席聯合國特別會議，發表了名噪一時的「三分世界」的論點；在國內，他支持一批老幹部復職，穩定了各地的領導班子。然而，在政治局，鄧小平的才能却受到四人幫的嫉忌和打擊。一九七四年十月，四人幫藉「風慶輪」事件向鄧小平進攻，江青與鄧小平在政治局吵了一架，使政治局一個多月開不成會。同時，四人幫密謀組閣，醞釀在一九七五年一月的四屆人大由張春橋任第一副總理，以便接替周恩來的位置。

一九七五年一月，中共召開十屆二中全會，在毛澤東和周恩來支持下，鄧小平任中共中

央副主席，使鄧的黨內地位居張春橋之上。同月召開的四屆人大，也就很自然的由鄧小平擔任了第一副總理。

一九七五年，是鄧小平最活躍的一年。他身兼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掌握了黨、政、軍三方面的大權。加上周恩來病重，鄧小平實際上是擔任了代總理的職務。在這一年，由於周恩來在四屆人大提出了在本世紀內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規劃，使到全國上下人心振奮，都想盡快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鄧小平在這樣的形勢下，也顯得精力充沛，一方面代替周恩來進行了所有的外交談判，另方面在國內一連主持召開了六個全國性的生產會議（鋼鐵、煤炭、鐵路運輸、國家計委、科研、農業學大寨），雄心勃勃地要整頓文革以來受到破壞的生產秩序，一心要促進國民生產的大步發展。特別是農業學大寨會議以後，各省組織工作隊下鄉，進行基本路線教育，加速在各地建設大寨式的縣。工礦企業則組織三結合的規劃團，各自提出宏偉規劃，大搞設備會戰、高產會戰，掀起生產建設的高潮。

然而，到一九七五年底，一個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出現了。照當時及其後的中共報刊所說，在一九七五年七、八、九三個月，「陰風四起，種種奇談怪論出籠」，形成一股「右傾翻案風」，目的是「要翻文革的案，算文革的帳」，而鄧小平則被指爲是這股

「右傾翻案風」的「風源」。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逝世後，鄧小平在一月十五日出席了追悼大會，並致「悼詞」，隨後他就消聲匿迹了。四月七日，鄧小平因天安門事件被撤去了黨內外一切職務，僅「保留黨籍，以觀後效」。然後直到九月，是鄧小平處於最低潮的時期。政壇上失去了他的踪影，他的名字成爲批判的目標。批判什麼呢？主要是指一九七五年七、八、九三個月在社會上的種種「奇談怪論」，而尤其是指「鄧小平授意炮製」的所謂「三株毒草」——這三個文件被認爲是社會上「奇談怪論」的總根源。究竟「奇談怪論」是什麼？所謂「右傾翻案風」是怎樣刮起來的？「三株毒草」的主要內容是什麼？鄧小平和「三株毒草」又有什麼關係？這些聯繫到鄧小平是否有錯、錯誤性質以及會否復出的大問題，下文將作一個初步的探討。

三、所謂「奇談怪論」種種

被「批鄧」文章指爲「奇談怪論」的，究竟有些什麼具體內容呢？

當時的文章儘管語焉不詳，但仍可以歸納出，被稱爲「奇談怪論」的，主要是指教育界、科技界、文藝界的一些據說是來源自鄧小平的言論；此外，則是並沒有摘出內容的所謂

「謠言」。

在教育方面，被指爲「奇談怪論」的是：「說什麼文化大革命以來，教育革命這也不行，那也不行，教育革命的方向總沒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文革以來，學校放鬆了文化教育，强調勞動實踐，忽視基礎知識和基礎理論的教學，所以學生知識質量差，面臨着一個科學技術事業後繼無人的問題。」「文革以來，由於教師不敢大胆管教學生，學校沒有一定的規章制度，連考試、升留級、學生獎罰、考勤等制度也沒有，青少年中無政府主義思潮氾濫。這樣下去將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社會主義的中國靠什麼人來接班呢？」

在科技方面，被指爲「奇談怪論」的是：「在科技界，右傾翻案風的鼓吹者，却打着科學技術特殊的招牌，公然宣稱：『科技戰線不要提無產階級專政』」。「片面强調馬克思主義不能代替自然科學，藉以反對馬克思主義對自然科學的指導。」又有人認爲「不宜籠統提開門辦所」，「聯繫實際多了，理論就壓倒了」；「强調與工農相結合，使人不敢搞理論。」還有人提出，科技界「要由熱心科學的外行來領導。」

在文藝方面，被指爲「奇談怪論」的是：「現在文藝生活太貧乏，要多演好戲，多搞文藝創作，八個樣板戲怎能滿足八億人的需要呢？」「樣板戲是一花獨放」；等等。

以上引號內的文字，都轉引自當時的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章。這些議論有沒有

被歪曲及斷章取義且不論，就以所引述的話來說，其實只是正常意見的表達，毫無奇怪之可言。

事實上，文革以來，對教育、文藝、科技等方面的衝擊很大。誠然，文革對修正主義路線的批判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批了以後，怎樣開展工作，開展工作以後哪些是做得對的，哪些是做得不對的，應該不斷總結，以便得到提高。特別是四屆人大以後，面臨着經濟起飛的局面，提高一般文化知識水平和科技水平是當務之急，上述關於教育和科技的議論正是針對當時的局面而發，應該說，那些意見是基本上提得對的，是切合實際的。

在今天，中共粉碎四人幫之後，回過頭來看這些被指爲「奇談怪論」的種種言論，其實正是針對當時四人幫的眞正奇談怪論而發。

在教育方面，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八日，張春橋發出了一次眞正的奇談怪論，他說：「一個是培養有資產階級覺悟的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一個是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你說要什麼人？我寧要一個沒有文化的勞動者，而不要一個有文化的剝削者。」針對這種否定文化知識、宣揚「讀書無用」的言論，以及針對文革以來由於靑少年起來造反而造成的學校混亂、無秩序的局面，上述被指爲教育界「奇談怪論」的意見正是爲了解決教育界的問題、把學校引上正常軌道而提出來的。但在當時，四人幫掌握了教育界的相

當大的權力，動輒扣人以「師道尊嚴」、「文化至上」、「智育第一」的帽子，特別是對於文革後學校的知識質量問題，更是只許說高，不許說低，否則就被指爲「鼓吹今不如昔」，「否定教育革命」，「否定文革」，「否定毛主席的英明領導」，甚至說是「要翻案」，「要復辟」，「要算總賬」。

科技界的情形也是這樣。經過文革衝擊以後，科技界如何正常地開展工作，怎樣才能得到迅速發展以適應經濟需要，是四屆人大後人們所關心的問題。文革提出「開門辦科研」的新方向，然而是否所有的科技人員都一律要到工廠農村去？提出了「科研項目要與生產實踐相結合」，是否就不必重視基礎理論的研究？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論，是否就可以代替自然科學？這些問題的提出顯然是有現實意義的，但卻被四人幫指爲搞「復辟」、「回潮」。當時，四人幫的眞正的奇談怪論是：誰要是認眞鑽研科學技術，誰就是「走白專道路」、「只專不紅」；誰正確落實知識份子政策，耐心幫助和熱情關懷知識份子，誰就是「在科技戰線上不提無產階級專政」；「要由熱心科學的外行來領導」，明明說是要由「外行」領導，卻被硬解釋爲「是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翻版」；毛澤東關於「又紅又專」的提法也被否定了，說這是紅與專並列，是折衷主義，應提出「以紅帶專」才是革命的，云云。

在文藝方面，人民的文藝生活貧乏是當時面臨的實際問題。電影除樣板戲外大部份是

「新聞簡報」，周恩來曾說過，他同西哈努克親王已成為中國電影的兩大主角。據說毛澤東也在一九七四年批評過，文革八年八億人民只有八部樣板戲。然而四人幫的眞正的奇談怪論是：人民「對樣板戲百看不厭，越看越愛」；「對待樣板戲是革命感情的問題，是一個對待江靑同志的態度問題，是一個怎樣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但是，世界上再好的戲，哪有百看不厭的呢？五十年代時中國大陸有一個流行的表演舞蹈「荷花舞」，由於造型優美和富民族風格，在國內外都受歡迎。但是此後不論什麼歌舞團體，演出節目中都有荷花舞，終於有人畫了一幅漫畫；一個老太婆拄着枴杖在跳荷花舞。這說明即使是眞正受羣衆歡迎的一個節目，多看也會膩了。

總的來說，被四人幫指為「種種奇談怪論」的，是當時人們在四屆人大提出的宏偉規劃的鼓舞下，從國家發展的需要出發，針對現實所存在的問題而提出來的。這些言論對四人幫一貫以來的形而上學的理論和脫離實際的做法，提出了批評和糾正，因此基本上是正確的意見。這些意見是否同鄧小平有關，雖未能確知，但就意見的內容來說，同鄧小平的看法接近，則是可以斷言的。

至於說一九七五年的「謠言四起」，其實只是指集中在江靑身上的一些傳言。

一九七五年七、八、九幾個月，剛好是江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內部受到嚴厲批評的期間。

江青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到小靳莊也說，去年這期間她在中央受整了幾個月，沒有自由，不能到處出遊。江青在政治局受整的消息，當時，也不曉得通過什麼途徑，很快就傳到全國各地來。由於人們多年來對江青很反感，就背地裏傳播種種傳言。有人說，江青因爲在一九七二年私自接見一個美國女作家，恬不知恥地叫人爲她寫自傳，所以現在挨批評；又有人傳說毛澤東曾生氣地說「要把江青攆出政治局」；又有人說在會議上朱老總很生氣，對着江青拍桌子大罵等等。在這些傳言中，江青向美國女作家羅克珊．威特克提供自傳材料顯然是事實，並非謠言。至於具體細節，特別是毛怎麼說，朱怎麼說，則因羣衆在背後傳來傳去，肯定有很多地方是加鹽加醋的了。不過這些傳言却反映了兩個問題：一是人民羣衆對江青非常不滿，千方百計想發洩一下；二是在當時中國大陸，人民沒有言論自由，對某些領導人有意見不敢公開提出，深怕受到打擊報復，於是就有所謂「謠言四起」了。

四、「右傾翻案風」和「反擊風」

「奇談怪論」是在社會上流傳的；而所謂「右傾翻案風」則被當時的「批鄧」文章指爲直接同鄧小平有關。四人幫控制下的中共報刊當時是這樣說的：「堅持修正主義路線的黨內走資派在去年七、八、九三個月，大刮冷風，發出種種奇談怪論，否定文化大革命……」按

這種說法，社會上的「奇談怪論」的來源是「黨內走資派」從上而下刮起的一股「右傾翻案風」，「風源」是鄧小平。

粉碎四人幫後，對「右傾翻案風」實有重新認識的必要。如前文所述，「奇談怪論」既然只是正常意見的表達，毫無奇怪之可言，那麼被指爲與此有聯繫的「右傾翻案風」也就不是什麼「右傾翻案」，而只是針對當時教育、科技、文藝所存在的問題提出的改革意見。這些改革意見顯然是同鄧小平有關的。看來是鄧小平和國務院其他領導人所提出的改革意見，揭到了四人幫和他們的追隨者的瘡疤，觸到了他們的痛處，於是引起了他們的歇斯底里的「反擊」，而誣指以鄧小平爲代表的正確意見是「右傾翻案風」。因此，筆者認爲，一九七五年並不存在「右傾翻案風」，但從一九七五年底起，却的確有一股「反擊右傾翻案」的「風」，這股「反擊風」的「風源」在清華大學，總後台是四人幫，首先刮起這股風的，是四人幫安插在清華大學的死黨、當時清華大學的黨委書記遲羣和黨委副書記謝靜宜。

針對鄧小平和當時的教育部長周榮鑫等提出的對教育工作的改革意見（這些意見反映了社會上的要求），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初，遲羣和謝靜宜在清華大學首先發動了「反擊」，他們挑動少數學生用大字報的形式批判當時教育界和科技界的「種種奇談怪論」，接着，北京大學也發動了「反擊」。這樣，「反擊風」就刮起來了。

從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初開始直到一九七六年三月，清華大學在這幾個月裏，出現了幾萬張大字報，舉行了幾百場所謂「辯論會」，把清華大學搞成「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樣板，在那裏成立了指揮部，企圖指導全國「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四人幫更在全國各地發動有關人員到清華參觀，以便回去後在各地煽起「反擊風」。

起先，大字報爭論的焦點是：「到底是誰拖了四個現代化的後腿？」這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對這問題，如能作坦誠的、公開的辯論，顯然是有益的。但是，四人幫指使遲羣、謝靜宜掀起的這場所謂大辯論，却另有目的。他們的目的是以單方面的所謂「辯論」來恐嚇羣衆，用白色恐怖、扣帽子等手段來壓制不同意見，他們只容許同意他們意見的人發言，不同意見的人不敢發言，就算發言也會招致圍剿式的反駁，直至被批倒批臭爲止。因此，「大辯論」不見有辯論的雙方，而是只有辯論的一方，其目的是打倒一批人，把矛頭指向鄧小平和周恩來。大字報的題目逐漸升級，發展爲：「右傾翻案風要搞現代化，還是要復辟？」「右傾翻案風」這名詞便在羣衆中公開露面了。大字報指出：「右傾翻案風以四個現代化作大棒，扼殺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向無產階級進攻。這說明，他們搞現代化是假，復辟資本主義是眞，衞星上天是幌子，紅旗落地才是眞意。」「刮右傾翻案風的人……，他們到處煽動人們刮『業務颱風』，『經濟颱風』，『八級不夠，就刮它十二級』，妄圖把無產階級政治，把階

級鬥爭這個綱，把黨的基本路線一古腦兒刮掉。」

這樣的大帽子一扣，好些人對當前國內存在的一些問題都不敢公開地談自己看法了。凡是過去說過一些對當時局勢不滿、有意見的話，都被認爲是「奇談怪論」，搞「右傾翻案」。「教育質量低」，「科技落後了」，「拖了四個現代化的後腿」等等，通通都被認爲是搞「復辟」。

「反擊風」從清華、北大刮到了四人幫所控制的輿論工具。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號的紅旗雜誌首先發表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批判組寫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指出當前爭論的焦點在於：「是堅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還是爲修正主義路線翻案，復辟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舊教育制度？」文章最後並指出：「現在，教育界的怪論就是企圖爲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翻案，進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教育戰線的這場爭論，是當前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組成部份。」

「右傾翻案風」就是這樣從清華刮到北大，再刮到全國。自此，清華、北大兩校便成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中心，四人幫控制下的輿論機構企圖以兩校運動的方向來影響全國政治運動的方向。「人民日報」記者的文章，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批判組的文章，以梁效、池

恒署名的文章，指揮全國的運動。據說，當時報刊文章的語調是和中共中央文件的精神不一致的。毛澤東指示這是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梁效的文章却採取兇惡的、敵我矛盾的語調，甚至歪曲毛澤東的指示，另搞一套。因此，當時中國大陸上許多人意見紛紛，有人憤怒地提出質問：「究竟當前是人民日報記者和梁效領導全國的政治運動，還是黨中央毛主席領導運動？」

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人民日報」記者的文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可以說是當時「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全國性指導文章。這篇文章主要說明幾個問題：第一，右傾翻案風的性質：教育界、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突出表現；右傾翻案風的鼓吹者把攻擊的矛頭指向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指向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第二，右傾翻案風的風源：就在黨內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些人在民主革命時期是積極的，到了社會主義時期，却處處跟無產階級對抗；走資派還在走，投降派確實有。第三，號召反擊：這是一場偉大的革命運動，必然會碰到阻力，主要的阻力來自黨內正在走的走資派；文章號召羣衆團結戰鬥，組成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揭露走資派的猙獰面目，並與之堅決鬥爭。

這篇文章發表後，人民都感覺到一場大的政治運動就要來臨。當時整個局勢，與三、四個月前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前後的情況相比，已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熱火朝天搞生產的局面不見了，四個現代化的宏偉規劃失去了踪影，誰也不敢提生產，誰也不敢講存在的問題和缺點，人們在沉默地注視將要發生的重大政治動盪。

經過了十多天，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報」記者又發表具有權威性的、指導當前運動的文章，題爲「要害是復辟資本主義」；接着二月十八日，發表田志松的文章「緊緊抓住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二月十九日又發表了以梁效、任明的文章——「評『三項指示爲綱』」。這三篇文章都是指責「三項指示爲綱」這個所謂「修正主義綱領」的。三項指示，就是毛澤東在七四年底、七五年初提出來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修防修；促進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三項指示爲綱」的提法，源出於一九七五年十月七日定稿而還未及發表的一篇文章「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簡稱「論總綱」）。據四人幫說，「論總綱」是「鄧小平授意炮製的」。至於「三項指示爲綱」這句話首次公開出現，則是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五日農業學大寨會議結束時，新華社記者的一篇述評文章中。

毛澤東的這三項指示，人民都很熟識，四人幫是不敢批的。當時的報刊言論主要集中在「爲綱」這兩個字上大做文章。所有批判文章的調子都是一致的，主要是說，「三項指示爲

綱」的要害在於：一，否定以階級鬥爭爲綱；二，三項指示並列，以目代綱，以目亂綱，搞折衷主義；三，目的是搞修正主義，搞復辟。

一九七六年三月，「反擊風」繼續猛刮，語調越來越兇暴，觀其來勢，大有要把鄧小平拉下馬，並要揪一層人、打倒大批老幹部的意思。

「紅旗」雜誌在一九七六年三月號發表署名池恒的文章：「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派」；三月三日「人民日報」發表新華社記者和「人民日報」記者的文章：「批判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三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翻案不得人心」。這三篇文章火力極猛，爲打倒鄧小平而挖空心思拼湊理論根據，並提出「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作爲鄧小平的代號，以這種影射手法來違抗中共中央關於不公開點名的指示。這些文章所提出的荒謬邏輯是這樣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過別人的命，到了社會主義時期總是同革命唱反調，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的走資派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之後，發誓「永不翻案」，可是重新工作沒多久就大刮右傾翻案風，對文化大革命又是翻案又是算帳，成了不肯改悔的走資派。

這三篇文章把幾個月來的政治運動作了一個總結：「從去年十一月三日起，清華大學革命師生員工揭露和批判了本校堅持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少數幾個人，揭露和批判了教育界、科

技界的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隨着鬥爭的不斷深入，他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教育界、科技界刮右傾翻案風的走資派，同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有着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聯繫。他們的奇談怪論如出一轍。總根子就在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那裏。」

怎樣有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聯繫呢？按照他們分析，「三項指示爲綱」就是修正主義綱領，「在政治上，他（指鄧小平）以這個修正主義綱領，否定毛主席歷來關於要以階級鬥爭爲綱的教導，妄圖改變黨的基本路線；在理論上，通過推行這個修正主義綱領，大肆販賣階級鬥爭熄滅論和唯生產力論；在組織上，以這個修正主義綱領爲號召，糾集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賬，翻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案，向無產階級猖狂進攻。」根據這些毫無事實可提供的武斷言詞，得出結論就是：這場右傾翻案風「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理論、有綱領的復辟活動」。照這樣說，當前的運動顯然是中共黨內第十一次路線鬥爭，鄧小平毫無疑問就是這次路線鬥爭的頭子，不容分辯應予「打倒」的了。這三篇文章爲下一個階段打倒鄧小平製造了輿論。

羣衆對這些橫蠻無理的文章和沒頭沒腦的「反擊風」極爲不滿，同時也對中國的前途感到擔心。「反擊」運動在全國根本發動不起來，大多數省市的領導人加以抵制，各地報紙也只有轉載「人民日報」的文章，本地並不發動批判。到了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清明節，人民

就藉悼念周恩來的機會，發洩對批鄧的不滿，對四人幫的仇恨，對周恩來的深切懷念。這些感情像火山般爆發。加以四人幫在幕後的挑動和鎮壓，於是所謂「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就發生了。鄧小平莫名其妙地被捲進去。四月七日鄧小平被罷免了一切黨內外職務，僅「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從此後，直至九月底，鄧小平的名字就作為中共報刊批評的對象，「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代號也就完成歷史任務了。

五、鄧小平和「三株毒草」

鄧小平莫名其妙地被轟下台後，四人幫深怕鄧東山復出，於是又發起一個大攻勢「深入開展批鄧」，提出要「批臭三株毒草」。當時的報刊文章說，「『三株毒草』『集中反映了鄧小平一九七五年一系列講話的主要內容和基本觀點，系統地表達了他的修正主義理論、綱領、路線和政策，是他搞翻案復辟的重要輿論準備和行動部署。』」

既然如此重要，那麼「三株毒草」究竟是什麼呢？為什麼會引起四人幫這樣大的仇恨？為什麼人民對「三株毒草」的批判如此反感？要解決這些問題，首先要把「三株毒草」的內容作簡單的介紹。

「三株毒草」是指鄧小平在一九七五年連續召開了六個生產會議前後，在九月、十月間

親自主持制訂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簡稱「論總綱」）、「科學院工作滙報提綱」（簡稱「滙報提綱」）和「關於加快發展工業的若干問題」（簡稱「二十條」）這三個文件。這三個文件還未來得及發表就受到四人幫的批判。但四人幫又沒有公佈這三個文件，只是在上海出版的「學習與批判」一九七六年第四期斷章取義地摘錄了這三個文件的一些片段作爲批判材料。後來，大陸內部發行了批判這三個文件的小册子，並附錄了這三個文件。筆者去年底在廣州親友家中看過這三本小册子。

「論總綱」全文分四大部份，共一萬五千字左右。第一部份是論述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重要意義。提出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識別形形式式的、裝扮得更巧妙的階級敵人；號召人們吸取教訓，敢於無情地揭露那些打着紅旗反紅旗的馬克思主義騙子。第二部份是論述如何落實安定團結的指示。號召人們按照毛澤東的教導，運用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分化瓦解敵人，在這同時必須進一步落實共產黨的政策，包括幹部政策、知識份子政策、科學技術人員政策、民族政策、經濟政策，以及有關解決工人階級內部矛盾的政策，只有這樣才能促進安定團結。第三部份討論如何落實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文章運用對立統一的法則，辯證地說明革命和生產，政治和經濟、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等

等的關係。號召各個部門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規章制度，使遵守規章制度成爲羣衆自覺的行動。各級領導不僅要關心羣衆的政治生活，也要關心羣衆的物質生活，要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改善羣衆的生活。第四部份是關於領導班子的建設問題。提出要落實毛澤東三項重要指示和各項具體政策，關鍵在於加强各級黨委的領導，建設好領導班子，號召領導班子的成員要敢於向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敵人作鬥爭，敢於向頑固地搞資產階級派性的頭頭作鬥爭，敢於向一切違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錯誤傾向作鬥爭。全黨要整頓作風，批判唯心主義的先驗論，堅持唯物主義的反映論。

「論總綱」把毛澤東的三項重要指示，上升到理論，並作了全面的、系統的闡述，是指導當時全國工作開展的一份重要文件。它爲什麼會受到四人幫批判呢？四人幫又批它什麼呢？主要是批文稿開頭的那一段：「毛主席提出了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指示、促進安定團結的指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毛主席的這三項重要指示，不僅是當前全黨、全軍和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而且也是實現今後二十五年宏偉目標的整個奮鬥過程中的工作總綱。」

「論總綱」的痛脚就在於這段話把三項指示作爲「總綱」的提法。本來「綱」和「目」是不能混爲一談的，全黨、全軍和全國各項工作應以階級鬥爭爲綱，其他方針、指示都是

目。如果在「論總綱」裏，把「三項指示為綱」改為「全面落實毛主席三項重要指示」，恐怕四人幫就要另找藉口了。然而，四人幫對「論總綱」之所以恨之入骨，完全不在「為綱」二字，主要在於「論總綱」裏面很多提法是針對四人幫的，正好擊中了四人幫的要害。

其一，在「論總綱」裏揭露了四人幫的本質，指出：「這些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敵人，繼承林彪的衣鉢，總是把我們的革命口號接過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塞進私貨，來混淆黑白，顛倒是非，把我們一些同志、一些羣衆的思想搞亂，把一些地方、一些單位搞亂，分裂黨，分裂工人階級，分裂羣衆隊伍。他們打着反修正主義的旗號搞修正主義，打着反復辟的旗號搞復辟，把黨的好幹部和先進模範人物打下台，篡奪一些地方和一些單位的領導權，在這些地方和單位實行資產階級專政。」這完全是針對四人幫一伙的所作所為而說的。

「論總綱」還說：「値得我們注意的是，在一些地方，一些單位中，那些頑固地搞資產階級派性的頭頭，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撇在一邊，把這個主要矛盾撇在一邊。他們對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的階級敵人沒有仇恨，對社會主義生產建設受到損失毫不痛心，對社會主義制度遭到破壞無動於衷。他們熱衷於拉山頭，打派仗，長期糾纏於所謂這一派和那一派的鬥爭，所謂造反派和保守派的鬥爭，所謂新幹部和老幹部的鬥爭，所謂『儒家』和『法家』的鬥爭。有的甚至為了達到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的目的，不惜同那些

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敵人同流合汚，串通一氣。在他們的腦子裏，馬克思主義不見了，毛澤東思想不見了，共產黨不見了，社會主義不見了，甚至愛國主義也不見了。」

這一段話顯然是指着王洪文的鼻子大駡的。王洪文打着造反派頭頭的旗號，到處拉山頭，搞派性，爲浙江省造反派中的壞頭頭翁森鶴翻案，親自把這個反革命份子放出來，爲他平反，讓他繼續在地方搞派性，挑動武鬥，破壞生產，打擊老幹部。文章裏對王洪文這些人提出了警告：「現在是到了向這些同志（我們現在還叫他們同志）大喝一聲的時候了，應該懸崖勒馬，立即回頭！他們應該懂得，在他們面前只有兩條可供選擇的道路：一條是改正錯誤，做一個好黨員；一條是墮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內。這後一條路是確實存在的，反革命份子可能正在那裏招手呢！」

其二，在「論總綱」裏，談到革命與生產的關係時，顯然也是針對四人幫的：

「我們一些同志至今還是用形而上學來對待政治和經濟、革命和生產的關係，總是把政治和經濟互相割裂開來，把革命和生產互相割裂開來，只講政治，不講經濟，只講革命，不講生產，一聽到要抓好生產，搞好經濟建設，就給人家戴上『唯生產力論』的帽子，說人家搞修正主義。這種觀點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一個地方、一個單位的生產搞得很壞，而硬說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騙人的鬼話。那種以爲抓好革命，生產自然會上去，用不着花氣力去

抓生產的看法，只有沉醉在點石成金一類童話中的人才會相信。」

這些話，同近月來批判四人幫破壞生產的文章，語調何其相似。

在落實幹部政策問題上，「論總綱」也是和四人幫針鋒相對的。其中一段說：

「劉少奇、林彪一類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騙子，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最惡毒的一手，就是混淆兩類矛盾，顚倒敵我，把敵人當作同志，把同志當作敵人。」「林彪推行的形左實右的修正主義路線，比劉少奇更爲狡詐。他也是從歪曲黨的基本路線、歪曲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主要矛盾入手，胡說什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革原來革過命的命』，把鬥爭的矛頭針對廣大革命幹部和革命羣衆，……對革 命同志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上段所引用的「革原來革過命的命」這話，據說原來是江青說的。在文革期間江青和林彪是一伙，推行同一路線。在這裏，「論總綱」所批判的眞正對象是推行林彪路線的四人幫。他們阻礙落實幹部政策，仍然堅持要一大批老幹部靠邊站，不讓他們出來工作。針對四人幫的所作所爲，鄧小平曾經鼓勵解放出來的幹部大膽工作，說：「不管它那一套，他說他的。」「無非有人講『還鄉團』回來了，復辟了。你是無產階級的還鄉團。」鄧小平的這些話，後來又給四人幫抓住痛脚，說他想叫舊中國的地主還鄉團回來，使人民「吃二遍苦，受

二茬罪」。——四人幫的斷章取義、蠻不講理一至於此。

其實，當時鄧小平也淸楚地知道四人幫在搞陰謀，想奪權的。他在「論總綱」中對此提出批判和警告：「不容許任何黨員、任何幹部拉山頭、搞宗派，在組織上自成系統、自成局面、把自己所管轄的地區和單位搞成獨立王國。全體黨員，特別是黨員幹部，都要光明正大，對黨忠誠老實，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有意見擺到桌面上來談。反對陽奉陰違，口是心非，當面說得好聽、背後又在搗鬼的兩面派行爲。」

當時不僅是四人幫，而且其他對四人幫作風稍有認識的人，都會明白上引這些話是針對什麼人而發的。如果四人幫不改變他們的立場，繼續搞宗派，搞分裂，推行形而上學，鄧小平就會在全黨全國範圍內展開對四人幫的大攻勢，「論總綱」就成了發動這個攻勢的重要文稿。鄧小平的掌權對四人幫是極大的不利，所以他們也要爭取主動，掌握時機，開展對鄧的攻勢。從「論總綱」看來，以鄧爲一方，以四人幫爲另一方的激烈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不是鄧小平打倒四人幫，就是四人幫打倒鄧小平，他們之間是沒有調和餘地的。

另一株被稱爲「毒草」的是：「關於加快發展工業的若干問題」（簡稱「二十條」）。

一九七五年，經過連續召開了幾個較大的工業會議後，八月十八日，鄧小平召集有關人員，專門談了發展工業的有關問題。其後與會者根據鄧小平談話的精神制訂了一份「關於加快發

展工業的若干問題」的討論稿，供有關人員討論，提出意見，以便修改。這份討論稿定稿日期是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原來討論稿是十八條，後經修改變爲二十條，所以簡稱「二十條」。筆者看到的是「十八條」的版本。全文一萬四千字左右，內容如下：

一、工作總綱
二、黨的領導
三、依靠工人階級
四、整頓企業管理
五、兩個積極性
六、統一計劃
七、以農業爲基礎
八、大打礦山之仗
九、挖潛、革新、改造
十、基本建設要打殲滅戰
十一、採用先進技術
十二、增加工礦產品出口

十三、各盡所能，按勞分配
十四、關心職工生活
十五、又紅又專
十六、紀律
十七、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
十八、思想方法

四人幫在一九七六年四月號「學習與批判」的文章中批判「二十條」是「在工業戰線上搞資本主義復辟的黑旗」。文章指出它的主要罪狀是：「它狂熱鼓吹唯生產力論和階級鬥爭熄滅論，大肆兜售被我們工人批得臭不可聞的物質刺激、利潤掛帥，條條專政、專家治廠、洋奴哲學，反對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反對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反對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對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反對『鞍鋼憲法』。」

這個文件，被扣上十多頂帽子，果眞如此嗎？

「二十條」的第一條「工作總綱」中說：

「必須把搞好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學習，放在首位，促進安定團結，促進生產。只注意生產，忘記了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我們的工作就會走到邪路上去，就說不上社會主

義建設。不注意生產，不努力搞好生產，把生產放在可有可無，可重可輕的地位，也是要不得的，沒有社會生產力的强大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是不能充分鞏固的。決不能把革命統帥下搞好生產，當作『唯生產力論』和『業務掛帥』來批判，……。」

這裏其實已很清楚地說明抓階級鬥爭和促生產的關係，並批判了四人幫當時以革命來代替生產的謬論，力圖扭轉四人幫破壞生產的局面。

文件在第四條「整頓企業管理」中說：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很多企業堅持『鞍鋼憲法』，放手發動羣衆，改善了企業管理，各項工作生氣勃勃。也有相當一部份企業，思想政治工作軟弱無力，管理混亂，勞動生產率低，產品質量差，消耗大，成本高，事故多，給國家人民造成嚴重損失。這些企業，必須在整頓和加强領導班子的同時，整頓企業管理，嚴格規章制度。」「一概反對企業管理，反對規章制度，勢必造成無政府狀態。」

文革以來，某些工礦企業由於受到四人幫的謬論衝擊，由於四人幫挑動派性造成混亂，是很有必要對這些工礦企業管理來一個整頓，和强調合理的規章制度的。領導班子如果「懶、軟、散」，領導不得力，那麼生產就垮台了。但當時四人幫却攻擊這些做法，說「整頓就是復辟」，堅持合理的規章制度就是「管、卡、壓」，「條條專政」。四人幫及其追隨者不懂

經濟，不懂管理，他們對企業管理的攻擊，實際上是對鄧小平和其他懂經濟的幹部的攻擊，目的是打倒鄧小平，以便他們自己上台。

「二十條」的第十一條「採用先進技術」中說：

「要堅持學習與獨創相結合的方針，必須虛心地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爲我所用，以加快國民經濟發展速度。我們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對洋奴哲學，爬行主義，但是不能夜郎自大，閉關自守，拒絕學習外國的好東西。」

「對於引進的外國的先進技術，要培訓必要的技術力量，迅速地把它掌握起來。要根據『一用二批三改四創』的原則，在用中熟悉它，改進它和發展它，要反對一概照抄照搬，也要反對沒有學會就亂改亂動。」

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上面這個提法完全是辯證的，說得很恰當。四人幫不分靑紅皂白地閉上眼睛攻擊爲「洋奴哲學」、「爬行主義」，除了別有用心之外便沒有更恰當的解釋了。

在「二十條」的第十三、十四兩條中說：

「要逐步提高低工資職工的工資！縮小高低工資之間的差距。」

「要實行正常的升級制度，按照職工的勞動態度，技術業務能力，勞動和工作中的貢

獻，根據國家計劃規定的升級面，經過羣衆評議和領導批准，每一兩年提高一部份職工的工資待遇。」

「要有步驟地解決職工夫妻長期二地分居的問題」。

以上所提的一系列問題，都是職工的切身利益問題，也是逐步縮小差距的問題，可是四人幫却誣之爲「物質刺激」、「福利主義」。

據說上海有一間工廠，當領導人受四人幫之命組織工人逐條批「二十條」的時候，有一個老工人遲到了，他不知道正在宣讀的「二十條」是供大家批判的，當他聽完二十條後，就喟然嘆曰：「這些話可說到我們工人心裏去了。」

這些既有助於發展生產，又有助於改善工人生活的合理主張，工人怎麼批得下去呢！

另一條被稱爲「毒草」的是「科學院工作滙報提綱」（簡稱「滙報提綱」）。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八日，文革前的共青團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出任科學院副院長職務後，着手起草「滙報提綱」。八月十一日定稿後，徵求鄧小平及有關人員的意見，再進行修改，直到九月二十六日，「滙報提綱」的討論第一稿才基本定下。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六個方面：

一、關於充份肯定科技戰線上的成績問題

二、關於科技工作的組織領導問題

三、關於力求弄通主席提出的科技戰線的具體路線問題
四、關於科技戰線知識份子政策問題
五、關於科技十年規劃輪廓的初步設想問題
六、關於院部和直屬單位的整頓問題

鄧小平在聽取這個滙報時作了插話。這個「滙報提綱」和鄧小平的插話，對四人幫的否定文化知識、否定鑽研專業的言行無疑是當頭一棒。

在談到科技發展前途問題時鄧小平說：「一點外語知識也沒有，數理化也沒有，還攀什麼高峯？中峯也不行！低峯還是問題。」

這些話也是同四人幫的言行針鋒相對的。

所謂三株「毒草」，它們都被指責有三條「共同罪狀」：第一條，就是把「三項指示」作爲各項工作的總綱，以目代綱，以目亂綱；第二條是取消階級鬥爭，這條罪狀是根據第一條罪狀不顧客觀實際，完全閉着眼睛推導出來的；第三條罪狀是「唯生產力論」，這又是由第二條罪狀推導出來的，不抓階級鬥爭就必然是搞唯生產力論。只因爲「爲綱」二字提法不恰當，就引伸出這麼大的罪名，完全不顧三個文件的主要精神，這種「打棍子」的做法也實在太橫暴了。

其實，這三個文件的實際內容，都從頭到尾十分强調階級鬥爭，强調與四人幫一類人鬥，與社會上打着「造反派」、「反潮流」破壞生產的壞份子鬥，對這些壞人壞事毫不讓步。「二十條」裏曾說過：

「對於造反，對於反潮流，都應當進行具體分析。要看造那個階級的反，看反什麼性質的潮流。正確的要支持，錯誤的要批評。反動的要堅決頂住，然後加以考查，進行批判。要特別警惕少數壞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義，搞破壞活動。領導幹部任何時候都要堅持原則，決不可隨風倒，決不能爲漂亮的詞句所迷惑，爲嚇人的帽子所壓倒，解除思想武裝，甚至把權讓給人家。」

這段話是針對當時階級鬥爭的動向說的。

四人幫說三株毒草中沒有提「以階級鬥爭爲綱」，這說法與事實不符。在「論總綱」第三部份明明就提出：「這三大革命運動是互相聯繫的，我們是以階級鬥爭爲綱，來開展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的。」

通過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到，四人幫把上述三個文件打成「毒草」，是完全不講理的。他們的批判文章充份暴露出他們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並要把人們置之死地而後快的惡劣作風。看了四人幫對「三株毒草」的批判文章，再看看附錄中的這三個文件的原文，難怪大陸

人民對四人幫「看在眼裏，恨在心頭」了。

六、鄧小平的敗因和復出機會

回顧一九七五年四屆人大後，鄧小平執掌大權，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基本上符合毛、周一貫以來的施政原則，也是符合中國大陸實際情況的。以他的能力和資歷，加上在一九七五年創造了一個大好形勢，甚得人心，爲什麼反而敗在蠻不講理又腐敗無能的四人幫手上呢？

看來原因是複雜的。目前，許多事態尚未得到澄清，很難準確地回答這個問題。這裏，筆者僅根據可知的材料，試探索鄧小平敗北的原因。

第一，鄧小平掌大權後，沒有搞陰謀，沒有搞宗派，而是一心一意要把國家治好。相反地，四人幫却結成小宗派，搞陰謀活動。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鄧小平先是在政治局內部，後是在「論總綱」中，擺明車馬向四人幫的錯誤言行提出批評。四人幫却明裏不接招，暗下施詭計，拉親信，搞派性，抓住一個小小的機會，即利用手上的權力（輿論工具、學校陣地）大打出手。他們在毛澤東面前和政治局上講的是一套，向梁效、任明寫作班子所傳達的又是另一套。終於讓這羣小人得逞於一時。

第二，四人幫「拉大旗作爲虎皮」，在他們所控制的輿論工具中，歪曲和篡改毛澤東的指示，斷章取義，利用毛澤東的威信來蒙蔽羣衆。每當羣衆對「反擊」運動發生懷疑和對抗時，四人幫就假借毛澤東的指示來推動，藉此達到打倒鄧小平的目的。

筆者在上期的拙文中提到，毛澤東有關批鄧的指示，由於是通過毛遠新傳達的，因此尚待澄淸。根據筆者在廣州聽到的一些小道消息，傳說好幾條批鄧的指示都有問題。例如「翻案不得人心」，據說當時毛遠新向毛澤東報告，說上海有人貼出大字報，指責鄧小平在周恩來追悼會上所致悼詞對周評價過高，要求翻案。毛澤東就說：反周民必反，周總理追悼會的悼詞不能翻案，翻案不得人心。然而，四人幫却把「翻案不得人心」這句話用在批鄧的文章上了。這傳說雖未必可靠，但毛澤東說出無具體所指的「翻案不得人心」這句話，是很奇怪的。因爲，正確的定案當然不能翻，但錯誤的定案却應該翻。衆所周知毛澤東贊成爲曹操翻案，爲秦始皇翻案，主張把被顚倒的歷史再顚倒過來。泛指「翻案不得人心」似不符合毛澤東一貫的想法。

第三，四人幫掌握了一定的權力，特別是完全控制了輿論工具，也就是說，他們壟斷了傳達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聲音的專利權。這樣的情形，在中共的歷史上還未出現過。大陸人民習慣相信中共報刊是反映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意見的，因此許多人儘管對當時的報刊文章懷

疑，但仍然以爲有自己所不知道的內在原因，因而勉强自己去理解、接受。四人幫即利用人民歷來對黨報的信任，擴大批鄧，蠱惑人心，達到他們的罪惡目的。

第四，在全國範圍內，形而上學猖獗。這是有歷史根源的。林彪依靠搞形而上學上台，四人幫則一脉相承，仍繼續搞形而上學。其流毒是使許多人對事物不作分析，看問題絕對化。形而上學最省力氣。辯證法要求人們從運動變化和互相聯繫制約中去認識事物，這就困難得多了。因此，毛澤東說，「我黨眞懂馬列的不多」。四人幫披馬列外衣搞形而上學的歪論，馬列水平低的人是不容易識破的。

第五，四人幫動輒扣帽子，打棍子，在他們的壓力下，人民沒有民主。儘管當時已有不少人看出了問題，但敢怒而不敢言。天安門事件，人民表達了自己的意見，但隨着而來的是「追查謠言」，是打擊報復，甚至鎮壓。誠然，人民的意願通過各種途徑表達着，終於促成華國鋒等採取果斷行動。但在短時期內，四人幫的淫威也起了震懾作用，使人民雖同情鄧小平也無法表達自己的意見。

第六，看來鄧小平是犯有一些錯誤的。他的「三項指示爲綱」的提法，混淆了綱與目，無主次，不明確，因此是不恰當的。作爲一個指導性的口號，這種意義上的含混是不允許的。因此就被四人幫抓住了辮子。除此之外，鄧小平在一九七五年批四人幫時不得力，做法

上不善於團結其他人一起進行，而且不夠沉着，太露鋒芒。關於這方面的錯誤，筆者在上一期的拙文中已談過了。

綜上所述，鄧小平儘管犯有錯誤，但錯誤不大，是完全可以經過指出及批評後改正的。他在「批鄧」運動中被打倒，主要原因並非由於他犯錯誤，而是他對四人幫的嚴正批評引來四人幫的「反擊」。四人幫打倒鄧小平的目的，則是爲了排除他們上台的障礙，爲了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

鄧小平儘管被打倒了，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四人幫得逞於一時，終於一敗塗地了。被四人幫的强詞奪理的「批鄧」運動轟下台的鄧小平，既然沒有大錯，也就應該復出了。問題是要鄧復出，還須澄清毛澤東的批鄧指示，天安門事件，以及中共中央所作的關於撤銷鄧小平職務的決議。

二月七日北京的「光明日報」在一篇批判四人幫的文章中，似乎作了有關鄧小平問題的暗示：「……許多幹部經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考驗，改正錯誤重新出來工作，他們（按：指四人幫）竟誣蔑爲『興滅國，繼絕世，擧逸民』，誣蔑爲『還鄉團』回來了，有了一點錯誤，就給戴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帽子，要把他們第二次打倒。」

這裏所說的「還鄉團」、「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第二次打倒」，都是四人幫批鄧時

專指鄧小平的。照這麼說，鄧小平「有一點錯誤」，但不應把他誣蔑爲「還鄉團」、「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不應把他「第二次打倒」。

二月六日的「人民日報」，在一篇「短評」中，說：「在我們黨的生活中，決議一經形成，必須堅決付諸實行。但是，會議上作出決議，有時可能還是不正確。我們不應滿足於通過決議，而應當在執行決議的過程中，繼續認眞進行調查研究，廣泛聽取黨內外羣衆的意見，檢查原來的決議是否正確。如果它不符合客觀實際，不符合大多數羣衆的利益和願望，就要按照黨的組織原則，重新討論，加以糾正。這樣做，不是違反了民主集中制，而正是堅持了民主集中制；不是降低了黨委的威信，而正是提高了黨委的威信。」

如果這段話適用於中共中央關於撤銷鄧小平職務的決議，那麼它說明了：一：決議一經形成，就要付諸實行；二，如果在實行中發現決議錯了，就必須糾正；三，糾正的過程須經黨組織的重新討論。

這篇「人民日報」的「短評」，顯示了中共關於鄧小平的決議，是可以糾正的。

鄧小平是一九七三年四月第一次復出的，一九七六年四月他被「第二次打倒」，會不會又恰巧在今年四月，他第二次復出呢？如有這種偶合，那就更增加鄧小平一生的戲劇性了。

附錄：被四人幫攻擊的三個文件

（齊辛按：四人幫於一九七六年發動的「批鄧」運動中，作爲主要批判材料的，是被稱爲「三株毒草」的三個文件。四人幫指稱，這三個文件是由鄧小平「授意炮製」的。而事實上，一九七五年參與制訂這三個文件的，除了鄧小平之外，主要還有華國鋒、李先念等副總理和國務院其他人員。因此，四人幫發起「批判三株毒草」，是有意識地以「批鄧」爲名，而把矛頭指向華國鋒等領導人。至於三個文件的內容，過去一直未有公開過，只是在一九七六年七八月間，在中國大陸內部發行的「批判三株毒草」的單行本中，曾將這三個文件作爲「附錄」，以供「羣衆批判」。然而，許多羣衆讀後，都感到這「三株毒草」並非「毒草」，他們背地裏甚至稱之爲「三朵香花」。把正確的東西拿來「批判」，並把矛頭指向大批推行正確路線、政策的高級領導人，可以說是四人幫失盡人心而終於被一舉粉碎的原因。這裏，將這三個文件刊印在本書中作爲附錄，以供海外讀者們鑑別、認識。）

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

黨的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遵照毛主席的建議，提出了我國今後二十五年國民經濟發展的宏偉任務。第一步，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與此同時，毛主席提出了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指示、促進安定團結的指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毛主席的這三項重要指示，不僅是當前全黨、全軍和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而且也是實現今後二十五年宏偉目標的整個奮鬥過程中的工作總綱。執行毛主席的這三項重要指示，就是執行黨的基本路線，執行黨的團結勝利路線，執行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

現在國際上革命的因素和戰爭的因素都在增長，不是革命制止戰爭，就是戰爭引起革命。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經成爲不可抗拒的時代洪流。兩個超級大國互相爭奪，世界大戰總有一天要打起來。蘇修的戰略重點在歐洲，但始終想要向我們動手。我們要提高警惕，保衞祖國，隨時準備殲滅入侵之敵。我們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爲我國

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毛主席多年以來爲我們制定了一條完整的路線和一整套方針、政策和方法，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可以有把握地說，廣大幹部已經掌握了毛主席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方法，許多工礦企業和基層單位的領導權已經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和工農羣衆手裏。人民羣衆的社會主義覺悟日益提高，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大大增長，社會主義事業蓬勃發展。總之，形勢大好，形勢逼人。我們必須下定決心，全面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三項重要指示，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實現今後二十五年的宏偉目標，增强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

（一）

毛主席在關於學習理論的指示中指出：「列寧爲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淸楚。這個問題不搞淸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修防修，在三項重要指示中佔首要地位。理論是行動的指南。學習理論，首先要認眞看書學習，仔細閱讀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語錄和原著，領會它們的精神實質，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解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實際問題。毛主席教導我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我們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成績，是好是壞，是大是小，檢驗的唯一標誌，就看我們是否應用這種理論，就看我們在應用中，是否有利於把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落實到基層，是否有利於促進安定團結的政治

局面，是否有利於促進國民經濟更快地發展。

毛主席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總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經驗，爲我們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制定了一條基本路線。毛主席在這次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中，又進一步闡述了這條基本路線的理論基礎。

在這次學習理論的運動中，很多同志聯繫實際，聯繫自己的切身經驗，進一步認識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矛盾，始終是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的主要矛盾。只有緊緊地抓着這個主要矛盾，堅持進行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才能眞正實現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但是，在一些地方、一些單位中，也還有不少同志由於對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階級鬥爭的複雜性認識不足，對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鬥爭的特點認識不足，常常被一些錯誤的口號所迷惑，忘記了黨的基本路線。

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鬥爭的複雜性，主要表現在黨內的資產階級代理人，披着馬克思主義的外衣，進行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活動。正如列寧所說的：「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它的敵人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

劉少奇在我國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作爲黨內資產階級代理人，向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他是把自己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的。林彪打着反對劉少奇的階級鬥

爭熄滅論的幌子，叫嚷「要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作爲黨內資產階級代理人，向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也是把自己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的，而且表現得更爲突出。拿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打着紅旗造反，不易被人看穿」。人民羣衆對他的揭露是：「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

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露和粉碎了劉少奇、林彪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剝開了他們的反革命兩面派的面目。革命的人民和革命的幹部在這個鬥爭中增强了識別眞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認識了什麼是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騙子。另一方面，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敵人也從他們的失敗中間吸取教訓，設法把自己僞裝得更巧妙，「他們老是在研究對付我們的策略，『窺測方向』，以求一逞。」

這些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敵人，繼承林彪的衣鉢，總是把我們的革命口號接過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塞進私貨，來混淆黑白，顚倒是非，把我們一些同志、一些羣衆的思想搞亂，把一些地方、一些單位的黨組織搞亂，分裂黨，分裂工人階級，分裂羣衆隊伍。他們打着反修正主義的旗號搞修正主義，打着反復辟的旗號搞復辟，把黨的好幹部和先進模範人物打下台，篡奪一些地方和一些單位的領導權，在這些地方和單位實行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的階級基礎，有的本來就是地、富、反、壞、老資產階級份子，有的是從小生產者中、工人一部份中、幹部一部份中、黨員一部份中蛻變出來的新資產階級份子。他們內外勾結，貪汚盜竊，投機倒把，違法亂紀，搞資本主義，向

社會主義猖狂進攻，使社會主義的生產建設受到破壞，甚至使那裏的社會主義所有制變質。這些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敵人同人民大衆的矛盾是敵我矛盾，同工人階級、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知識份子之間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這種鬥爭就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集中表現。如果不把這些階級敵人鬥垮，不把他們篡奪了的領導權奪回來，無產階級專政落實到每個基層的任務，就不能完成。在那裏，無產階級要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就只是一句空話。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一些地方、一些單位中，那些頑固地搞資產階級派性的頭頭，把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撇在一邊，把這個主要矛盾撇在一邊。他們對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的階級敵人沒有仇恨，對社會主義生產建設受到損失毫不痛心，對社會主義制度遭到破壞無動於衷。他們熱衷於拉山頭，打派仗，長期糾纏於所謂這一派和那一派的鬥爭，所謂造反派和保守派的鬥爭，所謂新幹部和老幹部的鬥爭，所謂「儒家」和「法家」的鬥爭。有的甚至爲了達到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的目的，不惜同那些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敵人同流合污，串通一氣。在他們的腦子裏，馬克思主義不見了，毛澤東思想不見了，共產黨不見了，社會主義不見了，甚至愛國主義也不見了。現在是到了向這些同志（我們現在還叫他們同志）大喝一聲的時候了，應該懸崖勒馬，立即回頭！他們應該懂得，在他們面前只有「兩條可供選擇的道路：一條是改正錯誤，做一個好的黨員，一條是墮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內。這後一條路是確實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裏招手呢！」

一些地方、一些單位的上述問題，在省市、地縣的領導下，遵照黨中央的方針、政策、指示，有的已經得到解決，有的正在解決。由此我們應當得到一個深刻的教訓，這就是在階級社會裏，對一切社會現象都要進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例如，對「造反」，就要看他是造哪一個階級的反，是代表哪一個階級在造反。又例如，對「反潮流」，就要看他是反什麼性質的潮流，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潮流，還是反修正主義的潮流，是反正確的潮流，還是反錯誤的潮流。再例如，對「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它們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無產階級可以利用這些武器來反對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也可以利用它們來反對無產階級。總之，要像毛主席所教導的那樣：「對於任何東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鑒別其好壞，然後才決定歡迎它，或者抵制它。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爲什麼，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眞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

我們的同志還應當得到另一個深刻的教訓，這就是要識破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騙子，絕不能只看他們的宣言，而要看他們的實際行動。正如列寧所說的：「判斷一個人，不是根據他自己的表白或對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據他的行動。判斷哲學家，不應當根據他們本人所掛的招牌……，而應當根據他們實際上怎樣解決基本的理論問題、他們同什麼人攜手並進、他們過去和現在用什麼教導自己的學生和追隨者。」偉大領袖毛主席就是根據林彪的實際行動，看穿了他在「高舉」、「頂峰」、「天才」、「絕對權威」等極「左」詞句掩蓋下的反馬克思主義、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極右實質。在

批林整風和批林批孔運動中，毛主席又把林彪這個反面教員的反面教材公之於衆，讓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進行批判，使大家看清了林彪是同國內的新老資產階級分子、地富反壞和國外的帝修反携手並進的，是用「五七一工程紀要」這類反動透頂的東西教導他的死黨和追隨者的。這樣，就進一步暴露了這個野心家、陰謀家、叛徒、賣國賊的醜惡面目。

魯迅說過：「戰鬥正未有窮期，老譜將不斷的襲用。」林彪垮台了，現在有些地方、有些單位中，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又在襲用林彪的老譜。但是，正如毛主席早就指出的：「以僞裝出現的反革命份子，他們給人以假象，而將眞象隱蔽着。但是他們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將其眞象隱蔽得十分徹底。」只要我們牢記同林彪反革命陰謀集團鬥爭的經驗教訓，牢記列寧和毛主席的教導，就不難識破林彪一類的鬼蜮伎倆。他們的垮台，同林彪一樣是不可避免的。

（二）

毛主席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爲好。全黨全軍要團結。」我們學理論，抓路線，就是要促進安定團結。「團結起來，爲了一個目標，就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要落實到每個工廠、農村、機關、學校。」

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個作用，是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賣國賊，壓迫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新老資產階級份子，壓迫那些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壓迫那些盜竊犯、詐騙犯、殺人

放火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壞份子，就是爲了解決國內敵我之間的矛盾。第二個作用，是防禦國家外部敵人的顚覆活動和可能的侵略，就是爲了對外解決敵我之間的矛盾。這個專政的制度不適用於人民內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專政，不能由一部份人民去壓迫另一部份人民。

人民內部也有各種各樣的矛盾，這些矛盾只有通過毛主席所說的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去解決。這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鬥爭，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毛主席說：「在這裏，首先需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因爲如果在主觀上沒有團結的願望，一鬥勢必把事情鬥亂，不可收拾，那還不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那還有什麼黨的團結？」

黨的基本路線明確規定：「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我們必須遵照黨的基本路線規定的這個總政策，去劃分敵我界線和是非界線，「對敵人要狠，要壓倒它，要消滅它」;「對自己人，對人民、對同志、對官長、對部下要和，要團結」。只有這樣，才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分化瓦解敵人，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

劉少奇、林彪一類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騙子，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最惡毒的一手，就是混淆兩類矛盾，顚倒敵我，把敵人當同志，把同志當敵人。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歪曲黨的基本路線，把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主要矛盾說成是什麼「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什麼「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以掩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個

主要矛盾。他推行形左實右的修正主義路線，打擊大批幹部而保護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林彪推行形左實右的修正主義路線，比劉少奇做得更爲狡詐。他也是從歪曲黨的基本路線、歪曲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主要矛盾入手，胡說什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革原來革過命的命」，把鬥爭的矛頭針對廣大革命幹部和革命羣衆，利用羣衆一個時期內在某些問題上觀點不一致，挑動羣衆鬥羣衆，支持和縱容武鬥，把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都當作敵我矛盾，並且採取對敵鬥爭的方法，甚至對敵鬥爭也不容許的方法，對革命同志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他招降納叛，結黨營私，組成一個反革命陰謀集團，妄圖實現反革命政變，顚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

我們必須繼續批判劉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徹底肅淸他們的流毒，特別是在那些被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敵人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和單位，更要廣泛地、充分地發動羣衆，徹底揭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新老資產階級份子、貪污盗竊份子、投機倒把份子、腐化墮落份子、違法亂紀份子、刑事犯罪份子，徹底揭露他們襲用林彪反革命兩面派手法，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活動。把那些經過揭露、批判、鬥爭、教育仍然頑固堅持反動立場、死不悔改的份子，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壓倒他們，打垮他們，「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這就是我們對敵鬥爭的政策，我們必須堅決落實這個政策。只有這樣，這些地方和單位才能出現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我們必須像愛護自己的眼珠一樣，愛護全黨的團結，愛護全軍的團結，愛護全國人民的團結。

毛主席說：「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

這裏最重要的是加强黨的團結。毛主席在抗日戰爭時期就講過：「只有經過共產黨的團結，才能達到全階級和全民族的團結，只有經過全階級全民族的團結，才能戰勝敵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務。」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取得勝利以後，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又一次强調加强黨的團結，提醒全黨同志警惕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分裂黨的危險。在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和第十次代表大會，都一再號召全黨同志「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全黨黨員，無論老黨員、新黨員，全體幹部，無論老幹部、新幹部，都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導，加强無產階級的黨性，把團結看作黨的生命，有利於團結的話就說，不利於團結的話就不說；有利於團結的事就做，不利於團結的事就不做。一切犯了或輕或重的資產階級派性錯誤的同志，都要痛下決心，認眞檢查，切實改正。全體黨員，特別是黨員幹部，要堅決遵循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基本原則。要加强組織紀律性和政治紀律性，服從中央領導，服從上級領導，服從黨組織的決議，遵守黨的民主集中制。不容許任何黨員、任何幹部拉山頭，搞宗派，在組織上自成系統，自成局面，把自己所管轄的地區和單位搞成獨立王國。全體黨員，特別是黨員幹部，都要光明正大，對黨忠誠老實，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有意見擺到桌面上來談。反對陽奉陰違，口是心非，當面說得好聽、背後又在搗鬼的兩面派行爲。全體黨員都要以大局

爲重，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個人利益服從黨的利益，忠誠履行自己入黨時的誓言，爲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到底，努力改造資產階級世界觀，抵制資產階級思想侵蝕，堅決反對資產階級的極端個人主義。

毛主席教導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丢掉。」同這條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完全對立，林彪實行反革命政變的綱領是：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危險性就在於這個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把他的反動綱領披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說成是理論，使那些「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之徒獲得精神武器，而我們的很多好同志却受到矇蔽，對於他們篡黨篡權的醜惡行徑喪失警惕。我們必須把這個反動綱領批深、批透、批臭，徹底消滅它的市場。

工人階級是我國的領導階級。全體黨員、全體幹部都必須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加强整個工人階級的團結。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指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爲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又指出：「兩派要互相少講別人的缺點、錯誤，別人的缺點、錯誤，讓人家自己講，各自多做自我批評，求大同，存小異。這樣才有利於革命的大聯合。」絕大多數工礦企業和事業單位，早已遵照毛主席這些指示，實現了革命的大聯合，實現了工人階級的大團結。現在，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九年了，有的地方、有的單位，却有人還在分裂工人階級，鬧資產階級派性。他們不是依靠整個工人階級，而是依靠他們自己壘起來的這個山頭，那個山頭。他們還在工人階級內部搞什麼「以我劃線」，把那些同意他們觀點的人說成是「站對了隊」，封爲「最革命的」，把那些不同意他們觀點的人說成是「站錯了隊」，戴上「不革命」的帽子；甚至把老工人和模範人物都說成是「保守派」、「復辟勢力」。他們公然反對「各自多做自我批評」，大搞形而上學，對自己全盤肯定，不做自我批評，對別人全盤否定，一意壓倒，誰要是不贊成，就說誰是「和稀泥」，是「中庸之道」。他們這種破壞工人階級團結的做法，其目的是爲了爭權奪利，一派霸權。這一切都是完全錯誤的。

毛主席教導我們：「任何有羣衆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較積極的、中間狀態的和比較落後的三部份人。」在工人階級內部，也同樣存在着這種區別。我們在工作中要以先進分子爲骨幹，帶動中間的，幫助和教育落後的，團結起來，共同前進。工人階級內部三部份人的區別，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一定的條件下是可以互相轉化的。我們「必須不斷地提拔在鬥爭中產生的積極份子，來替換原有骨幹中相形見絀的份子，或腐化了的份子。」這樣做的目的，是適應革命鬥爭和生產鬥爭發展的需要，不斷提高整個工人階級的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同那些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敵人破壞工人階級團結的做法，是根本對立的。

爲了實現黨的團結、工人階級的團結、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必須進一步落實黨的各項政策，

包括幹部政策，知識份子政策、科學技術人員政策、民族政策、經濟政策，以及有關解決工人階級內部矛盾的政策。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促進安定團結，在全國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

(三)

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是爲了保衞全體人民進行和平勞動，將我國建設成爲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把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落實到基層；正確區别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促進全國的安定團結，是屬於調整社會主義上層建築的任務。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是屬於加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任務。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就是革命和生產的關係，就是政治和經濟的關係，就是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關係。

馬克思主義認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實踐和理論、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諸種矛盾，在總的歷史發展中，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爲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但是，在一定條件之下，生產關係、理論、上層建築這些方面，又轉過來表現其爲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不是違反唯物論，正是避免了機械唯物論。堅持了辯證唯物論。

我們的國家現在還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還處在國內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歷史階段。在這樣的條件下，毛主席教導我們要把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修防修，放在首要地位；一再提醒全黨注意，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在社會經濟制度發生根本變革的時期，尤其是這樣。」如果我們忽視了理論學習，忽視了政治的統帥作用，我們的一切工作就一定要走到邪路上去。正像列寧所說的那樣：「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佔首位。不肯定這一點，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又說：「全部問題在於（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也只能在於）：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地處理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因而也就不能解決它的生產任務。」

遵循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我們批判了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所宣揚的唯生產力論。他們這種謬論的核心是說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而是什麼先進的生產關係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並且由此得出結論，認爲發展社會生產力的任務，已經代替了革命的任務，成爲首要任務。他們的險惡用心是用階級鬥爭熄滅論來矇住大家的眼睛，便於他們復辟資本主義。批判這種唯生產力論是完全正確的，完全必要的。現在要批判，今後也還要繼續批判。

林彪一類政治騙子表面上同劉少奇相反，走到另外一個極端，實際上同劉少奇殊途同歸。他把政治和經濟完全割裂開來，把政治的統帥作用歪曲成爲政治可以衝擊一切。他在「念念不忘階級鬥

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的詞句掩蓋下，用資產階級政治，衝擊無產階級政治，衝擊無產階級專政，衝擊社會主義經濟，衝擊國家計劃，衝擊企業管理，衝擊生產秩序，使社會主義的生產建設在一些地方和單位受到了嚴重的損失。在批判劉少奇的唯生產力論的同時，必須狠狠地批判林彪的政治可以衝擊一切，徹底肅清這種反動謬論的流毒。

我們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導，辯證地理解政治和經濟的對立統一關係，既要認識政治的統帥作用，又要認識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的保證，是爲經濟基礎服務的。可是我們一些同志至今還是用形而上學來對待政治和經濟、革命和生產的關係，總是把政治和經濟互相割裂開來，把革命和生產互相割裂開來，只講政治，不講經濟，只講革命，不講生產，一聽到要抓好生產，搞好經濟建設，就給人家戴上「唯生產力論」的帽子，說人家搞修正主義。這種觀點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事實上，這種觀點並不是什麼新東西，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佔統治地位的時期，早就有人宣揚過。毛主席在「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一文中嚴肅地批判了這種錯誤觀點。他說：「過去有些同志認爲革命戰爭已經忙不了，哪裏還有閑工夫去做經濟建設工作，因此見到誰談經濟建設，就要駡爲『右傾』。」「這種認爲革命戰爭的環境不應該進行經濟建設的意見，是極端錯誤的。有這種意見的人，也常說一切應服從戰爭，他們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經濟建設，這就不是服從戰爭，而是削弱戰爭。只有開展經濟戰線方面的工作，發展紅色區域的經濟，才能使革命戰爭得到相當的物質基礎，才能順利地開展我們軍事上的進攻，給敵人的『圍剿』以有力的打擊」。

在艱苦的革命戰爭年代，毛主席都這樣重視經濟建設工作，這樣重視增强革命戰爭的物質基礎。現在我們的國家已經成爲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有了進行和平建設的國內條件，而我們又面臨着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顚覆和侵略的威脅，難道我們還不應該爭取時間，加倍努力，盡快地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增强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嗎。

在抗日戰爭末期，毛主席在總結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的經驗時指出：「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兩年先後開始的帶普遍性的整風運動和生產運動，曾經分別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質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決定性的作用。這兩個環子，如果不在適當的時機抓住它們，我們就無法抓住整個的革命鏈條，而我們的鬥爭也就不能繼續前進。」當整風運動和生產運動正在展開的時候，毛主席就批判了那種把整風和生產兩個環子分割開來，忽視生產，輕視經濟工作的錯誤傾向。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書中，毛主席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錯誤傾向的思想根源是：「或則中了董仲舒們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些唯心的騙人的腐話之毒，還沒有去掉得乾淨；或則以爲政治黨務軍事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經濟工作雖然也重要，但不會重要到那種程度，覺得自己不必分心或不必多分心去管它。」指出整風和生產「兩項工作中，教育（或學習）是不能孤立地去進行的，我們不是處在『學也祿在其中』的時代，我們不能餓着肚子去『正誼明道』，我們必須弄飯吃，我們必須注意經濟工作。離開經濟工作而談教育或學習，不過是多餘的空話。離開經濟工作而談『革命』，不過是革財政廳的命，革自己的命，敵人是絲毫也不會被你傷着的。」毛主席這些

話說得多麼好啊！說得多麼準確、鮮明、生動啊！我們那些至今還輕視生產建設的同志，難道不應當對照毛主席的指示好好檢查一下自己的言行嗎？如果看了這些話還無動於衷，不是正好證明他們中孔孟之道的「唯心的騙人的腐話之毒」很深嗎！難道不應當把這種腐話之毒去掉得乾乾淨淨嗎？

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革命就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我們中國共產黨人，要對革命負責，也要對生產負責。要從自己的頭腦中清除那些「抓革命保險，抓生產危險」、「革命非常重要，生產無關緊要」、「抓革命吃得開，抓生產活倒霉」的糊塗觀念。要依靠工人階級、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知識份子和其他革命份子，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堅決執行「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方針，把自己所在地區、所在單位的革命眞正抓好，生產眞正抓好。不信邪，不怕鬼，樹雄心，立壯志，挺起腰板幹。大慶人說得好：「同天鬥，同地鬥，同階級敵人鬥，同錯誤思想鬥。」大寨人也說得好：「既要大講革命，又要大幹革命，只講不幹不是眞革命。既要大講社會主義，又要大幹社會主義，只講不幹也不是眞搞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從二十多年鬥爭實踐中學懂了的一條眞理。」我們要把大慶、大寨抓革命、促生產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幹勁，眞正學到手。「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麼一股勁，那麼一股革命熱情，那麼一種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眞正做到革命、生產兩不誤，使本地區、本單位的革命形勢越來越好，生產建設蒸蒸日上。

列寧說過：「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經濟狀況的改善來衡量。」毛主席也說過：「中國一切

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區別眞馬克思主義和假馬克思主義，區別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區別眞幹革命和假幹革命，區別眞幹社會主義和假幹社會主義，區別幹部所做工作的成績是壞是好，是大是小，歸根結底，只能也只應按照列寧和毛主席所提出的這個標準來衡量。

一個地方，一個單位的生產搞得很壞，而硬說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騙人的鬼話。那種認爲抓好革命，生產自然會上去，用不着花氣力去抓生產的看法，只有沉醉在點石成金一類童話中的人才會相信。

毛主席說：「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强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証，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羣衆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証」。這三大革命運動是互相聯繫的，我們是以階級鬥爭爲綱，來開展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的。但是，這三大運動又各有自己的特點和規律，各有自己的特殊矛盾需要我們去解決。即使我們眞正掌握了階級鬥爭的特點和規律，解決了階級鬥爭中的特殊矛盾，也不等於掌握了生產鬥爭、科學實驗的特點和規律，不等於解決了這兩大革命運動中的特殊矛盾，也還需要我們進行艱苦的努力，進行一系列的工作，來研究和解決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的特殊矛盾。

因此，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我們的幹部既要學會搞階級鬥爭，也要學會搞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做到又懂政治，又懂業務。毛主席說：「政治和業務的關係，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一定要反對不問政治的傾向。但是不懂技術，不懂業務，也不行。我們的同志，無論搞工業的，搞農業的，搞商業的，搞文教的，都要學一點技術和業務，成爲內行，使自己又紅又專。」所有的幹部，都要認眞執行毛主席的指示，以身作則，帶領廣大羣衆和科學技術人員走又紅又專的道路。

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就必須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指引下，用心研究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按照農、輕、重的次序，把農業放在第一位，安排好各個經濟部門的比例關係，進行綜合平衡，做出統一的國家計劃，付之執行，在執行過程中，年年月月都會出現新的矛盾、新的不平衡，都需要我們不斷地進行調整，解決這些新的矛盾，求得新的平衡。矛盾不斷出現，又不斷解決，這是我們做經濟工作必須遵循的辯證規律。

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各行業、各部門、各單位都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嚴格的規章制度。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所需要的規章制度，是勞動人民和科學技術人員多年的實踐經驗凝結成的，其中有許多是付出血的代價才取得的。決不能把它看成可有可無的東西，更不能不加分析地把一切規章制度看成是「管、卡、壓」。遵守生產鬥爭日益發展所需要的規章制度，才能使人們在生產鬥爭中取得越來越多的自由，違反這種規章制度，必然會在生產鬥爭中碰得頭破血流。

責任制，是企業規章制度的核心。要把建立責任制，作爲整頓企業管理的重要一環。每件工

作，每個崗位，都要有人負責；每個幹部、工人、技術人員，都要有明確的職責。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幹部和羣衆的責任心，使遵守規章制度成爲羣衆的自覺行動。

恩格斯在「論權威」一文中指出：「如果說人靠科學和創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對人進行報復，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從一種眞正的專制，而不管社會組織怎樣。想消滅大工業中的權威，就等於想消滅工業本身，即消滅蒸汽紡紗機而恢復手紡車。」他的意思就是說，生產愈發展，科學技術愈發展，反映這種發展所需要的規章制度就會愈來愈嚴密，愈來愈要求人們嚴格地遵守這種規章制度；不符合這種發展需要的規章制度，則要求人們及時地加以改革。否則，就會妨碍生產的發展，妨碍科學技術的發展。不但資本主義社會是這樣，社會主義社會是這樣，將來共產主義社會也還是這樣。建立新的規章制度也好，改革舊的規章制度也好，都必須依靠羣衆，集中集體智慧，按照生產鬥爭發展的客觀規律來做出決定。如果主觀隨意地亂來一氣，就會在生產管理中造成無人負責的狀况，造成無組織、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必然會受到客觀規律的懲罰。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無政府狀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願望。」

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各級領導要做到生產、生活同時抓。不僅要關心羣衆的政治生活，也要關心羣衆的物質生活，要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改善羣衆的生活。要把羣衆生活上的問題，提到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來，凡是能夠解決的，都要發動羣衆，自己動手，積極去解決。毛主席早就教導我們：「要得到羣衆的擁護麼？要羣衆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戰線上去麼？那末，就得和羣衆在一

起，就得去發動羣衆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羣衆的痛癢，就得眞心實意地爲羣衆謀利益，解決羣衆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羣衆的一切問題。我們是這樣做了麼，廣大羣衆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工業愈發展，工業比重愈增加，就愈要重視農業的發展，這些話毛主席不知說過多少次了。可是，至今一些城市，一些工礦區的副食品供應仍不充足。這些地方的領導既不向大慶那樣的先進單位學習，也不親自動手，取得經驗，發動羣衆，抓好農業。對這個關係羣衆生活的大事，長期不設法解決，一拖再拖，這同毛主席「關心羣衆的痛癢」，「眞心實意地爲羣衆謀利益」的指示，究竟相距多遠，請認眞想一想吧！

（四）

毛主席的三項重要指示，是互相聯繫的不能割裂的統一整體，不能丢掉任何一項，也不能孤立地只抓其中任何一項。我們必須以這三項重要指示爲綱，總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的豐富經驗，制定各項工作的具體政策，用這個工作總綱和各項政策來指導各方面的工作，整頓各方面的工作。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交通運輸要整頓，財政貿易要整頓，科學技術要整頓，文化教育衞生要整頓，文學藝術要整頓，軍隊要整頓，黨也要整頓。這次整頓的目的，是爲了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是爲了迎接明年開始的第五個五年計劃。

毛主席說：「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在各方面的整頓中，黨的整頓、黨的工作的整頓是重點。「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各個地方、各個單位的一切工作，一切政治運動，都要由黨委遵照毛主席的三項重要指示和各項具體政策，進行統一領導。革委會、工會、青年團和民兵，都要在同級黨委一元化領導下進行工作。決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凌駕於黨之上。決不允許任何黨員、任何黨的幹部違反「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組織原則、組織紀律。

要落實毛主席的三項重要指示和各項具體政策，關鍵在於加强各級黨委的領導，加强各級黨委的領導班子。這些領導班子，必須按照毛主席關於培養革命接班人的五個條件和老中青相結合的原則，由能夠堅持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黨性强、作風好、能團結人的同志組成。這些領導班子，要敢字當頭，敢於領導，敢於鬥爭，敢於向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敵人作鬥爭，敢於向頑固地搞資產階級派性的頭頭作鬥爭，敢於向一切違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錯誤傾向作鬥爭。要善於識別眞假馬克思主義。要堅持不懈地批判修正主義，批判資本主義傾向，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我們的同志爲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鬥爭，爲眞理而鬥爭，爲人民的利益而鬥爭，一定會得到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支持，一定會得到廣大羣衆的擁護，不應該怕被打倒，也不可能被打倒。我們應該有這樣堅强的信念。工礦企業、農村黨的基層組織的成員

和黨小組組長，在政治上應當是最先進的份子，在勞動中又應當是最積極的份子。對於某些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軟、懶、散」的領導班子，應當在上級黨委的領導下進行適當的調整。長期鬧資產階級派性、屢教不改的，要堅決調離，甚至給予黨紀處分；混進來的個別壞人，要堅決淸除。

要落實毛主席的三項重要指示和各項政策，還必須在全黨範圍內整頓黨的作風。

要批判唯心主義的先驗論，堅持唯物主義的反映論。各級黨委要經常地進行調查研究，如實地了解情況，具體地加以分析。要實事求是，反對報喜不報憂，提倡說眞話，不要說假話。深入一點，取得經驗，推動全盤，眞正做到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我們應當懂得，世界上沒有天生的聖人。任何領導幹部，如果浮在上面，脫離實際，就決不可能取得幹社會主義的知識和才能。經驗對於幹部是必須的，經驗是要經過多年的實踐才能積累起來的，只要不把自己的局部經驗當成普遍眞理，能夠經常注意總結提高，這種經驗是很寶貴的。我們要牢記毛主席的教導：「任何一個英雄豪傑，他的思想、意見、計劃、辦法，只能是客觀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來自人民羣衆的實踐中，或者自己的科學實驗中，他的頭腦只能作爲一個加工廠而起製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則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人的頭腦製成的這種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確不正確，還得要由人民羣衆去考驗。如果我們的同志不懂得這一點，那就一定會到處碰釘子。」

要批判脫離羣衆、脫離勞動、當官作老爺、搞特殊化的壞作風，發揚艱苦奮鬥的作風、同羣衆共甘苦的作風，堅持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制度。毛主席說：「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問題，

對於社會主義制度來說，是帶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幹部不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勢必脫離廣大勞動羣衆，勢必出修正主義。」我們的同志應該時刻警惕這種危險，按照黨和國家的規定，自覺地參加集體勞動，同人民羣衆保持最廣泛、最密切、最經常的聯繫。

要批判自高自大、自以爲是、驕橫跋扈、動輒訓人的壞毛病，堅持謙虛謹愼、戒驕戒躁的優良作風。人貴有自知之明。要嚴於解剖自己，任何時候對自己的工作都要一分爲二，勇於堅持眞理，勇於修正錯誤。不要只喜歡聽奉承話，不喜歡聽批評話。不要一聽到批評就發火，更不應該對批評者打擊報復。我們的同志都要懂得，只要做工作，就不能不犯錯誤；犯了錯誤，自己進行認眞的而不是敷衍的自我批評，誠懇地而不是虛僞地接受人家的批評，這決不是壞事，而是好事，決不會損害同志們和人民羣衆對自己的信任，而只會增强這種信任，無論對自己對革命事業都是有益無害的。「有錯誤不要緊，我們黨有這麼個規矩，錯了就檢討，允許改正錯誤」。一切有黨性的同志，都應該按照這個規矩辦事。

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羣衆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出來的優良的工作作風。正因爲我們實行了這種作風，才使我們黨成爲一個「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羣衆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叛徒、賣國賊林彪曾經肆意破壞我們黨這種優良作風，有一些同志也確實受到了這種破壞的影響。我們的任務就是要遵循毛主席歷來的指示，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有關

指示，肅清林彪的影響，繼續保持和發揚黨的三大優良作風。

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在同國內外敵人的鬥爭中，已經渡過了光榮的二十六年。儘管帝國主義曾經長期封鎖我們，社會帝國主義曾經多次妄圖顛覆我們，儘管受到幾次機會主義、修正主義路線的干擾破壞，但是全國人民在以偉大領袖毛主席爲首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沒有在他們所製造的困難面前後退，始終沿着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前進，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都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偉大勝利。

現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正處在一個重要的歷史發展時期。只要我們以毛主席的三項重要指示爲綱，做好各方面的整頓工作，繼續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我們就一定能夠實現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爲一個社會主義强國的宏偉目標，就一定能夠解放台灣，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

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正義的事業是任何敵人也攻不破的。

一九七五年十月七日

關於加快發展工業的若干問題

（討論稿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

目錄

十一、採用先進技術

十二、增加工礦產品出口

十三、各盡所能，按勞分配

十四、關心職工生活

十五、又紅又專

十六、紀律

十七、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

十八、思想方法

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了我國今後二十五年國民經濟發展的宏偉任務。第一步，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今後的十年，是實現上述兩步設想的關鍵的十年，我們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奮發圖强，使國民經濟有一個新的飛躍。

社會主義工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只有加快工業的發展，才能有力地支援農業，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才能有力地增强國防，做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才能進一步加强無產階級專

政的物質基礎，更好地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鬥爭。當前國際上革命和戰爭的因素都在增長，世界大戰總有一天要打起來，蘇修的戰略重點在歐洲，但始終想要向我們動手，我們要在爭取到的時間內，緊張地紮實地工作，不要把時間浪費掉了，工業的發展速度問題，是一個重大的尖銳的政治問題，全黨全民都要在努力發展農業的同時，爲加快工業的發展速度而鬥爭。

一、工作總綱

毛主席關於學習理論反修防修，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是全黨、全軍、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要加快工業的發展，必須牢牢抓住這個總綱。

工業戰線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十分激烈。新老資產階級份子，內外勾結，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少數企業資本主義傾向嚴重，破壞國家計劃，從事自由生產，自由交換的非法活動，黨員一部份，幹部一部份，工人一部份，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有些企業領導權不在眞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工人羣衆手裏。

有些同志對於這種情況熟視無睹，他們口頭上也講黨的基本路線，實際上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放在一邊，不抓這個主要矛盾，你攻過來，我攻過去，沒有完了，少數搞資產階級派別活動的頭頭，爭權奪利，拉山頭，搞分裂，鬧得企業不得安寧，地方不得安寧，黨不得安寧，階級敵人趁機混水摸魚，大撈一把，有的甚至篡奪了領導權，他們打着反復舊的旗號搞復舊，打着反復辟

的旗號搞復辟，破壞革命，破壞生產，把黨的好幹部，把先進模範人物和先進集體打下了台，壞人當道，好人受氣，這些地方，這些企業，管理混亂，生產長期上不去，有的已經變了質。

所有地區、部門和企業，都要深入地、全面地、持久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三項指示，要組織幹部和羣衆，認眞讀書，聯繫實際，把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搞清楚，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當前階級鬥爭的複雜情況。通過現象，揭露本質，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要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批判修正主義路線，批判資本主義傾向，批判資產階級派性，堅決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要注意抓好工業的整頓工作，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解決工業管理和企業管理中存在的某些亂和散的問題，深入開展工業學大慶的羣衆運動，把生產建設搞上去。

毛主席的三項重要指示，是緊密聯繫的，是一個整體，執行三項指示，就是執行黨的基本路線，執行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執行黨的團結、勝利路線，必須把搞好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學習，放在首要地位，促進安定團結，促進生產發展。只注意生產，忘記了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我們的工作就會走到邪路上去，就談不上社會主義建設。不注意生產，不努力搞好生產，把生產放在可有可無，可重可輕的地位，也是要不得的，沒有社會生產力的强大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是不能充份鞏固的，決不能把革命統帥下搞好生產，當作「唯生產力論」和「業務掛帥」來批判，我們要把「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方針，落實到一切工作中去，做出顯著效果。

二、黨的領導

能不能認眞貫徹落實毛主席的三項重要指示，關鍵在於黨的領導。

目前企業黨委的領導，大體有四種狀況：

一、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敢於領導，敢於負責，團結一致，革命和生產都抓得好。

二、領導班子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軟、散、懶」的問題，這些單位的領導，有的怕字當頭，不敢堅持原則，好的不敢表揚，壞的不敢批評，使黨組織處於軟弱無力的地位。有的鬧不團結，搞資產階級派性，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形不成核心，有的革命意志衰退，得過且過，小病大養，無病呻吟，工作因循守舊，無所作爲。

三、沒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識份子和「勇敢份子」當權。這些人政治上一竅不通，生產上毫無經驗，却指手劃脚，一味整人，只唱高調，不幹實事，動不動就給人扣上「復舊」、「倒退」、「保守勢力」、「只拉車、不看路」一類帽子，壓制廣大幹部和羣衆的積極性。

四、壞人掌權。有的是貪污盜竊、投機倒把份子。有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他們利用職權，胡作非爲，一方面拉攏、腐蝕一部份人，培植自己的權勢，另一方面打擊、陷害好的革命幹部和工人，搞資產階級專政，搞復辟倒退。

第三種，第四種是少數，但危害甚大，這些單位的嚴重情況長期得不到改變，是因爲背後有人支持。

整頓企業，首先要整頓黨的領導。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要對所屬企業一個一個地進行分析，區別不同情況，分若干步驟，用一年左右的時間把所有企業，包括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的領導班子整頓好，先抓關係全局的重點企業，然後再抓一般企業。特別要配備好企業黨委的第一、二把手，這些同志要黨性强，作風好，能團結人。

經過整頓，要改變那些「軟、散、懶」的領導班子，調整那些沒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識份子和「勇敢份子」當權的領導班子，把壞人篡奪了的權力奪回來，使領導權掌握在眞正馬克思主義者和工人羣衆手裏。

所有企業，都要貫徹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建立起一個精幹的而不是臃腫的，堅强有力的而不是鬆散軟弱的，能打硬仗的而不是一拖就垮的領導班子，企業是作戰的第一線，所有領導幹部都必須能上前線指揮作戰，有經驗的年老體弱的領導幹部，可以留在企業或到工業領導機關當顧問。

企業的一切工作，一切政治運動，都要由黨委統一領導，革委會、工會、青年團，都要在黨委的一元化領導下進行工作，決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凌駕於黨委之上，要同削弱黨的領導的錯誤傾向作鬥爭。

上級黨委要支持企業黨委的工作。

三、依靠工人階級

依靠誰辦企業，這是一個階級路線問題。

毛主席早就指出：「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現在有些地方，有些單位並不是這樣。他們不是依靠工人階級，而是依靠這個山頭，那個山頭，他們不作階級分析，盲目地跟着「造反派」和「反潮流份子」跑，結果，分裂了工人階級隊伍，脫離了廣大工人羣衆。

文化大革命已經九年了，還在工人羣衆中劃分什麼保守派、造反派，是錯誤的，應當根據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現實表現，區別先進、中間、落後，要以先進分子爲骨幹，帶動中間的，幫助和教育落後的，不斷地加强整個工人階級隊伍的革命團結。

對於造反，對於反潮流，都應當進行具體分析。要看造那個階級的反，看反什麼性質的潮流。正確的要支持，錯誤的要批評。反動的要堅決頂住，然後加以考查，進行批判。要特別警惕少數壞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義，搞破壞活動。領導幹部任何時候都要堅持原則，決不可隨風倒，決不能爲漂亮的詞句所迷惑，爲嚇人的帽子所壓倒，解除思想武裝，甚至把權讓給人家。

要劃分造反派、反潮流份子和工人階級先進份子的界限，不能說參加過反潮流，參加過造反的人，都是工人階級的先進份子，凡是以「造反」和「反潮流」作爲資本，向黨伸手，要當黨員、要

作官的，一律不給，不但不給，而且要批評。

要堅決同資產階級派性作鬥爭，針鋒相對，寸步不讓。現在還在搞資產階級派性，就是搞修正主義，搞資本主義，屢教不改的，要嚴肅處理。黨員決不允許搞派別活動，堅持不改的，要開除黨籍。

要落實黨的政策。工人、技術員、一般幹部，凡是被戴上「保守派」、「站錯隊」等帽子的，一律摘掉，有關檔案要退還給本人或者予以銷毀。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羣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充份發揮工人羣衆的幹勁、智慧和創造性，搞好企業的革命和生產。

四、整頓企業管理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很多企業堅持「鞍鋼憲法」，放手發動羣衆，改善了企業管理，各項工作生氣勃勃。也有相當一部份企業，思想政治工作軟弱無力，管理混亂，勞動生產率低，產品質量差，消耗大，成本高，事故多，給國家和人民造成嚴重損失。這些企業，必須在整頓和加强領導班子的同時，整頓企業管理，嚴格規章制度。

必須繼續深入批判修正主義辦企業的路線，不能絲毫放鬆。這樣做的目的，是爲了加强而不是削弱社會主義的企業管理，生產管理和規章制度，什麼時候都需要，一萬年也要，問題是遵循什麼路線，依靠誰來實行。一概反對企業管理，反對規章制度，勢必造成無政府狀態。「無政府狀態不

符合人民的利益和願望。」

所有企業，都要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要抓好基層黨支部的建設和班子建設，發揮黨支部的戰鬥堡壘作用和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要結合實際，搞好職工的理論學習，搞好階級教育，形勢教育，革命傳統教育。企業的各項政治運動，都必須在堅持生產的情況下進行，不能停產鬧革命。

企業的各項工作，都要堅持羣衆路線，大搞羣衆運動，放手發動羣衆去辦，不能由少數人冷冷清清去辦，要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企業各級幹部，必須堅持經常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制度，和羣衆打成一片，不搞特殊化。工人要參加企業管理。要廣泛實行領導幹部、工人和技術人員三結合。

所有企業，都要在黨委統一領導下，建立强有力能獨立工作的生產管理指揮系統，負責管理指揮企業的日常生產活動，及時處理生產中出現的問題，保證生產的正常進行。不能事無大小，都由黨委直接處理，妨碍黨委抓大事。要按照生產的需要和精兵簡政的原則，建立精幹的職能機構。這些機構，必須面向羣衆，面向基層，面向生產第一線，同羣衆管理密切結合起來，搞好計劃管理、技術管理、勞動管理、財務管理。

所有企業，都要把下列主要的經濟技術指標抓起來：(1)產量指標；(2)品種指標；(3)質量指標；(4)原料、材料、燃料和動力的消耗指標；(5)勞動生產率指標；(6)成本指標；(7)利潤指標；(8)流動資金佔用指標等等。不完成這些指標，不按質、按量、按時地完成供貨合同，就不算全面完成國家計

劃，長期完不成國家計劃，要追究領導責任，所有企業都要以產量多、質量好、消耗低、積累多為光榮，以產量低、質量壞、消耗大、有虧損（政策允許的虧損在外）為恥辱，凡是沒有達到歷史上曾經達到過的較好水平的，要盡快達到；已經達到的，要趕超國內和國外的先進水平。

要把質量、品種、規格放在第一位，凡是質量不合格的產品，不准出廠，不能用的東西、物資部門和商業部門有權拒絕收購。已經出廠的要包修、包換、包賠。

要生產和節約並重。努力降低原材料、燃料和動力的消耗定額，消除跑、冒、滴、漏，要清倉查庫，減少積壓，減少損耗。要反對鋪張浪費，減少非生產性開支，不合財政制度的開支，財務部門有權拒絕支付和報銷。不該進入成本的費用，不得亂擠成本，對於擅自向企業攤派任務，調出產品，抽掉資金、勞力、設備、材料的，企業有權抵制。

要改善勞動組織，做好編制定員和勞動定額工作，減少非生產人員和脫產人員，提高工時利用率，凡是應當業餘進行的各種活動，都不准佔用生產時間。現在有些企業，設立了一大堆脫產的體育隊、文藝宣傳隊、民兵、寫作班子等等，還有名目繁多的各種差事，使許多年青力壯的工人脫離生產第一線，使企業非生產人員的比例高達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所有這些脫產的專業隊伍一律撤銷。凡是不應當脫產的人員，一律回到生產崗位。

所有企業都要依靠羣衆，從實際出發建立和健全下列主要的生產管理制度：(1)崗位責任制；(2)考勤制度；(3)技術操作規程；(4)質量檢查制；(5)設備管理和維修制；(6)安全生產制；(7)經濟核算

制；等等。這些制度的具體內容，應當隨着客觀條件的變化不斷改革，逐步完善，但是這些制度是一定要有的，必須嚴格執行，隨意地廢除或者削弱這些制度，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能允許的。

責任制，是企業規章制度的核心，沒有嚴格的責任制，生產只能打亂仗，要把建立責任制，作爲整頓企業管理的重要一環，每一件工作，每一個崗位，都要有人負責；每個幹部，每個工人，每個技術員都要有明確的職責。要把制度和羣衆運動很好結合起來，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遵守規章制度成爲羣衆的自覺行動。

五、兩個積極性

一九七〇年以來，實行工業管理體制改造，把絕大多數企業下放給地方管理，加强了地方黨委對經濟工作的一元化領導，對工業的發展和工業支援農業起了顯著的作用。事實完全證明「有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必須把體制改革工作堅持下去。

該下放的企業，要堅持下放給地方管理，除了跨省、市的鐵路、郵電、長江航運、民航、輸油管和遠洋航運，以及大油田等少數關鍵企業、關鍵建設項目和專業施工隊伍，由中央各部爲主管理以外，其餘的企業、事業和建設單位還沒有下放的或者由中央部代管的，都應當根據條件，逐步地下放給地方管理，或實行中央、地方雙重領導，以地方爲主。

地方黨委要加强對工業的領導。中央下放企業和地方原有的大中型企業，原則上由省、市、自

治區和省轄市領導和管理，主要由省轄市來領導和管理，不能再往下放。現在，許多地方的工業管理機構不健全，業務人員太少，不能適應下放後的形勢，許多事情沒有人管，生產調度工作抓不起來，影響生產的發展，這些地方，要迅速建立和健全必要的管理機構，切實地把生產管好。

中央各部要和地方一道做好下放企業的交接和管理，不能撒手不管，我們當前的任務，是建成全國的工業體系，並且逐步建成×個協作區的工業體系，還不能各省、區自成體系。因此對於那些關係國民經濟全局的雙重領導，以地方為主的大企業，中央有關部門不僅要管方針、政策，管統一計劃，而且要管產品的調出，管當地不能解決的重要物資的供應，這些企業的主要領導幹部的調動，地方要同中央有關部門商量，地方要首先保證這些企業計劃的完成。

企業下放，實行分級管理，決不能削弱中央的集中統一，該集中的，必須集中，不能分散。(1)國民經濟的方針，政策；(2)工農業的主要生產指標；(3)基本建設投資和重大建設項目；(4)重要物資的分配；(5)主要商品的收購和調撥；(6)國家財政預算和貨幣發行；(7)新增職工人數和工資總額；(8)主要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必須集中到中央，任何地區、任何部門都不能各行其事。現在有些地區和單位不顧全局的利益和中央的統一規定，任意制定政策，違反國家計劃，隨意改變下放企業的生產方向，中斷原有的協作關係，不完成上調任務，亂上基本建設項目和擴大建設規模，亂拉亂用物資和資金。隨意增加職工和擴大工資總額，擅自改變物價，這是不能允許的。

要保證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高速度按比例地發展，實現今後十年的奮鬥目標，必須加强國家的統一計劃，不論中央單位或地方單位，全民所有制單位或集體所有制單位，它的生產、建設和其他一切主要經濟活動，包括勞動、工資、物資、財務等，都要經過逐級審查和平衡，納入國家統一計劃，實行全國一盤棋。不搞統一計劃，或者破壞統一計劃，就會出現盲目性，就會給資本主義泛濫造成可乘之機。其結果，是瓦解和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對集體所有制企業，要加强領導，發揮它的積極性，防止自發性。

要根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根據發展國民經濟的任務和主攻方向，根據實現的可能性，搞好計劃的綜合平衡。着重安排好農、輕、重的比例關係，原材料工業和加工工業的比例關係；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係，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比例關係，生產維修和基本建設所需材料、設備的比例關係，以及「骨頭」和「肉」的比例關係，等等。

計劃的制訂，要充份發動羣衆，廣泛聽取基層單位的意見，實行「自下而上，上下結合，塊塊爲主，條塊結合」的辦法，經過逐級平衡，訂出全國的統一計劃。

計劃的制訂，要有客觀依據，做到積極可靠，留有充份的餘地。

計劃要有嚴肅性。經中央批准下達的計劃，各部門，各地區，各企業都必須堅決執行。要反對不顧大局，不執行國家計劃，想怎麼幹就怎麼幹的錯誤作法。調整計劃，必須按規定程序，報經批准。

充實和健全各級計劃機構和統計機構，加强計劃和統計工作，統計數字必須反映實際情況，反對瞞報虛報。

七、以農業爲基礎

農業是國家經濟的基礎。沒有農業的大發展，就不可能有工業的大發展，所有工業部門，都要牢固樹立以農業爲基礎的思想，更好地爲農業服務，鞏固工農聯盟。

國民經濟計劃，不論是全國的，還是地方的，必須堅持按農、輕、重的次序進行安排，把農業放在第一位。工業越發展，工業比重越增大，越要重視農業。這是正面經驗和反面經驗證明了的一條重要規律。

各個工業部門都要了解農業的需要，把支援農業現代化作爲自己的重要任務，盡最大努力爲農業提供機械、化肥、燃料、動力、建築材料、運輸工具等等，幫助農民掌握現代的科學技術，爲在一九八〇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爲更大地增加農業生產貢獻力量。同時，積極增加對農村的輕工業品供應，擴大城鄉物資交流。

城市要帶動農村。每個工業城市，要根據自己的力量，帶動一個到幾個縣，幫助他們發展農、林、牧、副、漁各業，舉辦小型工業，增加社隊收入，改善城市供應。這件事，要納入各工業城市的計劃，並有專門機構管理。

有條件的工礦企業，要像大慶那樣，實行工農結合，城鄉結合，從事農副業生產，逐步提高糧食和副食品的自給水平。沒有可開墾土地而又臨近農村的，可以在當地黨委的統一領導和安排下，劃一兩個公社歸企業領導，幫助他們發展農副業生產，成爲向工礦企業提供蔬菜、肉類和其他副食品的基地。

要對職工進行工農聯盟教育，主動搞好工農關係。

八、大打礦山之仗

當前工業中突出的問題，是原料、燃料和動力工業落後於加工工業。特別是鋼鐵工業落後，在鋼鐵工業和整個原料工業中，礦山又是薄弱環節。要加快工業的發展，必須堅決貫徹「以鋼爲綱」的方針，並且把主攻方向放在礦山。「沒有原料，光搞加工工業，就叫做只搞無米之炊」。

……

各級領導要把礦山建設放在重要位置，派出得力幹部抓礦山，集中優勢兵力，下力量解決鐵礦的採掘、選礦和燒結問題。在鐵礦資源豐富的地區，成立獨立的礦山公司。

機械製造部門要積極發展先進的大型的採掘設備，運輸設備和其他礦山機械。同時，引進一些關鍵性的技術先進的礦山設備。

實行礦山資源的綜合開發、綜合利用，反對「單打一」，各級計劃委員會要把這樣工作管起

來。

在大力開發礦山的同時，要解決好冶煉和加工的問題，相應地安排好其他工業部門的發展。

九、挖潛、革新、改造

我國工業已經有了相應的基礎，佈局已經開展。……當前的任務，就是要把已有的工業基礎充份利用起來，通過技術革新、技術改造，通過合理組織，分工協作，使它們不斷地發展壯大。這樣做，比建設新項目的投資省，見效快，收效大，今後工業生產的增長，應當主要靠發揮現有企業的作用，而不是靠新建。這是一條必須遵循的重要方針。

各行各業都要放手發動羣衆，在現有企業中打一場挖潛、革新、改造的人民戰爭。要批判那種不願意利用現有基礎，不肯在挖潛上下功夫，動不動就搞新建的錯誤思想和做法。

要打破行業界限，地區界限，搞好社會主義協作。各級工業主管部門要切實把這項工作抓起來。

要提倡共產主義風格，把方便讓給別人，把困難留給自己。要反對把全民所有制的生產資料看作是部門所有，地區所有，企業所有，寧肯設備閑置也不願意承擔協作任務的錯誤傾向。要反對都想自搞一套，萬事不求人的錯誤思想。

革新、改造和組織協作，都要統一規劃，加强領導，重點應當放在增加原材料、燃料和短線產

品方面，放在提高成套水平和綜合利用方面。生產能力有富餘的加工行業，要組織一部份企業改產短線產品。已有的更新改造資金，要列入計劃，切實用好，工業計劃的安排和材料、設備、資金的分配，要優先保證革新、改造的需要。

十、基本建設要打殲滅戰

要採取果斷措施，定出一套嚴格的管理制度，解決這個問題。

1.不論中央部門和地方，安排基本建設投資和基本建設項目，都是圍繞今後五年和十年的奮鬥目標，不能離開這個總目標，各搞一套。都要按照國家的物力、財力和人力的可能，不能超越這種可能，不分輕重緩急，齊頭並進，都要貫徹執行大、中、小並舉，土洋並舉的方針，不能違反這個方針，什麼都追求又大又洋又全。

2.從一九七六年起，每年施工的大中型項目嚴格控制在××項以下，每年竣工投產的項目確保××項到××項，把平均建設周期從現在的×年多，縮短爲×年。新上項目，要嚴格控制，正在施工的項目，要一個一個審查和清理，不急需的，或者條件不具備的，堅決停建緩建。

3.所有基本建設，包括地方和部門的自籌資金在內，都要納入國家統一計劃。大中型項目由國家批准，小型項目由省、市、自治區批准。任何地區、部門和單位，都不准擅自上基本建設項目，不准擅自擴大工程規模和提高建設標準，不准任意改變施工進度，任何人都無權挪用國家重點項目

的材料、設備和資金，去搞別的工程。

4.整頓資金渠道。不准挪用大修基金和生產流動資金，不准動用企業留成的基本折舊，不准動用企業應當上繳的利潤和稅收，不准挪用銀行貸款，不准向企業、社隊攤派資金，搞基本建設。責成基本建設銀行把所有基本建設撥款統一管起來，並做好監督工作，違反國家規定的工程和開支，一律拒絕撥付。

5.所有建設工程，都要嚴格按基本建設程序辦事，沒有設計，沒有安排好設備，不能列入年度計劃，不能施工，大中型項目都要做好設備成套安排，按照施工進度及時供應，這項工作要有專門的機構負責。

6.整頓基本建設管理。從地質勘探、設計、施工到驗收，都要建立嚴格的規章制度和責任制，努力提高建築安裝隊伍的勞動生產率，加快建設進度，確保工程質量，降低工程造價，提高投資效果，克服嚴重浪費現象。

十一、採用先進技術

世界上工業落後的國家趕上工業先進的國家，都是靠採用最先進的技術，我們也要這樣做。每個部門，每個行業都要了解世界上的先進水平，訂出趕超的規劃和措施。

要大力開展羣衆性的技術革新和科學實驗活動，尊重羣衆的首創精神，注意總結、提高、推廣

羣衆革新創造的成果，要發揮專業研究機構和隊伍的骨幹作用，使他們同羣衆密切結合，研究和解決重大的關鍵性的科學技術問題。科學院和國務院各部系統的科研單位，凡是擔負全國性任務的，必須實行以科學院和國務院各部領導爲主的體制，已經下放了的要收回，工礦企業的科學研究和技術管理工作要加强。大中型企業要有自己的研究試驗機構，有的企業還要設立中間試驗廠、試驗車間；小企業要在市的範圍內，或者幾個企業聯合起來，成立必要的研究試驗機構。企業的技術人員，應作爲生產人員，不能把他們列入脫產幹部和非生產人員編制。高等院校的科研力量要充份運用起來，要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繁榮科學技術。

要堅持學習與獨創相結合的方針，必須虛心地學習外國一切先進的優良的東西，有計劃重點地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爲我所有，以加快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我們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對洋奴哲學、爬行主義，但是不能夜郎自大，閉關自守，拒絕學習外國的好東西。所有工業部門和科學研究單位，都要抓緊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的勝利爲我們創造的有利時機，盡快地把我們急需的新技術學到手。

對於引進的外國的先進技術，要培訓必要的技術力量，迅速地把它掌握起來。要根據「一用二批三改四創」的原則，在用中熟悉它，改造它，發展它，要反對一概照抄照搬，也要反對沒有學會就亂改亂動。

新技術、新發明創造，要有一定的保密制度，但是部門之間，企業之間不能互相封鎖。

例。

十二、增加工礦產品出口

要多引進一點國外的先進技術，就必須增加出口，必須盡快提高工礦產品在出口物資中的比例。

每個工業部門，都要研究國際市場的需要，積極增產能夠出口而換率高的產品。要盡快地發展生產，盡可能地多出口，不能只考慮進口的要求，不考慮增加出口貨源。我們國家以國內市場爲主，國外市場爲輔，但國外市場很重要，不能忽視。

爲了加快我國煤炭、石油開發，可以在平等互利的條件下，按照國際貿易中延期付款，分期付款等通行作法，同國外簽訂長期合同，固定幾個生產點，由他們供應適合需要的現代化的成套設備，然後用我們生產出來的煤炭和石油償還。

十三、各盡所能，按勞分配

在工資問題上，我們黨的一貫政策是，旣反對高低懸殊，也反對平均主義。我們必須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反對擴大差別，反對物質刺激。不這樣，就會助長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危害無產階級專政的鞏固。

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決不能脫離現階段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否定按勞分配，不承認必要的

差別，搞平均主義。平均主義不僅現在不行，將來也是行不通的。

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不勞動者不得食，是社會主義原則。在現階段，它是基本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必須堅決實行。不分勞動輕重，能力强弱，貢獻大小，在分配上都一樣，不利於調動廣大羣衆的社會主義積極性。

要逐步提高低工資職工的工資，縮小高低工資之間的差距。

要實行正常的升級制度，按照職工的勞動態度，技術業務能力，勞動和工作中的貢獻，根據國家計劃規定的升級面，經過羣衆評議和領導批准，每一兩年提高一部份職工的工資待遇。

要對高溫、高空、井下、野外、有毒、有害等勞動條件差、勞動强度大的工種，實行崗位津貼。

要在調查研究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逐步改革現行的工資制度。

所有企業，必須堅持政治掛帥，教育職工爲建設强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和支援世界革命而勤奮地勞動，樹立共產主義的勞動態度，正確處理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係。不能把按勞分配和各盡所能分開。要向廣大羣衆說明，我們還是發展中的國家，生活只能在發展生產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逐步改善，要繼續發揚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

十四、關心職工生活

各級領導要生產、生活同時抓，要把羣衆生活上的問題，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來，進行討論。凡是能夠解決的都要發動羣衆，自己動手，積極去解決，對羣衆生活中的困難，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是根本要不得的，企業黨委要有一位主要負責同志抓生活。

要有計劃的增加職工宿舍和城市公用事業的建設，國家分配給這方面的資金，不能挪用。地方要把自籌資金較多地用於這一方面。

積極辦好食堂、托兒所、醫療衞生等社會集體福利事業，組織好業餘教育和文娛體育活動，搞好計劃生育。

努力改善城市和工礦企業的副食品供應，大中城市要建立副食品基地，逐步舉辦大規模的現代化的養豬場，養鷄場。

要有步驟地解決職工夫妻長期二地分居的問題。

工人退休、死亡後，可以允許招收他們一名符合招工條件的子女參加工作。

要搞好勞動保護，改善勞動條件，做到安全生產。要注意女工保護工作。

要堅決消除「三廢」，保護環境，保護職工身體健康。新建項目不安排好處理「三廢」的措施，不准施工。老城市和現有企業，要有計劃地解決污染問題。

注意勞逸結合。

十五、又紅又專

要實現把我國建成爲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强國的偉大歷史任務，沒有大批政治覺悟高而又精通技術、精通業務的人材，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早就指出：「政治和業務的關係，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一定要反對不問政治的傾向，但是不懂技術，不懂業務，也不行。我們的同志，無論搞工業的，搞農業的，搞商業的，搞文教的，都要學一點技術和業務，成爲內行，使自己又紅又專。」所有的幹部，都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並且通過自己的實際行動，帶領廣大工人，科學技術人員走又紅又專的道路。

廣大工人，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努力學習和掌握生產技術，使自己成爲階級覺悟高，組織紀律性强，技術熟練的勞動者，在三大革命運動中發揮主力軍的作用。

科學技術人員，要堅持同工農相結合。努力改造世界觀，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要鑽研科學技術，精通業務。凡是眞正願意爲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都應當給予信任，幫助他們解決各種必須解決的問題，使他們得以專心致志地研究一些東西，積極地發揮他們的才能，對他們的成績，要加以肯定。對他們的缺點，要熱情幫助，科技人員不適當地改了行的，要加以調查。有些單位不重視科學技術人員，不注意發揮他們的作用，是完全錯誤的。

各級黨委要表揚那些又紅又專的先進人物，批評和教育那些不問政治，不鑽研技術和業務的人

員，造成一個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時努力鑽研技術和業務的空氣。特別要注意使兩者互相結合而又不是互相對立。要積極地爲廣大職工又紅又專創造條件。

十六、紀　律

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證。「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現在，許多方面紀律鬆弛，影響很壞，危害甚大，必須加强紀律性，同一切違反政策、違反制度、違反統一計劃、違反財經紀律、違反勞動紀律的現象作鬥爭。

廣大職工都要自覺地遵守紀律。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應當成爲遵守紀律的模範。要支持和表揚那些認眞執行政策、制度和敢於堅持原則的同志，嚴禁打擊報復。對違反紀律的行爲，要嚴肅批評教育，情節嚴重的要給予處分。要按照黨紀國法制裁那些違法亂紀的人，決不能姑息縱容。

十七、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

「深入一點，取得經驗，推動全盤」，這是我黨早已行之有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工作方法，

工業要搞好，也必須採取這種方法。

各地、各部門都有好的典型，好的經驗，有大量的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各級領導要深入羣衆，用心尋找羣衆中的先進經驗，加以總結，使之推廣，鼓舞羣衆前進，把生產不斷推向新的水平。許多地方和部門堅持這樣做，工作很有生氣，很有成績。但是，還有許多單位，不善於這樣做，習慣於坐在辦公室裏發號施令，胸中無全局，手中無典型，他們必須改變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

在抓先進的同時，要注意做好後進單位的轉化工作。

要遵照毛主席「在總路線指導下，制定一整套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的指示，通過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的辦法，制訂出工業管理章程，企業管理條例和各行各業的工作條例。

要紮紮實實，力戒空談，減少會議，開短會，講短話，不能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工作要深入、細緻、踏實，反對淺而不深，粗而不細，華而不實。要發揚大慶油田「三老四嚴」的作風。要敢於負責，反對互相推諉，敷衍了事。要講求效率，反對疲疲沓沓，拖拖拉拉，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能講。

十八、思想方法

提倡唯物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看問題要從各方面去看，不能只從單方面看，要透過現象看本質。要注意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

對任何事物都要採取分析的態度，保護正確的東西，批判錯誤的東西，不可以不明靑紅皂白，一概肯定，或者一概否定。

要實事求是，加强調查研究，使思想符合客觀實際，不斷地認識和掌握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

要重視正面的經驗，也要重視反面的經驗。通過成功和失敗的比較，使不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逐步地發展成爲完全的認識或者比較完全的認識。

附：鄧小平對工業發展有關問題的談話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八日鄧小平談了工業發展的有關問題，大意如下：

企業要整頓，看起來企業問題不少。企業裏設備完好率差，帶有普遍性，特別是重工業。輕工業和交通運輸可能好一些。企業管理要整頓，不整頓怎麼行！要考慮今年十一、十二兩個月集中整頓一下企業管理秩序，加强設備維修，爲明年打好基礎。設備失修嚴重的，重點放在維修，寧可少生產一些，一定要把設備修好。急了不行，欲速則不達，越催越上不去。企業管理是一件大事，講幾個問題。

一、要强調農業爲基礎的思想。工業的重大任務是促進農業現代化。工業區、工業市要帶動附

近農村，加强工農聯盟，幫助農村發展小型工業，納入市的計劃。農業現代化不單單是機械化，包括科學技術的發展。農村可以搞一些養鷄塲，機械化一些，一方面可以增加農民收入，一方面解決城市供應。好多三線工廠分散在農村，應當幫助附近農村搞好農業生產，一個大廠幫助附近一片，實現現代化。我給四川同志寫過信，告訴他們工業越發展，越要把農業放在第一位。沒有菜，沒有肉吃，工業怎麼能搞得好。

二、要採用新技術。有一個出口政策問題。要拿出多的東西換取外國最新最好的設備。外國的產品，一剖開好多東西也是別的國家的。有一些原材料，一時解決不了，必須進口的，還要進口一些。如化工原料，化纖廠搞起來了，沒有燒碱和染料就不能生產，那怎麼行。要進口，就要多出口點兒東西。第一是石油，要盡量發展，盡多出口，這是最可靠的，不要揪住日本一家，可向西歐打開出路，賣給西德和法國，可以換回好多好東西回來。西德有些技術裝備不錯。化工產品也要考慮出口，工藝美術品要千方百計出口，還有傳統產品，也要考慮煤炭出口，要從政策上考慮，出口一千萬噸煤等於五百萬噸石油，接近十億美金。考慮引進外國技術裝備開採煤礦。同他們訂長期合同，用煤炭償付。這不等於欠外債。這是一個大政策，要中央批准再辦。這樣做的好處，一能出口，二可帶動煤炭技術改造，三可容納勞動力。煤炭開採效率太低，（有人說每人每天零點八噸）過去達到過一噸，零點八噸太低了，一噸也低。出口一點東西，換點高、精、尖的，加速工業技術改造，提高勞動生產率。聽說我們地質勘探技術，只能找貧礦，外國人用綜合技術可以找到富礦，

爲什麼不進口這樣的設備？

三、加强企業的科學研究工作。工業越發展，企業科研人員的人數應當越來越多，比例越來越大。大廠要有自己獨立的科研機構，小廠由市裏綜合辦，也可以幾個廠聯合在一起搞。現在有一些知識份子沒有發揮原來學的技能，學非所用。要加强這方面的工作。這是多快好省的一個重要政策。科學實驗是三大革命之一，不說別的，出口包裝就要研究，總後還有個機關研究部隊裝備，做雨衣怎樣可以輕一點，靠總後自己不行，要幾個研究機構配合才行。

四、質量第一是個重大政策，包括品種、規格、質量在內。這是最大的節約，質量好了，也能更多打開出口道路。

五、規章制度關鍵是一個責任制，現在的問題是無人負責。要突出這個問題。現在是積重難返，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開始要嚴一些。毛主席歷來主張要有章程，農業有六十條，工業也有個條例，主席一直講要修改，不是廢除。有章程才能體現黨的方針、政策和一些辦法。國防工業有一老工人講了嚴格規章制度的必要，這個材料發給大家看。

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

（滙報提綱　討論第一稿）（摘錄）

我們到科學院將近一個月，實際工作約二十天。查閱了一些重要的歷史文件，同院內外的一些同志進行了座談，作了點調查。現對下面六個問題提出一些粗略的看法。

（一）關於充份肯定科技戰線上的成績問題（略）

（二）關於科技工作的組織領導問題（略）

（三）關於力求弄通主席提出的科技戰線的具體路線問題

主席爲我們黨制定了整個過渡時期的基本路線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同時也制定了各條戰線的具體路線。我們對科技戰線的具體路線，還剛剛接觸，領會很不深，更談不上弄懂弄通。經過初步學習和調查研究，覺得當前有幾個問題需要明確。

第一是政治與業務的關係問題。

抓科技工作，一定要政治統帥業務，抓革命，促科研。「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忘記了黨的總路線，就會迷失方向。有了總路線還不夠，還必須在總路線指導下，正確貫徹黨的科技戰線的具體路線和一系列方針、政策，政策思想統一了，才能有統一的行動。

當前這個時期，就是要堅決貫徹學習理論反修防修、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三個指示。三個指示不能割裂開來。丟掉了反修防修，業務工作就會走到邪路上去。沒有安定團結的局面，生產、科技都不可能搞好。生產和科技搞不上去，物質基礎不牢靠，無產階級專政也不可能得到鞏固。

在科技部門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做到既有堅強的政治領導，又有切實具體的業務領導。黨政領導幹部，懂得很多的業務、技術是困難的，但是不學點業務和科學技術知識，不過問業務，也是不對的。應當朝又紅又專的方向努力。

第二是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的關係問題。

科學來源於生產，又指導生產、促進生產。怎麼才能多快好省發展生產？決定的因素是人，一靠人們的高度政治覺悟、革命幹勁，二靠掌握先進的科學技術。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動生產向前發展。石油工業的突飛猛進，就證明了這一點。

主席和中央提出了兩步走的宏偉目標，如果我們在科學技術上沒有一個大的飛躍，就難以實

現。沒有現代化的科學技術，也就不可能有工業、農業、國防的現代化。

有些同志認爲搞科學研究「遠水不解近渴」。其實，使科研走在前面，正是爲了避免「臨渴掘井」。有些同志顧慮新技術不成熟、不定型，怕躭誤生產。過去確實有過教訓。但是，從這個教訓應當得出的結論，不是不搞新技術，而是應當更加重視和加强科學研究。成熟總是從不成熟來的，定型也是從不定型來的，轉化的條件就是頑强地進行科學實驗。抓生產，一定要抓科學實驗，抓新技術；不但要有產量指標的要求，一定還要有技術經濟指標的要求。

第三是專業隊伍與羣衆運動的關係。

我們發展科學技術要靠兩支隊伍，一支是專業隊伍，一支是羣衆隊伍。兩條腿走路，發揮兩個積極性。

只要專業隊伍，不要羣衆隊伍，不搞羣衆性的科學實驗運動，培植精神貴族，不尊重甚至壓制羣衆的首創精神，這是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做法。

如果不要專業隊伍，則羣衆的積極性難以持久，羣衆性的科學實驗運動難以提高。

正確的方針是專業隊伍同羣衆運動結合。專業隊伍要向工農羣衆學習，向生產實踐學習。這種結合並不是要降低專業隊伍的作用，而是要更好地發揮專業隊伍在羣衆性科學實驗運動中的骨幹作用。要向羣衆普及科學知識，向生產推廣科研成果。要把羣衆的生產實踐經驗、科學實驗經驗提高到科學理論水平，使科學得到發展，再回到羣衆中去，推廣開來。國家還有許多重大的科學技術課

題，也必須集中一批專業隊伍來搞。

現在，專業隊伍、羣衆隊伍都要發展，都要提高。有些地方撤銷了不少專業科研機構，科技人員長期下放勞動或在生產崗位頂班勞動。還有許多專業機構，多年來沒有補充新生力量，平均年齡已近四十歲。這種狀況必須迅速改變。當前急需從下放勞動多年的理工科大學畢業生中，從羣衆性科學實驗運動湧現出的具有一定科學文化知識的積極份子中，有計劃地吸收一部份人充實和加强專業隊伍。還必須逐步建設一批新的專業科研機構。

科學實驗也是一種社會實踐，生產鬥爭是不能代替它的。有許多科學研究工作需要到生產現場去試驗研究，但又要注意把這種試驗研究同實驗室的試驗研究密切結合起來。還有不少工作不可能到生產現場去試驗研究，而必須是在實驗室裏進行試驗研究的。決不能否定和取消實驗室的研究工作。不能不加區別地要求任何科學研究工作都要實行「以工廠、農村爲基地」的三結合。不宜籠統地提「開門辦科研」這樣的口號。

科學研究有的需要搞大協作，有的是小集體搞，有的只是一個人在那裏鑽研。把一個人、幾個人搞的工作說成是「小生產」，是不確切的，也不利於調動人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

第四是自力更生和學習外國長處的關係。

實踐證明，掌握了自己命運的中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獨立自主地幹工業、幹農業、幹技術革命、幹科學實驗、幹一切事業。我們的基點是放在自力更生上的。

講自力更生，又不能變成閉關自守，變成排外。

主席講過：「我們公開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學習外國的一切先進的優良的東西，而且永遠學下去。」

列寧學習了馬克思主義，領導了俄國的十月革命。毛主席學習了十月革命的普遍經驗，結合中國的實際，領導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學習是爲了創造。善於學習，才能不斷前進，後來居上。搞社會科學是這樣，搞自然科學也是這樣。

我們的科學技術同世界先進水平比，還有不小的差距。「什麼都是外國的好」，這是錯誤的。不敢介紹外國的長處，不去正視差距，也是不對的。承認差距是爲了加緊努力，消滅差距。

搞科技工作，必須注意調查研究國際上科學技術發展的動向，要收集、研究、分析外國的科技文獻資料，大力加强科技情報工作，這才能做到知己知彼，在人家已有的基礎上前進，避免別人走過的彎路，迎頭趕上去。

爲了爭取時間、爭取速度，我們有必要從國外引進一些先進技術、先進設備。引進是爲了借鑒，爲了促進我們自己的創造而不是代替我們自己的創造。

要改進和加强科技外事活動，要搞國際科學界的友好活動，又要爭取利用各種機會，在學術上多搞到一些東西，少搞不搞那種一般性的觀光活動。要像魯迅先生說的「拿來主義」，把外國的先進科學技術拿來爲我所用。

爲了更好地學習外國長處和擴大外事活動隊伍，要提倡年青科技人員下功夫搞通一兩門外文。

第五是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的關係問題。

我們黨歷來是重視自然科學理論研究的，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有過許多指示。我們既不要空洞的理論，也不要盲目的實踐。

我們有不少生產技術過不了關，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理論研究和基礎性工作。

我們現在在科學技術上還是仿的多，創的少，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做到「外國沒有的我們也要有」，發展自己的創造，也要求加强理論研究。

我們在工農業生產中，在羣衆中，有豐富的實踐，我們國家還有豐富的科學遺產，需要總結提高，把具體經驗上升到一般規律、上升到理論，用以更廣泛地指導實踐。

還有一類理論研究，雖然暫時還看不到應用的途徑，但是對於認識自然、發展科學有重要意義，有的在國際政治鬥爭和哲學上兩條路線鬥爭中有重要作用，也是不能忽視的。

因此，在搞好大量的應用研究的同時，要重視和加强理論研究工作。不能把理論研究與「三脫離」等同起來。不能認爲只有應用研究是國家的需要，理論研究同樣也是國家的需要。許多理論研究往往不是短期內可以見效的，容易受到衝擊，更需要各級領導的重視、支持和做好切實安排。

各部門情況不同，也就需要有所側重。生產部門要着重解決生產中提出的科學技術問題，也要注意理論研究。科學院的研究所和部份高等院校，有條件，也有責任更多地搞一些理論研究。這方

面需要統籌安排。

第六是關於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問題。

當前，在科技戰線要大力加强學術活動，廣泛開展學術交流，鼓勵學術上不同意見的爭鳴和討論，改變學術空氣不濃和簡單地以行政方法處理學術問題的狀況。

在科技工作中，遇有不同意見，要區分問題的性質，分清界限。有的是屬於政治路線方面的問題，有的是屬於世界觀方面的問題，有不少則是屬於不同學術觀點和具體方法的問題。既要看到相互之間的聯繫又要區別主次，分清性質，不能混淆。

自然科學學術問題上不同意見的爭論是好事不是壞事。這種是非要通過學術討論的辦法，通過科學實踐來解決，不能用行政命令辦法輕易下結論，支持一派，壓制一派。更不能以多數還是少數，青年還是老年，政治表現如何來作爲衡量學術是非的標準。不能把資本主義國家、修正主義國家的科學家的學術觀點都說成是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的，隨意加以否定。

要提倡學習毛主席的哲學思想，學習自然辯證法，善於正確地分析和批判自然科學中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思潮的影響，在辯證唯物主義的指導下，創立我們自己的學派，支持和扶植科學研究中的新生事物。要把「中國科學」辦成一個用自然辯證法來研究自然科學重大課題的刋物，各種學術刋物要提高質量，使它們眞正成爲開展學術討論和學術交流的陣地，充份地反映我國學術工作面貌和學術水平。

（四）關於科技戰線知識份子政策問題（略）
（五）關於科技十年規劃輪廓的初步設想問題（略）
（六）關於院部和直屬單位的整頓問題（略）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一日

附：鄧小平在聽取胡耀邦滙報時的插話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鄧小平：好久沒開這樣的會。先講概況，作重點說明。

（胡耀邦滙報：「滙報提綱」稿修改過程和提綱組成部份，第一部份四個觀點）（當講到差距大時）

鄧小平：這一點是要謙虛一點好。

（胡耀邦滙報：三個方面的任務，擺法。把生產需要擺在第一，第二是新興領域。）（當說到

自己很不懂時）

鄧小平：請教了一些專家嗎？我根本無發言權，有些怪名詞、怪字、新字。

（胡耀邦滙報：第三是基礎科學。）

（當問到什麼是三大前沿科學時，有人答：就是基本粒子，天體演化，生命起源。）

鄧小平：考古學，我說，隨便找塊石頭都是最古的，任何石頭也是古的。

（胡耀邦繼續講：第二部份是講路線問題。當滙報到第五個問題又紅又專，不敢講紅專時）

鄧小平：實際上是不敢講「專」字。說清楚。

（當滙報到雙百方針開座談會時）

鄧小平：調動他們的積極性。

（胡耀邦講第三部份，整頓問題。當講到一周只四個半天搞業務時，胡喬木說：看電影也佔工作時間。）

鄧小平：那不是很好嗎！文化娛樂。

（胡耀邦：大家不滿意。）

鄧小平：怎麼會滿意呢！這四個半天是正確的，那八個半天不正確。不務正業，少務正業。

（當講到科技人員生活時）

鄧小平：不是一般的問題，高級人員的房子被佔了，要給他們蓋房子。

（講到落實政策時）

鄧小平：所、研究室領導不調整，說落實，他搞的。一個縣、一個工廠不把班子弄好，誰執行政策？你落實，他就落虛了。歸根到底是領導班子問題。

（當胡耀邦說有辮子時）

鄧小平：辮子也確實有一點，比我强一點。我說過我是維吾爾族的姑娘，辮子多。辦法是羣衆運動，羣衆討論。那些人，他不怕主席、黨中央，國務院不在話下。你們幾個算老兒？他們怕羣衆，主席歷來講這個眞理。

（胡耀邦滙報完後，接着李昌滙報了幾點：一是請中央調些幹部；一是想辦一個科技學校，招高中生，半工半讀，加强自然科學基礎和外語的學習；一是辦進修班，把各行專業在科研上表現特別突出的調來培養；一是辦一個宣傳自然辯證法的刊物。）

鄧小平：不高興你們的人是少數，希望改變現狀的是百分之九十五，相信這一點。最後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當李昌講到要辦科技學校時）

鄧小平：不懂外文，你搞什麼情報，沒有數、理、化，你名字叫高中、大學畢業，你怎麼搞自然科學！這是對教育部提出的問題。不但懂外文，也得有基礎知識，不然外文的東西也翻不出來。

（當李昌講到要辦一個自然辯證法刊物時）

鄧小平：你爲什麼只搞一個？主席對「化石」都有批語。過去你們有多少刋物？現在多少？也不能只講數量，不講質量。

（李昌講完後）

鄧小平：這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議一下。國家麼，科研不走在前面？我們在大寨會上說農業拉工業的後腿，科研是拖整個的後腿。你們第一講應用科學，應用科學也有理論。

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靠老的，也靠年輕的。他靈活，記憶强，大學畢業二十五歲，經過十年三十五歲，眞正來說，三十多點應是出成果的年齡。這一段，他們未搞，看電影，打派仗，搞的很少。少數人秘密搞，像犯罪的一樣。×××是秘密搞的。這些人還有點成績。究竟算紅專還是白專？中國有一千人就了不得。在世界上公認有水平的，他會數學，中央表揚這個人可取。就是白專，有一點子有什麼！應該愛護、讚揚，是個代表吧？

你們有個搞半導體的，是個老科學家，叫××，北大叫他改行教別的，他不會。周榮鑫你查一查。半導體所請他作學術報告，反映很好。他說這是業餘研究的。這種人是大量的，學非所用，應當發揮作用。不然，是對國家最大的浪費。全國知名的人，就這麼個遭遇。他是學部委員，當學部委員都是有點名氣的人，爲什麼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調到科學院半導體所當所長。給他配黨委書記，配後勤人員。老科學家一般有知識。只舉這麼個例子，前三天得的消息，我告××同志了。他教什麼課？改了行。

鄧小平：毛澤東思想是理論，馬列主義是理論。學習這些，也叫「刮理論風」？對理論有恢復名譽的問題。

鄧小平：鞍鋼科技人員比重少，不是多了。

鄧小平：思想整頓關鍵是班子。要眞正執行主席科研路線的。廣大科學人員實在想搞研究啊！鬧派性的是少數，能轉過來，組織整頓、思想整頓還不是這些人。

一不懂行，二不熱心，三有派性，爲什麼留着？科研人員中有水平有知識的爲什麼不可提當所長。四十多歲的人，搞十幾年了，現在的工作，主要是依靠四十多歲的人來搞。好的管黨，管後勤工作。後勤很重要。要爲研究工作創造條件。資料、材料、儀器、機器保護好，不是忠心耿耿的人，搞不起來。這也是科研工作中的政治工作。黨的、科研的、後勤三個部份，無後勤，科研搞不起來。不能叫搞科研的人整天東跑西跑。所謂整頓班子要包括這三部份人。這種人也得學科學知識，不懂科學知識，搞後勤也不行。把黨性好的、組織能力强的，搞後勤，書呆子不行。搞科研的允許是書呆子。

班子要三套人，特别要注意把有前途的提到班子裏。外行要熱心內行，誠心誠意地搞後勤工作。建議建立科技人員檔案，把那些比較好的科技人員，那些有前途的，記下來。××萬人有一千人也好。也許有幾十個人，有成就的就了不起。幫助他們創造條件，發展條件。不管資格老不老。一九五七年我在蘇聯，尤金說，蘇聯搞原子彈，就是三個無名氣的，其貌不揚的人搞出來的，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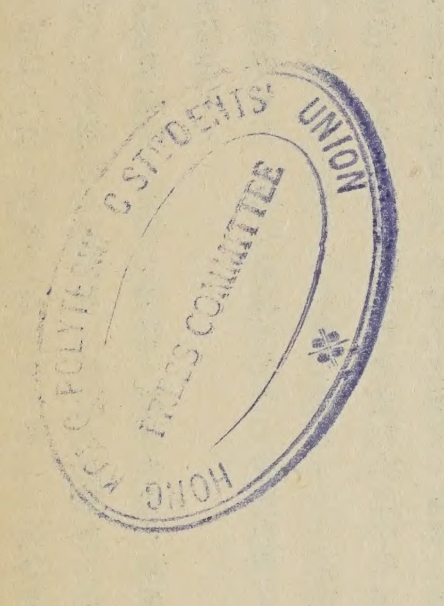
大科學家，是三、四十歲的。我們就沒有啊？要創造條件，關心他們，要政治上關心他們，包括怪脾氣、毛病大的，都應支持。「白專」，只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好處，比只佔茅房不拉屎的，比鬧派性、拉後腿的人好得多。工廠企業都要注意，創造條件。首先要解決這些人的房子問題，把他們提到領導崗位，家庭有困難，解決他們的困難，孩子沒有進托兒所的，幫助進托兒所，夫婦兩地可幫助解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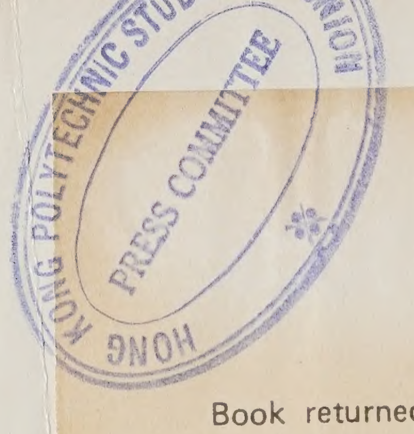
後繼要有人，中心是教育部門，究竟大學起什麼作用？培養什麼？如鋼鐵學院是中等技術學校水平，這何必辦大學？上海機床廠七·二一大學是一種形式，也發展。但不能代替其他大學。國防科委要把科技大學辦好，選數理化好的高中畢業生，不照顧幹部子弟。要是犯錯誤，我首先檢討。一點外語知識也沒有，數理化也沒有，還攀什麼高峯？中峯也不行，低峯還是問題。你們搞中技也是對的。教育部要幫忙，試試看嘛！錯誤也可當毒草來鋤嘛。我們有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平拉住了。這不是復舊！教師地位問題。只挨罵，幾百萬教員，怎麼調動積極性呢？主席講消極因素還要轉化爲積極因素嘛！眞空冶煉是錦州七個勞改犯搞的，這是六十年代的事。何況不是勞改犯！××萬有多少個勞改犯？教育也要調動積極性。如果我們工廠自動化水平提高，就是要增加科技人員才能提高。提高數量，提高質量。自動化提高，體力勞動減少。世界上先進國家不管是什麼制度都是走這個道路。這些是不是勞動者？叫生產力，就是勞動者！

（當周榮鑫說科學院是三科五派，作了自我檢討時）

鄧小平：單獨介紹，按照九號以來的文件精神辦。哲學與自然科學寫清楚。隊伍寫清，就是包括全國的，除院，還有全國，國防方面的，這個隊伍，改寫一下，具體問題增補一點。先送主席。印發政治局。請示主席。主席非常關心這個問題。連「化石」都關心。今天就這樣。

鄧小平：叫他們過一個關，下一步再說，精力放在整頓上，使大家開始工作。




HONG KONG POLYTECHNIC STUDENTS' UNION
PRESS COMMITTEE

出版說明

中國大陸的四人幫事件，帶來了中國歷史的大轉折，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許多被顛倒的事實被重新顛倒過來，許多理論問題和是非標準，都有了重大的改變。這的確是中共建國後的最大政治事件之一。

四人幫事件發生的背景如何？風雲變幻的高層鬥爭的具體經過怎樣？中國大陸的現狀已經發生和將要發生什麼變化？這事件對中國大陸今後的局勢帶來什麼影響？

本書作者根據中共報刊的揭發材料、西方記者的報道、民間流傳的消息、作者個人的見聞，經過選擇、分析、綜合，在「七十年代」月刊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對上述問題作系統的探索，並就這一事件在海外引起的連串疑問，提出個人的認識。

這一系列文章在月刊發表時，受到廣泛的注意。現經作者修訂出版。書末並附錄了曾被四人幫歪曲批判，並導致他們失盡人心的三個文件。

H. K.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